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应对特朗普“乐见贸易战”的政策选择 谷源洋 (005)

刍议科研创新的规律与科研生态的构建 贾 康 (014)

• 国际经济 •

我国自由贸易区的溢出及协同互补效应研究
陈金明 施 楠 任再萍 (02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研究
田昕清 黄永富 (039)

• 宏观经济 •

以“智慧监管”破解网络食品安全困境 魏义方 (049)

我国银行体系突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孙晓涛 (059)

• 产业发展 •

软件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林笑跃 董庆伟 高小玉 (072)

数字经济与软件业发展研究 沈家文 (088)

全球软件贸易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谢兰兰 (103)

• 新书推介 •

开放发展 与世界共赢

——王晓红、陈超等著《“十三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战略研究》简介

书 讯 (114)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17)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3)



CONTENTS

Policy options for Trump’ s “happy to see a trade war”	<i>Gu Yuanyang</i> (005)
Discussion on the law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cology	<i>Jia Kang</i> (014)
A study on the spillover and synergistic complementary effects of China’ s Free Trade Area	<i>Chen Jinming , Shi Nan and Ren Zaiping i</i> (023)
Research on Chinese enterprises’ 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ian Xinqing and Huang Yongfu</i> (039)
“Smart supervision”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Internet food safety	<i>Wei Yifang</i> (049)
The prominent risk poin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 s banking system	<i>Sun Xiaotao</i> (059)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software trade	<i>Lin Xiaoyue , Dong Qingwei and Gao Xiaoyu</i> (072)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oftware industry	<i>Shen Jiawen</i> (088)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software trade	<i>Xie Lanlan</i> (103)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7)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3)

应对特朗普“乐见贸易战”的政策选择

谷源洋

摘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利用国内贸易法相关规定的“301、201 和 232”等条款进行所谓调查，并以影响国内安全为由，单方面挑起主要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我们不能把特朗普的“乐见贸易战”仅视为口头上说说而已的一场经贸闹剧，而应把它看成是对我发起的真正的挑战、冲击和威胁。贸易战背后反映了特朗普回归对华遏制战略的意图，即抑制中国发展和崛起。中国已经释放出足够的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信息，出台了管控中美贸易关系失控的系列政策，美对我商品加征关税已放宽期限，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称“中美双方有希望通过谈判来避免关税冲突”。中美关系的全面改善，尚有待于特朗普政府放弃对华遏制战略，否则中美经贸关系难以稳定，矛盾与冲突将会一个接着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华接触战略已告失败，对华遏制战略亦难奏效。

关键词：中美关系 贸易战 遏制战略 应对政策选择

作者简介：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中心主任。

贸易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和“推进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想抛弃“压仓石”和“推进器”，势必将破坏中美关系大局和全局。为此，我们似应理性、冷静分析中美在经济、政治、安全、理念等多层面出现的新变化，设法缓解中美紧张关系，继续推动经济合作前行。

一、特朗普“乐见贸易战”是对华战略回归遏制的组成部分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总统对华战略的着重点，有的是“遏制”，有的是“遏制 + 接

触”，有的是“遏制+规则”，但“遏制”是历届美国总统对华战略的主线。从特朗普总统对华的言论和行动看，其对华战略是回归遏制的老路，而且是更为全面、更加强硬的战略遏制。

所谓全面遏制，亦即“遏制面”不仅涉及贸易与投资保护，更涉及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以及试图破坏中非和中拉关系。经济领域遏制已扩展到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否定，制裁内容涵盖了货物商品、知识产权、产业政策、信息网络及技术转移等各个领域。尤其是特朗普总统把中国称之为“价值观的竞争对手”，美国国防安全战略报告声称，首要关注点是国家间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

所谓更加强硬，亦即利用国内贸易法相关规定的“301、201 和 232”等条款进行调查，并以影响美国国内安全为由，单方面加征强制性关税。特朗普总统扬言，如果有人要打“贸易战”，那就打吧！打“贸易战”对美国有利，能够使问题解决的更快些。因此，进入 2018 年后，特朗普总统先后宣布对太阳能板、大型洗衣机、钢铝产品等征收惩罚性关税。上述言论和行动充分表明了特朗普总统言称的“美国优先”以及解决所谓“不公平”贸易的“坚定决心”。其市场保护举措虽遭到国内外人士及相关国家的强烈反对，但特朗普总统依然一意孤行，我行我素。我们不能只把特朗普总统对华贸易战视为口头上说说而已的一场经贸闹剧，而应把对华贸易战看成是对我的一场真正的挑战、冲击和威胁，是回归对华遏制战略的组成部分。

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是，特朗普总统打“经贸牌”是有准备、有预谋的，对中国的挤压尚未走到尽头，仍在不断扩大对华贸易制裁的空间范围。特朗普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备忘录涉及被征税的中国商品百余种乃至千余种，其金额达 600 亿美元，征收关税产业集中在 IT 和知识产权领域，主要涉及中国科技和电信行业。特朗普总统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 60 天内制定出新的投资条款，用于限制中国对美国科技产业投资及中国投资购买美国公司技术，并利用 301 条款，对中国信息技术、消费电子和电信出口设置障碍。特朗普总统声称将对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开出巨额罚单，寻求进一步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收购交易活动。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公开表示，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征收钢铝进口关税计划不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一些国家。^① 美国政府将“逐一案例”“逐一国家”，以“国家安全”评估为依据决定是否予以豁免。澳大利亚和韩国等盟国已陆续被纳入豁免范围，

^①其他国家主要指美国的盟国。

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美国关税计划打击的主要目标。

德国经济部长齐普里斯致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称，“欧洲和美国应该携手解决真正的问题，即导致价格下跌的全球钢铁产能过剩”，并说“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欧美团结一致，不能出现贸易冲突”。^① 这些话的意图再明白不过了，亦即欧美应共同对付中国。与此同时，欧盟领导人表示，进不了美国市场的中国钢铝产品不能转销到欧盟市场。欧洲专家警告欧盟勿撇开中国与美“媾和”，慕尼黑经济研究所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加布里尔·费尔伯迈尔说，“欧盟现在试图与美国做额外交易，我认为这很成问题。毕竟这涉及的东西比欧盟对美出口钢铝还要多得多”。^② 美欧矛盾本质上有别于美中矛盾，我们不能寄期望于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矛盾上。经济问题是这样，政治与安全问题更是不能把希望寄托于美国与其盟友间的矛盾上。

特朗普总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不是简单的“违约事件”。不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使美国能更加轻易地对我发起反倾销调查，使其 232 调查、301 调查、201 调查具有了所谓法律依据，借口中国以非市场化的手段损害了它的核心利益，因而可任意地提高关税。更有甚者，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有着否定我价值观、发展模式的考虑和算计。^③

以上种种现象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现象背后的意图是抑制中国继续发展和崛起，阻止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

二、回归对华遏制战略是美国共和党同民主党两党的基本共识

经过对华战略的内部辩论，美国各方承认对华接触战略失败。奥巴马时期“重返亚太战略”的制定者库尔特·坎贝尔称，“即便是那些对中美关系最乐观乃至抱有浪漫主义想法的人，都不得不去面对一个新中国”。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夏伟甚至表示：“中国人在美国已失去所有的支持。军人、媒体、知识分子和民众，最后乃至商人，都已经转向了。”^④ 这些言词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趋势性变化。美对华接触的目的是想改变中国，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体系中，用“接触”和“规则”套住中国。这种“接触”确实没有成功，更没能“融化掉中国”。相

①杰克·尤因：《美国的盟友争相从特朗普那里获取关税豁免权》，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8 年 3 月 9 日。

②尼古劳斯·多尔：《只有损害中国才可能靠拢美国》，德国世界报网站，2018 年 3 月 20 日。

③详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答记者问，21 世纪经济报道，2018 年 3 月 13 日。

④菲利普·热力：《美国在悄悄准备武器应对新的中国风险》，法国《费加罗报》网站，2018 年 3 月 11 日。

反，中国不断发展和崛起，成为成功的追赶者。《纽约时报》于 2 月底发表的评论说，“美国一直努力想使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来，期待中国的发展能促进其政治上的民主化。但是，中国的行动证明，美国的上述政策失败了。中国向民主主义秩序发起了新的挑战”。美国那些信奉“修昔底德陷阱”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到处宣扬一个大国受到另一个敌对大国崛起威胁的事件。从 15 世纪开始，几乎所有的霸权国家新旧交替都伴随着战争，只在 3 次例外。因此，“修昔底德陷阱”成为特朗普总统回归对华遏制战略老路的理论依据。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总统就曾直言“中国是敌人”“中国是最大的货币操纵者”；他发表的国情咨文报告将中国与俄罗斯并列为挑战华盛顿的“国家利益、经济地位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认为中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走向民主，而是会看到“一场大国竞赛”；特朗普总统后悔地说，“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错误”，全球化使中国成为“赢家”。上述种种言论已经对中美经贸关系乃至中美整体关系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在贸易方面，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加倾向于保护主义，支持特朗普政府对华实施遏制战略。因此，美国媒体宣称美国正在拥抱“二次冷战”，中美在高科技领域正陷入“冰封的技术冷战”，一些国际媒体亦称中美关系处于“新冷战”，处于“典型冷战关系的边缘”。

三、新形势变化下中国对美战略的思考与政策选择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着重点的变化，中国对美战略思考与政策亦应加以调整和改变。

首先，美国对华战略变化是美国反华派仇视中国的必然结果。美国对华“鹰派”指责中国没有按他们的意图“改变颜色”与“和平演变”，让他们感到失望。从我们的角度看，中国在与美国发展关系及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从来没有隐瞒过我们的政治观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而没有被“融化掉”。这恰恰表明中国做对了，美国把中国想错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选择了适合基本国情的发展模式，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美国的经济差距在逐渐缩小。鉴于上述情况，国内少数人对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变化的评估不够客观、不够准确。然而，大多数人却认为，在衡量综合国力的不少指标上，中国同美国存在差距，其差距不是短期内能赶上的。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进步，也要承认存在的落差。因此，今后国内的学者和媒体不宜再多谈美国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话题，衰落还是没有衰落以及何时衰落应由美国人自己去评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而在国内外宣传方面，似应避免说过头话，为人要谦虚，为国亦要谦虚。有人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篡改为“韬光养晦，息事宁人”或“韬光养晦，无所作为”，这是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严重歪曲。其实“韬光养晦”

与“战略忍耐”“战略耐力”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言与行都应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在十三届全国人大闭幕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时强调，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永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要牢记习近平主席的教导，在官方与民间交往中，不要现露出丝毫的“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心态。战后国际秩序是由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否定了它，等于否定了美国。国际秩序变革取决于“南北实力”对比的变化，改变和纠正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倡议和主张依然正确，无需改变和回避。但“新秩序”的建立离不开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础，其变革既要利于南方国家，又要考虑到北方国家的利益关切，否则“新秩序”难以建立。国际秩序变革涉及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我国不少机构和学者对国际秩序问题做了研究，但对当今国际秩序的表述上依然较为混乱，因而有必要拿出一个既坚持原则，又符合客观现实的统一表述，以避免西方国家产生误解。

特别重要的是，最近一个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和王毅部长对上述存在的种种问题都已作了明确的阐述。外事工作无小事，今后各方面的认知应与中央的表述相一致，宣传部门似应加强这方面的引导。特朗普政府更应及时抓住中国国家领导人传递出的重要信息，不要再抓住中国个别媒体和学者的观点作为反华理由。美国需要重新认识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共同推进新时代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而不是去组建什么更加强硬的反华集团，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制造麻烦和增添阻力。

其次，客观评估特朗普执政以来的表现，要多了解、多研究他的理念和行事方式。特朗普总统在第一年任期的表现并不完美，问题颇多，四面树敌，内外反对声愈益增高，民调的反对率和支持率起伏波动。然而，特朗普在选举期间做出的承诺大体上得以兑现，但有些承诺的兑现不顺畅，阻力很大，甚至被打折了扣；特朗普的国内外经济政策和理念看起来“无章法”，但实际上并不是“碎片化”，而是考虑到了各项举措间的相互关联性；特朗普从商人独有的逐利性思维出发，始终是“利益+利益”。特朗普的政治理念是保持“美国伟大”和“美国第一”。然而，世异时移，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他想保住“美国伟大和美国第一”并非易事，但他仍会以自己的方式运用安全与经济“两大拐杖”，努力操控世界朝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走。^① 在全球化时代，只想用“美国优先”保住美国利益而不去考虑他国利益和关切，这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站住脚，因而必然遭到国内外和党内外的反制。但特朗普就任总统后，赶上了一个好时机，即世界经济提速与

^①刘丽娜：《中美经济新博弈》，《中国证券报》海外视野，2016年12月17日。

扩张，加上所谓“特朗普行情”和“特朗普交易”的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奥巴马时期，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值。特朗普一直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国会中期选举及争取连任的筹码。但国际经济金融机构大多认为 2018—2019 两年世界经济增长或许将“触顶”，步入一场新危机，美国也难以摆脱“衰退—复苏—扩张—衰退”的周期。特朗普逆经济全球化，单方面挑起全球贸易冲突，有可能促使新周期、新危机比人们料想的更快到来。

从特朗普走过的人生道路看，他只崇拜强人，而不同情弱者，他的言行表露出“争强、好胜”和急于求成的个性，是位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的总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我采取“步步为营，咄咄逼人”的类似“朝鲜模式”的全面高压政策。我们反复所说的带有哲理性的话，包括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互利共赢，贸易战没有赢家，贸易战必将损害各国人民的福祉，有矛盾、有摩擦可通过谈判予以解决等等，特朗普一概听不进去，不予重视和采纳。对达不到他目的的谈判和对话，他说“停谈”就“停谈”，他说“停办”就“停办”。对特朗普来说，谈或不谈都只不过是形式而已，最终目标是中国必须满足他的高要求和高要价。特朗普的骄横不可一世，让国人难以容忍。特朗普是位强势总统，但不是无所不能的“大力神”，不能够主宰世界、支配全球。实际上，特朗普的日子并不好过，其命运和前途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面对特朗普总统摆出的“乐见贸易战”姿态，我们的政策选择大体有三种路径：

第一种选择是与美国对打“贸易战”，以硬碰硬。如果美国触犯到我领土主权核心利益，不仅要打“贸易战”，还要有毛主席那样的勇气“打大仗”，打完了再重建。假若特朗普总统继续“我行我素”，导致中美关系全面紧张和恶化，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将走向一条不归之路。但这种政策选择需要考虑大局和全局，必须谨慎、理性。我们就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当前，即便是打贸易战也难言一方“必赢”和“完胜”。理性之人始终多于非理性之人。国际社会有理智的人都希望中美能理性处理好矛盾与分歧，防止矛盾与分歧失控，避免把两国关系引向全面对抗与冲突。

第二种选择是对美贸易战做“被动、低调”处理。你想打，我不打；你说是贸易战，我说是贸易摩擦；你步步紧逼，我采取不大不小的反制措施；你不谈，我想谈。在还没有开始真正较量时，媒体上就已表示“我受美制裁的产品数量不多，冲击不大”“对我贸易和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等，并说受美市场限制的钢铝产品可销售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实际上，美单方制裁造成的损失难言不大。仅美对铝行业制裁，就使我铝箔厂商面临最高超过 186% 的“双反税”，再叠加 10% 的关税，这就意味着美国铝市场的大门将对我铝行业完全关闭。这种“被动、低调”行事方式使美对我更加咄咄逼人，要价越来越高，态

度越来越蛮横。这种政策选择不能持续下去。

第三种选择是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以斗求和、斗而不扩。一是实事求是。长期来，中国对美国贸易持有顺差，不管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贸易失衡，包括对原产地的认知不同及统计方法的差异，我们都应主动而非被动地去平衡。按美方公布的数据，2017 年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约为 7900 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 3750 亿美元。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特朗普总统最在意的就是美国存在巨额的贸易赤字。这是他对中国商品加税的重要原因所在。不仅对中国如此，他也同样要求日本、德国和韩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否则就要增加关税。美国财长姆努钦透露，“美国正在围绕贸易问题与中国开展非常有效的沟通。他们理解我们的愿望”“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有着减少贸易赤字的共同目标”。^①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3 月 20 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回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问时表示，“我们不愿意看见有比较大的贸易赤字，不仅是对美国。我们希望贸易总体平衡，否则的话难以持续”。李总理还对美国的利益关切作了明确表态：中国将继续推进扩大开放的具体措施，包括在服务业、制造业、商品等领域。但李总理同时强调，“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放宽对华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我们会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希望美国不要丢掉了这个平衡中美贸易的重器，否则就是丢了赚钱的机会”。

当下，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应该充分意识到，为了实现贸易总体平衡及缩小对美贸易顺差，中国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出台了许多有针对性的举措。包括：建立外向型经济体制；降低进口关税；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重申“中国进口要大于出口”；大幅提高服务业开放水平，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在一些领域放宽或取消外资股比限制，放宽或取消经营范围限制；实施对外投资分散化等等。这些具有建设性的举措，明确无误地告诉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中国正在继续设法解决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从措施出台到其成效显现总会有一个过程，而且纠正贸易失衡需要一个过程。然而，特朗普总统太过于重视眼前利益，看近而不看远，把中国推出的建设性、有效性举措视为“画饼充饥”，迫不急待地要求中国减少 1000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包括大幅下降美国汽车关税、多进口美国芯片、对美开放金融市场，等等。

鉴于中国已经释放出足够的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信息，出台了管控中美贸易关系失控的系列政策，因此，我们不能接受美国单方面提出的种种要求，包括减少贸易赤字的目标。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保护基于一种错误的认识，即美国贸易逆差是其他国家不公

^①迈克尔·德比：《美国不想打贸易战，但要捍卫自己的利益》，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8 年 3 月 9 日。

平贸易造成的，因而把贸易逆差的责任推到他国身上，特别是中国头上。实际上，制造贸易战的那些人心里明明白白，长期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投资率高于储蓄率，导致资本项顺差和贸易项逆差。如果内在结构不变，贸易结构不调整，尽管特朗普把偏软的美元和贸易保护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两个抓手，也难以根本消除贸易逆差。解决结构性的失衡，需要注重长远发展，循序渐进，共同做大贸易蛋糕，而不是美方单独切走一块蛋糕。美国有美国的利益，中国有中国的利益，不能只满足美国的利益要求，而不考虑中国的利益关切。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美国需要时间在国内征求各方意见，延长了对我商品加征关税的期限，并表示愿意坐下来进行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称，“中美双方有希望通过谈判来避免关税冲突”。在谈判过程中，美国应放下“执法者”的身段，不要只强迫中国妥协，不满足要求就制裁、就惩罚。有效的途径是有问题、有矛盾进行平等协商，别无他途。一般而言，贸易失衡是结构性问题，而非主权核心利益，应能通过互让互谅寻求最佳利益的平衡。对特朗普来说，时间不多了，如果不能在 2018 年 11 月前让“贸易战”停下来，恐怕不利于共和党中期选举。对中国而言，要减少顺差，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整同周边国家的产业链，还要有足够的时间在国内做好减少顺差产生的后续影响。解决中美贸易失衡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方案。

然而，我们担心的是美国反华势力挑起的贸易战，因为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逼迫我减少货物贸易出口，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图阻止我们利用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中国政府一向十分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越来越多，在世界排位不断前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中国科技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特朗普总统不仅要对中国投资美国敏感技术予以限制，而且要推动瞄准中国的更加严格的投资审查。德国新任经济部长彼德·阿尔特迈尔说，中国有些企业“没有充分尊重知识产权”，德国不仅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者特朗普，而且也要对抗作弊者中国。^① 如果有个别中国企业确实涉嫌侵犯他国知识产权，就应接受相关方处罚。中国对境外在华投资企业亦应这样，对违犯相关法律法规的外国企业加以惩罚。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知识产权对外转让有关工作办法》，规定对技术出口、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等活动中涉及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行为进行审查。这是针对外国审查做法的一种对等措施。近年来，由于非理性对外投资减少，投资行业结构不断优化，中国境外投资依旧保持强劲势头，任何国家及

^①托尔斯滕·里克：《被中美卡住了脖子》，德国《商报》2018 年 3 月 26 日。

势力集团都阻止不了中国技术的崛起。

二是坚持原则。国际贸易的往来是建立在比较优势、互通有无和国际分工基础上的，不存在中方强迫美方进口中国产品的现象。中国亦然。中国以市场换技术，要求在华投资企业转让技术不应成为美国对中国施压和制裁的理由。投资者有投资“三性要求”，即安全性、获利性和变现性。受资国或企业同样有自己的要求，你接受要求就来，不接受要求就罢。技术有它的生命周期，在技术处于鼎盛时期，即大赚钱时期，技术掌控方不会将技术转移出去，核心技术只有靠自己去研究、去发明。实际上，以市场换技术，并没有换来关键核心的技术，因此，要求境外在华投资企业转移技术已无实际意义。

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声称“乐见贸易战”，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及实行全面强硬的遏制战略，涉及到国家关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作为既受国际社会重视，又受国际社会尊敬的中国，不能不发声，必须组织力量做出有说服力地系列反应，否则有损中国国际形象，有损国人尊严，不利于国际贸易秩序的维护。如果特朗普总统对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行不作改变，不作反思，继续坚持对中国打“组合拳”，那么中国只能以“组合拳”予以应对，做出其不意的“精准打击”。

三是以斗求和。该让的让了，该反思的反思了，该反制的反制了，对原则和是非问题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了，那就不必再持过于僵硬的态度，谈判就是寻求相互利益的平衡。王毅部长2018年3月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两会新闻中心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在全球化的今天，选择贸易战是抓错了药方，中方必将做出正当和必要地反应”，并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共同找出一个互利双赢的办法。

四是斗而不扩。这场贸易战由美国单方面挑起。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相向而行，通过有效沟通，减少形势误判，避免贸易战升级，坚持谈判协商，化解分歧，互谅互让，把贸易摩擦限定在经济范围之内，不使经贸关系影响到中美其他领域的关系。这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双赢而不是双输的结局，有利于中美经济，有利于世界经济。但是，中美关系的全面改善，尚有待于特朗普政府放弃对华遏制战略，否则中美经贸关系难以稳定，矛盾与冲突将会一个接着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华接触战略已告失败，对华遏制战略亦难奏效。

责任编辑：谷 岳

刍议科研创新的规律与科研生态的构建

贾 康

摘要：本文研讨了科研创新五个方面的规律性特点，即其革命性作用、巨大的不确定性、共性规律外的个性规律、创新人才的关键意义，以及科研突破与“少数服从多数”和官场行政规则的不相容，进而提出了合理构建科研生态的五条基本要领。

关键词：科研创新 规律 科研生态

作者简介：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所）原所长、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一、关于科研创新的基本规律

探讨科研创新的基本规律是一个宏大的题目，探讨的意义在于认识相关规律、有利于搞好科研、服务社会。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科研实践经验中提炼出如下几个和科研创新有关的规律性特点。

第一，科研创新一旦成功，会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谈到：“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 邓小平同志早在“文革”末期复出时就曾提到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有这么一个基本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当时特别希望能够务实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他意识到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科技的作用是摆在最前列最重要位置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并在1988年9月间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①

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认识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原理层面的支撑，更有大量的反复发生的实际生活现实的印证。从学术上的解说，什么叫第一生产力？不是在生产力传统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上做加法，再加上第四要素——科技。而是在传统三要素的框架上这个科技施加上去，是个乘数，是做乘法，是放大。西方经济学者所提出并被普遍接受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索洛余值”，是强调比较容易量化的其他要素贡献测算以后，多出来的那一块虽然难以量化，但它内在一定是科技的作用在主导。^②这个主导作用是革命性的，是影响整个发展潮流、影响全局的。所以，它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学上还有个概念，就是科技一旦成为影响社会的推动力量之后，它有“正的外部性”。一个科技成果的应用，在实际生活里如果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说，需要有一定的专利保护期，这种保护期是有益于发明者的物质利益从而鼓励创新的，同时它又有限度，一般来说50年是最高限度，50年以后就变成无偿使用，即纯粹的公共产品。而在此之前，虽然有专利的保护期，其实也不能否定它还有外溢性，它在给创新者本身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会助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使经济更繁荣，社会更能够适合人们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当我们将对科研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之后，就有了重视科研，并把它上升为第一生产力的学理依据。

第二，从实践看，科研创新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科研创新要成功，既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持，又需要人文环境“润物细无声”式的养护。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可先从基础理论层面说起。曾有一位中国科学界很有成就的老科学家说：“我过去在科学界的贡献全世界都承认的，是在古地质学领域论证地中海在远古的时候曾经被蒸干，后来重新蓄上了水。这套论证全球的科学界都接受了，但是我困惑的是这样一个研究结果，和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一个成果出来了以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在什么地方？”“我也曾问过丁肇中，在高等物理学方面的创新认识和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怎么体现？丁回答说说不清楚。”因此，可以说，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能不能研究出来是不确定的，即使研究出来后它到底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福祉也是不确定的。又比如爱因斯坦的公式刚公

^①孙晓倩：《1988年9月5日，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普中国网，2015年9月5日。

^②彭鹏、贾康：《从新供给视角重新梳理和解读全要素生产率》，《财政科学》2016年第3期。

布于世的时候，全世界几乎只有 10 个左右的人能看懂，但是现在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已为世人所公认。狭义相对论直接引出了人类社会的核能时代；而广义相对论，原来认为是更虚无缥缈的一种理论探索，现在却同引力波等的天文观察验证连在了一起，越来越成为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重点。这就是科研启始之初的不确定性。在目前，还可能有很多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还不知道其会对人类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另一个层面，从与互联网创新相关的开发性、应用性成果来看，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电商已被称为是“风口上的猪”，没有翅膀也能一飞冲天了。这方面科学技术成果的研发应用，在中国本土已经产生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三巨头又加上京东，但这种“风口上的猪”成功的旁边还有很多的失败者。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北京公主坟环岛周围的写字楼里，就有一大批市场一线的企业人士，在努力地跟着互联网做创新，是直接面对市场的，但是那种创新的不确定性，等于是在烧钱，在比着谁能烧出最后一个成功的结果来。当时带领头的企业叫“瀛海威”，现如今可能很少有人还想得起这个企业的名字了。它的带头人是一位女企业家，虽然后来这个瀛海威公司没有多么成功，换句话说它在创业之路上与阿里巴巴比显然是失败者，但是这位企业带头人在业界现在仍然很受尊重。大量的失败者是在马云等成功者的旁边默默无闻的，他们面对的就是这个“不确定性”，他们最后的归结不是成功，而是失败。与成功者相比，失败者是大多数，而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失败、容忍失败、理解失败者。不要只是天天称赞马云这样的成功者，那些在前面试错、开辟道路的失败者如果能够得到比较足够的人格尊重，得到容忍失败的相关机制，就有可能从头再来，像史玉柱式的东山再起。这对于整个社会鼓励创新的意义可能更大。这是从应用性成果的角度来考虑科研的规律性特征。

第三，科研创新在共性规律之外存在明显的个性规律。科研虽然存在一些共性的规律，但是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显然还有明显不同的个性或者叫做特殊性概念下的规律性内容。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性研究、成果产业化的研发，各个层面上的规律都存有个性化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在打造总体的支持性的科研生态概念之下，那就因此有了进一步的挑战性任务。现在决策上特别看重的供给侧的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前阶段我们讲供给侧改革，是要解决制度环境、制度创新给出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空间的问题，接下来在具体实施中，要设计以形成有针对性的（定制化的）有效供给体系和机制，在政策制订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各种各样的个性规律，而不仅仅只是拥有一个“宏观调控”的概念框架。宏观调控概念下，过去被人们所推崇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是一

个很简洁的认识框架：比如经济生活总体看热度偏高了，就要收缩流动性来降温；反之如果它的状态表现为低迷了，景气需要抬升，那么就要实行刺激政策往上升温。总量型的调控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反周期，非常简洁易懂。但是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强调需求管理总量调控已经不够了，一系列挑战性的问题都出现了。^① 相关结构问题如此复杂，指标不可通约，怎么掌握好促使结构合理化的机制，政府和市场在这里面到底怎样发挥各自应起的作用，怎么优化结合，是非常复杂的。过去大家已普遍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政府和市场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即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但现在为什么要把政府和市场主体又放到一起，以伙伴关系实行合作的机制来从事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国土连片开发，并作为一个创新重点呢？这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现在又认识到政府和市场不可简单地划清边界、井水不犯河水，而需共同在法治化的条件下找到一个可持续的伙伴合作运行机制，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绩效。这是供给侧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融资模式的创新，当然还伴随着种种技术创新，合在一起成为特定的系统化的供给体系和机制。与此类似，科研创新方面从政府为主支持的纯基础理论研究，到更多依靠非政府主体的应用性研究，再到直接面对市场的以企业为主的成果产业化研发，继续细分的话，还有更多的一些定制化的形成认识与政策设计。这也是我们必须认同的要顺应复杂规律、寻求解决方案的挑战性问题。

第四，寻求科研创新成功，最宝贵的关键性的资源是创新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需要友好的科研、教育生态。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天下无贼》里有一句名言，21 世纪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人才。真正可做到科研创新成功的，是“关键的少数人”，特别是知识价值创造型的领军人才。而他们在实现某一领域、某一课题、某一关键技术成功突破之前，在相关的讨论场合、科研活动、创新团队中，往往是“少数派”，甚至是相当孤立的、很难“合群”的状态，不仅不受重视，还可能遭排斥、受打击。这种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在突破性的科研领域可遇不可求。往往某些重大突破是依靠一些特殊的人才，靠他们的好奇心、灵感和执着，再加上一定的偶然性（就是人们所说的运气），来生成具有突破性的小概率事件。现在很难设想还有像爱迪生那样一生可以有几千项专利的创新型人才，当然他的成果主要还是应用层面的。在基础理论层面，一生能有一个突破就是伟大的科学家。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得到培育和重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很现实的问题。真正可领军的可遇不可求的创新型人才，以及各个层次的、在某一个局部、某一个行业

^① 贾康：《供给侧改革十讲》，东方出版中心 2016 年版。

创新型的骨干人员，这些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到底怎么样能够培养出来、生长起来？人才的重要性及其产生机制，是与科研相关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性问题的组成部分。能够让创新突破领军的大师级人才涌现出来，就要具备适应这种极小概率事件的所谓科研生态——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形象化的说法。有了这样一种适宜的科研生态，未必就能够确定在多长时间之内产生大师；但是反过来讲，不具备基本的科研生态，就一定没有产生或者找到能够“为我所用”的这种领军人才的可能性。所谓启发式的教育、思想的自由、环境的包容都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古代有为人们所称道的四大发明，但到了工业革命这个阶段，我们在科研创新方面落在了后面，而且被甩在明显落伍的距离。落伍的原因属于“李约瑟之谜”，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与我们过去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里对于创新型人才不能够提供适宜的科研生态有内在的关联？科举制度，可以说有一些正面的因素，但它主要是培养现在所说的文科人才，而对理工科的人才方面，则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培养环境和机制，整个社会“学而优则仕”，主要就是走八股文、科举之路。再加上其他各种各样不适合创新人才创新发展的因素，导致近现代中国科技创新的落后。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教育体制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也走了不少的弯路，“文革”时期还荒唐的取消了高考。改革开放之初恢复了高考，第一次恢复高考时考生中只有不到 5% 的人上了大学，现在已经达到 75% 即 3/4 的人参加高考以后就能够上大学，但同时却又产生出对高考负面问题的思考。被人们普遍指责的应试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准备应试，一直到上大学，学习者思想上的那些创造性潜力已经在重重考试的过程中被磨掉了，更痛惜一点儿的说法，他们的潜能已经被毁掉了。这种情况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第五，科研突破与“少数服从多数”、官场行政规则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科研主体相对于后者的气场和力量，一定是很弱势的。个别的领域里，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也有创新成就，比如陈景润在 1966 年就发表了《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 $1+2$ ”），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这是一个数学上的认识突破。但是当时的陈景润只是在中国科学院宿舍的一个小拐角厕所内蜗居着，身体和精神状况几近到了崩溃的边缘。近些年，我们科研的环境已经大大改善了，但是一线科研创新人员同样碰到了诸多的苦恼。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一定要消除科研领域里的繁文缛节。2014 年，时任政协主席俞正声也明确地说，不要把八项规定里用来约束官员的一些规则，简单地套用到知识分子头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015 年之后依照官本位、行政化规则的这种套用，曾经大行其道，几乎包括所有的体制内的各项工作系统，包括高校、科研单位等，都开始了“加强管理”。以至于李克强总理在 2016 年到北大、清华调

研视察的座谈中，在公众场合直截了当地发问：“教授、研究员出去坐高铁只能坐二等座，坐飞机只能是经济舱，这都是什么规定？”因为按照现行规定，若没有行政上的司局级级别，哪怕是用自己承包性质的横向课题的经费，外出开会、调研等乘高铁就只能坐二等座，一等座是不许坐的；如果没有行政上的副部级级别，在国内出差的话，乘飞机就只能坐经济舱，而不能坐公务舱。在过去几年没有这么严格规定的时候，一些做横向课题的科研人员在出差时有坐了高铁一等座或飞机头等舱的，并且票据已经报销了，怎么办呢？要退赔。在某高校审查横向课题报销单据时，要让课题负责人在每一张餐费报销单据上一一注明是和某某某吃的饭，然后以人均 50 元封顶，超过 50 元的费用即使已经报销了也要退回；按规定市内交通费一天 80 元封顶，可是从市内打车到首都机场需 100 多元，80 元以上部分已经报销的要退出来。中央现在重申：科研人员应该有 5/6 以上的时间专心用于做科研。但是在现有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为应对检查，当时高校里的课题负责人都要派自己的研究生、学生在教务处的楼道里彻夜排队，来处理科研经费报销“过头”的问题，还要写很多的思想认识汇报，要检查自己的错误，做各种各样的表态，要接受各种各样的压力。

李克强总理对这方面有所察觉，在 2016 年的上半年，国办专门发出了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文件，非常明确地要求不能拿官本位行政化这一套东西去套科研人员和知识分子。社科界网站、新华网，也全文刊载了这个文件。这种用官场行政规则来套科研领域的管理方式，一定是严重打击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在 2016 年时就传出，一些学术带头人不愿再接新的课题了，也就是不愿惹那些经费报销又退赔等等的麻烦。这反映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问题，更有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人格尊严问题。

2016 年的下半年，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就是要解决科研创新一线人员所苦恼的问题，而且明确要求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在 2016 年年底，有关部门要推出相关的实施细则。但是，在中国现时的条件下，这个问题要得到真正解决，必须有审计和纪检部门的认定。这就是中国现实的特定制约。

二、关于“科研生态”合理构建基本要领的探讨

如果从正面考虑“科研生态”构建的基本要领，可以强调这样几条。

第一，鼓励、支持创新主体（自然人）以好奇心和科研情结、奋斗精神去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前面已提到一些例子，面对不确定性这方面，要给予科研创新者以理解和鼓励。比如屠呦呦，她的科研突破是在“文革”期间，她依据古代文献里的一条线索，

经过几百次实验，终于把青蒿素的有效成分萃取成功。几十年以后，美国有关方面通过全面调查，认定与这个能挽救千百万人生命的成果相关的最关键的贡献应该归功于屠呦呦，因而授予她诺贝尔医学奖。随后国内也授予她 2016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种对于自然人的关怀和鼓励，对于成功者给予的奖励，其实是在向社会树立标杆和导向。但在科研人员所研究的成果成功之前，一定要特别理解、关照他们那种跟一般人不同的好奇心与科研情结、奋斗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努力。这是科研生态中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于那些一时没有研制成功的科研人员，也要将他们作为探路者、试路者给予必要的肯定与人文关怀，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和新技术成果应用的开拓领域，应形成充分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政府应该成为“不动声色”“润物细无声”的引导者与扶助者。

第二，政府主体方面的关键性支持作用，应该处理为以包蕴人文关怀和物质支持的制度和政策，来分类地支持不同的科研创新活动。比如基础理论研究的很多东西是没办法拿出一个像模像样的成功成果认定的，对此应匹配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国家的资金有限，如何用有限的资金来支持哪些项目是需要不断摸索的。摸索的要领也很难用一两句话说得清楚，即使依靠现有的比较前沿的科学家们问卷打分的方式，也会出现一些过于保守的偏差。比如问卷打分的结果有可能把真正有潜力的创新项目否定掉了。因而对创新科研领域必须制定可操作的经费支持和使用的规则。到了成果转化推广应用阶段，相对而言支持机制就容易制订一些，比如现在已经有事前、事中、事后政府支持规则的较多探讨和值得肯定的一些进展。如果仅从“事后”看，除早就有了比较成熟经验的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制度之外，还有股权激励制度等等。现在中央已有权威的文件指导，就是有科研单位的个人可以在保持单位正式身份的同时，去参加创业创新的市场活动。这方面还需要匹配上到了成果转化、市场化应用环节阶段的专利，所谓“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的经验。这些经验需要依法使之贯彻落实、有效执行。政府要以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研发投入的所得税抵扣优惠、产业引导基金等等这些机制去支持成果转化应用环节上的创新发展。

第三，从企业这个角度上，要有鼓励企业家们充分发挥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冒险精神、敢于大胆试大胆闯相适应的机制。对这样有胆识和独特的企业文化，社会各方应当给予理解。应该讲企业家也注定是带有明显不同于常人特点的一类人。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已经完全不需要再为稻粮谋了，他们是有更高级的追求，这同样需要有冒险精神、有闯劲儿、要大胆实验等等。这也属于继续在“烧钱”，只不过由于有些运气因素或有些特定的技术路线上的不同，一个可能一飞冲天，另一个可能归于失败。因此，这方面也需要有相关的管理方面的一些机制，使这种试、闯的空间更开阔些。李克强总理在说“鼓励创

新就要审慎包容”时，专门提到几年前讨论微信的生存时，有一派意见说微信的弊病很明显，会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和漏洞。但李克强总理的态度是，不能把微信一下子掐死，要给出一定的空间，让它在发展中再观察。到了现在，微信不能说已十全十美，但是已没有人敢把微信否定掉了。微信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确实也有机制上的作用。据了解，微信这个技术最早是中国移动掌握的“飞信”，但是作为国有企业它没有运行机制来承担“烧钱”烧到多大能够成功。在体制内发展你每走任何一步都要经过层层审批，“烧钱”如不成功责任谁来负？顾虑重重，很难批准，但如果没有这个鼓励烧钱的机制事业就不大。另外一个现在风生水起的快递业中的顺丰也是一飞冲天，但是最早在这个领域里捷足先登的，可是体制内中国邮政的EMS特快专递，但是它也没能做得很大。至于说风投、创投、天使投，为什么不适合由政府做？就是机制问题。风投、创投、天使投是内在于硅谷经验的，它的有限责任和它的比较优势，是国有企业体制内学不来的。对企业家、创新者的宽容方面，其实有些事情很简单。硅谷表面上看不到政府有多少作用，但这就是它的人文关怀的一种大格局，就是它符合科研规律方面我们必须注重的经验。并且要以文化和舆论的包容性，来宽容、理解、消化失败冲击。

第四，社会上的科研生态建设除了应形成宽容失败的氛围与“有限责任”等规则之外，公益性基金会的多样化支持十分值得重视和发展。许多不适合或难以做到由政府直接支持的基础性研究、风险型开发研究项目，多样化的公益性基金会却有可能提供支持资金。这个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在美国早就做得相当大了，在中国亟应重视和培育，要促其健康发展起来。

国际上可给我们启发的还有一些案例，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瓦特发明蒸汽机能够引发成功是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社会配套条件的，包括这项发明以后怎么样能得到规模化的应用，如果没有当时的产权保护制度和法律规范的配套条件，没有制度环境这种适宜的“科研生态”，是不可能演变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①“硅谷的故事”前面已说到，高下之分其实是在润物细无声这样的比较之下。

第五，改革的攻坚克难对于构建好的科研生态至关重要。前面所说制度创新在打开可能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潜力空间方面要起龙头作用，以制度创新为龙头，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解放生产力，使中央所说的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创新发展，真正能够引领后面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人本主义立场上的人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大地上现实的共享发展。这里面的逻辑应该讲是相当清楚的：这样的科技创新在

^① 贾康、苏京春：《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

第一生产力意义上，在中国条件下，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仅就科技谈科技不解决问题。吴敬琏老师多年前就讲到，要强调“制度高于技术”。^① 如果意识到改革任务的重要性，这句话的积极作用就非常明显。

科研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一个很难做的要点是去行政化的问题，谈了多少年，这一轮科技改革又在谈。目前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是改来改去，行政化的东西不是少了，感觉是更多了。直率地讲，科研单位怎么符合所提出的事业单位改革的大方向？改革实际落入了“说一套做一套”的状态。当年有非常明确的文件下达，要求体制内科研单位、事业单位，以三年为期要完成改革，基本原则就是去行政化，要一直走到取消行政级别，与社会需要接轨，人员可进可出可上可下。但后来呢？文件要求的这些都没有兑现，一直到现在，反而是越来越严格地按照官僚机构的方式来管理体制内的科研单位了。

所以，我们现在寄希望于在十九大之后能够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配套改革里所有值得肯定的顶层设计作为基础，进一步给出实质性地冲破既得利益阻力、深化改革的全盘指导，实质性地搞好科研事业单位和高校的改革，使科研人员真正能够在好的科研生态环境中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贡献于中国的现代化和人类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孙晓倩：《1988 年 9 月 5 日，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普中国网，2015 年 9 月 5 日。
3. 彭鹏、贾康：《从新供给视角重新梳理和解读全要素生产率》，《财政科学》2016 年第 3 期。
4. 贾康：《供给侧改革十讲》，东方出版中心 2016 年版。
5. 贾康、苏京春：《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版。
6. 吴敬琏：《制度高于技术——论发展我国高新科技产业》，《决策咨询》1999 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谷 岳

^①吴敬琏：《制度高于技术——论发展我国高新科技产业》，《决策咨询》1999 年第 4 期。

我国自由贸易区的溢出及 协同互补效应研究^{*}

陈金明 施楠 任再萍

摘要：本文从四大自贸区协同发展的视角出发，对沪、津、粤、闽四大自贸区的协同互补性及区域溢出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运用 Dendrinós-Sonis 模型对四大自贸区之间的溢出效应及竞争互补效应进行了测度。得出结论是：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促进了本地经济发展，并且对天津和福建自贸区的溢出效应明显；自贸区成立产生的沪、津、粤、闽之间的协同互补效应要大于竞争效应。

关键词：自贸区 区域协同互补 Dendrinós-Sonis 模型

作者简介：陈金明，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施楠，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任再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继我国上海自贸区 2013 年成立之后，2015 年 4 月 21 日，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天津、广东和福建三地同时揭牌。2016 年 8 月，商务部披露了党中央、国务院新设立第三批七个自贸区的决定。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推进，我国开启了新一轮以开放促改革的进程（张幼文，2016），一个新颖而又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随之浮出水面。如何发挥以上海自贸区为主导，天津、广东和天津自贸区的带动和示范作用，以释放单一自贸

^{*} 本文为 2015 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上海自贸区与津粤闽自贸区联动发展研究》（2015BJB002）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区的地理限制，扩大自贸区溢出效应；如何在这一进程中避免区域间的盲目竞争，促进其协同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界对于自贸区的发展及相互间的协同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互补及空间引力论。认为区域内的参与成员由于资源禀赋存在差异，通过贸易实现资金、技术、劳动力、管理经验等要素的互补，在区域内实现自由化贸易（Bela Balasa, 1973；Peter Robertson, 1989；Tinbergen, 1965）。McMallum（1995）和 Helliwell（1996）把引力模型运用到贸易流量分析，认为一体化会削弱边界效应。Siriwardana&Yang（2008）利用四种情景假设，分析了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的经济效应，认为中澳自贸区将给两国都带来福利的增加。杨云母（2011）认为，中日韩自贸区尽管各自涵盖的地理范围不尽相同、合作方式各异，但同为东北亚区域局部经济合作，彼此并行不悖，相互补益，可以促进地区整体繁荣。冯宗宪、赵立伟（2013）从经济空间场理论出发，重新定义和分析了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经济边界效应，并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第二，平台经济论。科斯（Coase, 1937）认为，本着交易费用最小化原则，区域内会形成长期的组织关系，来协调组织内的经济活动。弗里德曼（Friedman, 1986）提出的“世界城市假说”认为，这些城市为经济发展提供平台，起到全球资本空间组织“基点”以及生产和销售“节点”的作用，是国际资本主要汇聚地。Inkyo Cheong（2004）认为，自由贸易区域内不存在贸易壁垒和障碍，并且在该区域内实现契约和组织上的一致性，为实现经济一体化提供了重要平台。周子恒等（2004）、Bouet 等（2012）、Fadeyi 等（2014）通过对亚洲、拉丁美洲、南非等相关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几乎全部成员从一体化中受益，而且拉美相关国家受益更多，对南非共同体（SACU）成员间农业贸易有促进作用。张幼文（2014）认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试验的核心在于，以改革与开放的协同创新，构建与经济全球化最新发展趋势相兼容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晁钢、王涛（2013）从“全球城市”和“平台经济”理论出发，从上海自贸区对上海建设“平台经济”城市的促进作用等方面，论述了上海自贸区设立的意义。

第三，辐射论。大部分国外学者从地缘角度研究提出经济发展的辐射理论。20 世纪中叶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 1955）提出增长极理论，认为中心地区通过创新优势和功能优势把周边地区资源吸附进来，产生极化效应。赫希曼（Hirschman, 1958）认为，经济发展中心区域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向周边地区梯度转移，即辐射效应，也即“核心—边缘”论，认为在贸易自由化对中心地区和周边地区都有晕轮效应，形成一点带面

的区域优势，即涓滴效应。缪尔达尔（Myrdal，1957）、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Lucas，1988）认为，把握“扩散效应”“溢出效应”与“回流效应”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学者近年也对此领域加强了研究，成思危（2003）从贸易便利、物流布局、先进管理与技术对腹地经济发展方面阐述了自贸区对周边的推动作用。陈琪、刘卫（2014）认为上海自贸试验区集聚经济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具有辐射效应、指引效应和示范效应。王家庭、孙哲（2014）认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开放红利”激发“改革红利”，定然会带来巨大的辐射效应，对母城的辐射效应体现为促进产业发展、社会资本外溢，而对腹地则提供了示范效应、物流便利条件、信息传递及贸易优良环境。

这些理论对自贸区的发展起到理论支撑作用。由于我国自贸区成立较晚，对于沪、津、粤、闽自贸区在差异化中如何发挥协同联动效应鲜有研究。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标，也是七个自贸区设立后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研究自贸试验区发展的重要部分。

二、沪津粤闽四大自贸区协同发展机制分析

（一）自贸区建设以开放促改革与制度创新，增进区域协同发展

自贸区建设，改变了以往各特殊监管区之间政策平台的竞争方式，转为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政策共享平台的各特殊监管区合作方式。2015年4月20日，国务院印发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进一步深化改革上海自贸试验区方案，印发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方法。至此，四大自贸区共享一张负面清单，各自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也将在其他自贸区得到复制。

自贸区建设，通过方方面面提升了政府服务质量与效率。例如，随着自贸区建设的推进，构建与之相应的监管体系被提上日程，构建政府信息共享平台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自贸区建设将为全国带来新一波改革红利，相关举措的落地将在更大范围推广，可以在全国形成更进一步的开放，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

（二）各自自贸区差异化发展，实现产业及市场互补

与上海自贸区侧重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的定位不同，津、粤、闽自贸区的产业侧重点各不相同（周汉民，2015），面向的市场也有很大的区别。天津自贸区面向广阔的东北亚地区市场，立足京津冀地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冯怡康等，2016）；广东自贸区则面向港澳地区市场，把侧重点放在了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福建自贸区则面向台湾地区市场（伍长南，2015；朱斌，2006），经济意义与政治战略同等重要，侧重于推动两岸经济贸易往来持续稳定地合作发展。沪、津、粤、闽四大自贸区“各司其职”，各有不同的定位及市场侧重，以第一批成立的上海自贸区为中心，带动津、粤、闽三大自贸区协

同互补发展，并为第三批自贸区之间协同发展探索经验。自贸区对产业群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上海自贸区及其他三大自贸区区内产业集聚和优化升级在稳步推进（涂文明，2008），在上海自贸区经济辐射作用下，不断提升京津冀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及海西经济区的整体功能和综合实力。

（三）自贸区建设通过投资、贸易、金融、航运、人员等领域自由往来实现互补

由于沪、津、粤、闽四大自贸区核心港口的地位及定位不同（表 1），其对应的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以及海西城市群的城市发展程度以及各产业的发展现状也有差异。正处于港口城市自增长阶段的上海港、宁波—舟山港拥有完善的物流信息系统及资源共享机制，同时上海正致力于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上海自贸区与津、粤、闽三大自贸区相比，发展更为成熟健全。所以，在沪、津、粤、闽四大自贸区“港口—产业—城市”协同发展中，上海自贸区处于主导地位，对其他自贸区发展起辐射作用（王珍珍、黄茂兴，2013）。

表 1 2015 年中国沿海规模以上港口前 10 名

排名			港口名称	2015 年 （万吨）	2014 年 （万吨）	增长率 （%）
2015 年	2014 年	走势				
1	1	→	宁波－舟山	88900	87347	1.78
2	2	→	上海	71740	75529	－5.02
3	6	↑	苏州	54319	47900	13.40
4	3	↓	天津	54051	54000	0.10
5	5	→	广州	52100	50036	4.12
6	7	↑	青岛	49749	47700	4.30
7	4	↓	唐山	49000	50080	－2.16
8	8	→	大连	41500	42300	－1.89
9	9	→	日照	36100	35323	2.20
10	10	→	营口	33800	33400	1.2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在自贸区最为瞩目的金融领域产业协同方面，四大自贸区可以以上海自贸区作为先行试验田，协同粤闽自贸区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等金融产业创新业务（刘东方，2015），同时与天津自贸区金融监管业务及交易市场培育业务进行金融产业内的协同合作发展，以此实现继各大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双向资金池等业务运营成熟后，使得各个

自贸区内注册的企业都有机会在所有自贸区享受各种金融产业的创新业务。

在自贸区内，就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问题，国家先行先试了一系列创新举措，这对于四大自贸区如何协同管理外商投资、如何进一步提升进出口总值都是一大进步。从图 1 及图 2 可以看出，自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四大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及注册登记数都有了急速增长态势，同时四大自贸区进出口总值也有着整体稳增趋势。相较于其他两个地区，上海及广东自贸区拥有着更为丰富的金融市场和外资资本，这是由于早先在区内施行的特殊税收政策及负面清单等措施，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进行投资，设立了众多的外商投资企业。借鉴上海及广东自贸区的先试经验，天津及福建自贸区凭借自身政治战略优势，面向东北亚及台湾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及吸引外资的程度，实现了外商投资大幅增长以及区内进出口总值稳步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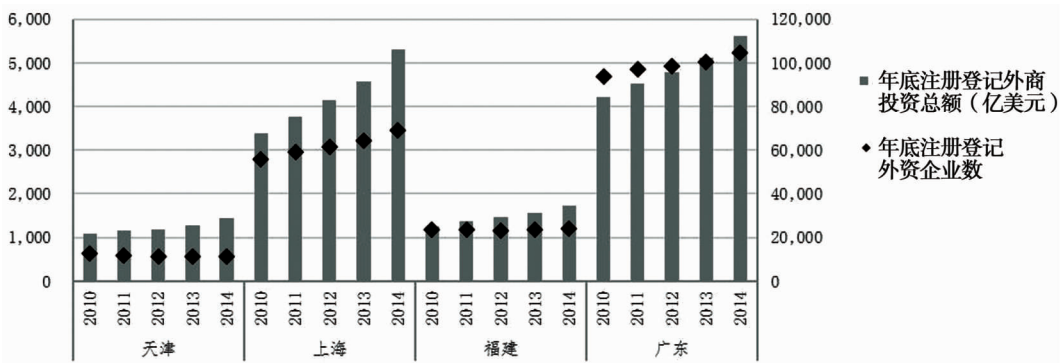


图 1 2010—2014 年四大自贸区外商投资统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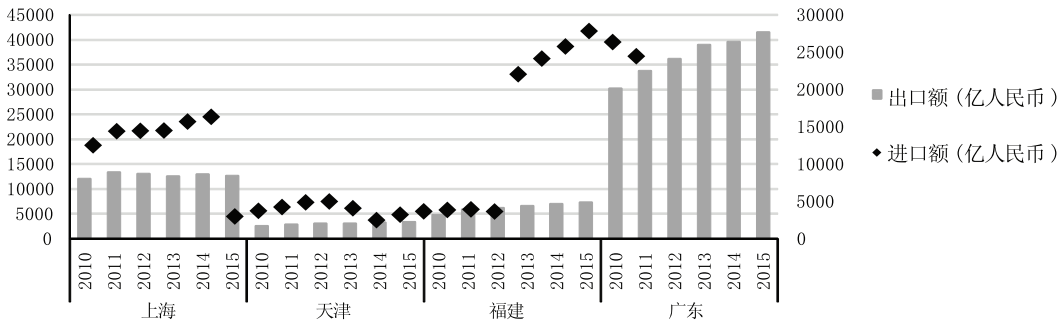


图 2 2010—2015 年四大自贸区进出口数据统计图

三、沪津粤闽竞争互补关系测度模型

（一）Dendrinos—Sonis 模型

现存文献中有较多研究区域经济关系及增长的方法（娄文龙，2014；周立群、夏良科，2010）。本文梳理发现，国内外众多学者在研究区域间关系及区域经济增长问题上，

借助了 Dendrinós – Sonis（以下简称 D – S）模型（Bonet, 2003; Postiglione and Hewings, 2008; 朱列, 2008; 苏方林、侯晓博, 2010; 危曼华等, 2012）。通过本节的模型介绍与修正, 我们认为, 运用 D – S 模型来研究自贸区成立的溢出效应, 以及四大自贸区的竞争互补关系, 同样较为合适。

首先, 模型使用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份额来代表一地的竞争力, 定义 $W_i(t)$ 是 t 时刻 i 地区在全国 GDP 中的份额。假设研究的地区数为 n 个, 则得到各地区组成的 GDP 相对份额的分布函数:

$$W(t) = [W_1(t), W_2(t), \dots, W_n(t)] \quad (1)$$

假设 t 时刻一地的 GDP 份额是 $t - 1$ 时刻该地区竞争力的函数, 则:

$$W_i(t) = \frac{f_i[W(t-1)]}{\sum_{j=1}^n f_j[W(t-1)]}, \text{ 其中 } i, j = 1, 2, \dots, n; t = 1, 2, \dots, T \quad (2)$$

根据 Dendrinós and Sonis (1988), 假定函数 f 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f_i = A_i \prod_{k=1}^n W_k(t-1)^{\gamma_{i,k}}, \text{ 其中 } i, k = 1, 2, \dots, n; t = 1, 2, \dots, T \quad (3)$$

结合公式 (2) 和 (3), 可推得地区 i 对于参考地区 j 的相对竞争力为:

$$\frac{W_i(t)}{W_j(t)} = \frac{A_i}{A_j} \prod_{k=1}^n W_k(t-1)^{\beta_{i,k}} \quad (4)$$

最后采用对数—线性形式, 得到模型如下:

$$\ln w_i(t) - \ln w_j(t) = \alpha_i + \sum_{k=1}^n \beta_{i,k} \ln w_k(t-1) \quad (5)$$

其中, $\ln w_i(t)$ 是 i 地区在 t 时刻 GDP 在全国 GDP 中的份额的对数, $\ln w_j(t)$ 是指参考地区 j 在 t 时刻 GDP 份额的对数, α_i 表示 i 地区区位优势。 $\beta_{i,k}$ 为 i 地区 GDP 权重对 k 地区 GDP 权重一阶滞后项的弹性, 称为伪弹性 (或拟弹性, pseudo elasticity)。若 $\beta_{i,k}$ 符号为正, 则表示 i 地区与 k 地区为互补关系, 同时也说明 k 地区 GDP 权重的增加会带动下一期 i 地区 GDP 权重的相应增加; 而 $\beta_{i,k}$ 数值越大, 说明 i 与 k 两地区间的相互关系越强。综上, 一地区的区位优势与地区间的竞争互补关系可以通过 D – S 模型估计。

(二) D—S 模型修正

为了测量上海自贸区成立对沪津粤闽四个地区的区位优势与竞争互补关系的影响, 本文在传统 D – S 模型基础上进行修正, 加入了上海自贸区成立的虚拟变量以及其与上海 GDP 权重一阶滞后项的乘积:

$$\ln w_i(t) - \ln w_j(t) = \alpha_i + \gamma_i \cdot D(t) + \delta_i \cdot D(t) \cdot \ln w_{\text{Shanghai}}(t-1) + \sum_{k=1}^n \beta_{i,k} \ln w_k(t-1) + u_i(t) \quad (6)$$

由于上海自贸区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成立，我们设虚拟变量 $D(t)$ 在 2013 年第三季度前为 0，上海自贸区成立后为 1。根据回归所得的系数 γ_i ，我们可以测度两批自贸区对四地区区位优势有正或负影响，并检验这个影响是否显著。即分别检验以下三个零假设：

$$\gamma_{Shanghai} \geq \gamma_{Tianjin} ; \gamma_{Shanghai} \geq \gamma_{Guangdong} ; \gamma_{Shanghai} \geq \gamma_{Fujian} \circ$$

δ_i 代表 i 地区与上海 GDP 权重一阶之后的弹性系数在上海自贸区成立后的变化， δ_i 大于零表明上海自贸区成立对两地经济的互补关系进行了增强， δ_i 小于零表明两地的竞争关系有所加强。我们将在回归后 δ_i 进行联合检验以示其是否显著： $\delta_{Tianjin} = \delta_{Guangdong} = \delta_{Fujian} = 0$ 。

在具体的实证模拟中，为了提高最小二乘法的回归效率，我们使用半相依回归（或称似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以下简称 SUR），SUR 的优势在于它并不限制跨方程的残差之间的相关性为零，提高了回归效率。^① 在众多的 SUR 回归方法中，我们选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采用两阶段回归，第一阶段，通过 OLS 回归获得各方程的残差，使用残差估计协方差矩阵；第二阶段，使用估计所得的协方差矩阵对方程再次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回归。最后，使用 Breusch - Pagan 检验方程之间是否具有同期相关性，以验证 SUR 回归的必要性。

（三）D—S 模型对本研究适用性的讨论

对于本研究的实证方法，有三个方面的说明：第一，自贸区占其所在省份或城市中相对比较小的一个范围，从目前统计的口径及公布的标准很难获得自贸区季度的 GDP 数据。因此，本文在研究时使用自贸区所在省或直辖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自贸区所在省或直辖市的 GDP 数据，囊括了自贸区范围内的产出。本文以自贸区所在省市的 GDP 数据来分析自贸区对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及区域间竞争互补关系，虽然与用自贸区 GDP 分析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但考虑到自贸区与其所在省市的溢出效应方向基本一致，因此，使用省市 GDP 应当与使用自贸区 GDP 得出的溢出效应和对竞争互补关系的影响趋势应是一致的。

第二，本文在实证中运用 GDP 数据而不是其他部门或行业的数据。GDP 是一个综合性数据，自贸区成立通过贸易、投资等渠道带来的溢出效应，都将最终反映在一地的 GDP 中。文献中研究区域间综合性竞争互补关系的实证方法基本上都是用 GDP，反而用其他数据比如进出口或直接投资等都难以全面反映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本文聚焦 GDP 数据有其合理性。

^①当系统的各方程拥有同样的自变量时，SUR 与 OLS 的回归效率一致（Wooldridge，2002，pp. 150），但仍需要通过 SUR 回归来获得用于跨方程检验的协方差。

第三，我们在运用 D-S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过程中，所有省份 GDP 都进入了模型运算，但在分析四大自贸区协同互补效应时，为了聚焦四大自贸区所在省市，文章省略了对其他省份与自贸区之间关系的分析。一方面自贸区之间避免盲目竞争，开展协同发展是一个较为紧迫的课题；另一方面各自贸区对其所在区域经济的溢出效应是另一个需要系统性分析的问题。受限于篇幅，本文将重点放在第一个问题。

四、自贸区溢出效应及沪津粤闽竞争互补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各省季度 GDP 数据均来源于国家及各省市统计公报。针对 GDP 数据带有季节性因素的影响，本文使用 EViews8 软件中的 $x-13ARIMA-SEATS$ 方法对 GDP 进行了季节性调整，最终使用了经调整后的各省市季度 GD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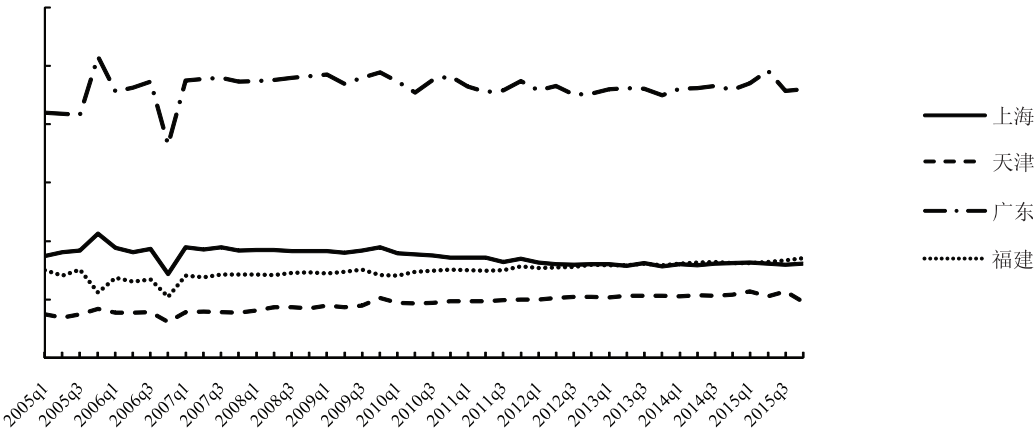


图 3 2005—2015 年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例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及各省市统计局地区生产总值经季节性调整。

图 3 为经季节性调整后四大自贸区 2005 年第一季度到 2015 年第四季度 GDP 占全国 GDP 的权重。可以看出，广东一直列居四地区之首，在样本区间占全国比例维持在 9% 左右。上海与福建经济规模相当，约在 3% 左右，天津约在 2%。在上图可以观察到，2013 年三季度上海自贸区成立后，上海经济占比有小幅提升。下文将结合更可靠的实证证据分析这四个地区区域优势和竞争互补关系受自贸区成立的影响。

(二) 实证结果分析

D-S 模型回归结果对于参考地区的选择相当敏感 (Nazara et al, 2006)，本研究通过选取多个参考地区并且比较结果以论证结论的稳定性。首先选取北京市为参考地区，北京与其他四大自贸区所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相似，GDP 差距不大，在全国发展较快的

省市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同时，我们从全国范围内人均 GDP 水平处于高、中、低三个层次的省份中各选出一个地区作为对比组进行补充分析。人均 GDP 处于较高水平的地区选取江苏省，江苏同沪津粤闽类似，也位于东部沿海，发展阶段与 GDP 水平相似，产业结构具有可比性；其次，本文还选取了人均 GDP 处于中位的新疆以及人均 GDP 最低的贵州作为对比组，这里参考的人均 GDP 数据以 2014 年为标准，因为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在 2013 年 9 月，选择距离上海自贸区成立最近的年份 2014 年作为基准更具有可比性。

根据公式（6）并以 GDP 处于较高水平的北京和江苏作为参考地回归结果，见表 2。

表 2 四大自贸区 D-S 模型回归结果（以北京、江苏为参考地区）

参考地区	北京				江苏			
应变量 自变量	上海	天津	广东	福建	上海	天津	广东	福建
2013Q3 后	0.092*** (3.82)	0.056** (2.07)	0.032 (1.41)	0.065** (2.14)	0.060*** (3.61)	0.024 (1.36)	0.000 (0.00)	0.033** (2.44)
上海 (t-1)	0.856** (2.12)	0.975** (2.15)	0.804** (2.12)	0.111 (0.22)	0.895*** (3.20)	1.014*** (3.41)	0.844*** (2.94)	0.151 (0.67)
天津 (t-1)	0.875*** (2.68)	1.378*** (3.76)	0.498 (1.62)	-0.013 (-0.03)	1.026*** (4.54)	1.529*** (6.36)	0.649*** (2.80)	0.138 (0.75)
广东 (t-1)	0.206 (0.31)	1.179 (1.57)	0.836 (1.33)	0.312 (0.37)	-0.520 (-1.13)	0.452 (0.92)	0.110 (0.23)	-0.415 (-1.11)
福建 (t-1)	-1.052* (-1.75)	-1.461** (-2.16)	-1.152** (-2.04)	-1.311* (-1.74)	0.366 (0.88)	-0.044 (-0.10)	0.266 (0.62)	0.107 (0.32)
上海 (t-1) ×2013Q3 后	-0.004 (-0.49)	0.000 (0.02)	-0.005 (-0.72)	0.000 (0.02)	0.001 (0.18)	0.005 (0.87)	-0.000 (-0.08)	0.005 (1.14)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05—2015 年国家统计局分地区季度数据经 Stata14 软件处理所得。

注：括号内的数据为 t 值；Q3 为第三季度。

上海自贸区成立对沪、津、粤、闽四个地区区位优势的影响由 2013 年第三季度后的虚拟变量的系数反映，表 2 以北京为参考地区的模型结果分别为 0.092、0.056、0.032 和 0.065，说明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对其自身以及其他三地的区位优势均有正向效应。尤其对上海、天津和福建的正效应明显，均在 5% 的显著水平。

四大自贸区间协同互补关系，由各方程中作为自变量的各省市 GDP 的一阶之后的

系数反映，系数为正（负）表明一地的 GDP 对另一地有正（负）影响。根据表 2 的结果，在以上海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天津、广东与上海呈现出互补关系，但广东的互补性并不显著，另福建与上海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竞争性；在以天津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上海、广东与天津呈现出互补关系，但广东的协同性并不显著，另福建与天津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竞争性；在以广东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上海、天津与广东呈现出互补关系，但天津的协同性并不显著，另福建与广东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竞争性；在以福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上海、广东与福建呈现出协同互补关系，但均不显著，另天津与福建呈现出竞争关系，同样不显著。

上海自贸区成立是加大四地的互补关系还是带来竞争关系，通过上海 GDP 的一阶之后，与 2013 年第三季度后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的系数反映，该系数为正（负）代表上海自贸区成立后上海对其他四地的影响更正（负）向。表 2 的实证结果显示，四个系数数值均接近于 0 且不显著，表明上海自贸区成立并没有加剧四大地区间的竞争效应，也没有给其他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综合而言，以北京作为对比组，在地区间竞争互补关系中，有 8 个结果呈现出互补性，有 4 个结果表现出竞争性，表明四地互补关系较强。上海自贸区成立提升了上海、天津与福建的区位优势，上海自贸区并不影响四地的互补性。

（三）实证结果的稳定性与模型检验

1. 以江苏为参考地区分析

以江苏作为参考地区的实证结果，类似于以北京作为参考地区的结果（见表 2），同样表明上海自贸区成立为各地带来区位优势提升，而且并没有加剧四大地区间的竞争。

在以江苏为参考地区的回归中，上海自贸区成立对四地区区位优势的影响分别为 0.060、0.024、0.000 和 0.033，其中上海与福建的区位优势在 5%，水平显著。表明自贸区成立强化了各地的禀赋，与以北京为参考地区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针对四大自贸区间的竞争互补关系，在以江苏作为参考的回归中，12 个地区间竞争互补关系中有 9 个地区间关系呈现出互补性，有 3 个地区间关系表现出竞争性。其中，以上海、天津和广东为应变量的模型反映出较强的互补性，而以福建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表现出的互补性较弱。总体结果与以北京为参考的结果一致。

类似以北京为参考所得的结果，在以江苏为参考地区的回归结果也表明，上海自贸区成立并不会加剧四地竞争关系。上海 GDP 滞后项与自贸区成立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的系数分别为 0.001、0.005、-0.000 和 0.005，均不显著，且大部分为正，表明自贸区成立带来的互补效应超过竞争关系。

2. 以新疆和贵州为参考地区分析

表 3 显示以新疆或者贵州为参考地区的模型的回归结果。在以新疆作为参考时,上海自贸区成立对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的区位优势均有显著为正的促进效应;而以贵州作为对比组时,上海自贸区成立除对广东的区位优势影响不显著,对其他三地区区位优势影响均为正且显著。四地区间的竞争互补关系,以新疆为参考的结果类似于以北京、江苏为参考的结果,在 12 个地区间竞争互补关系中,有 10 个地区间关系呈现出协同互补性,有 2 个地区间关系表现出竞争性;以贵州为参考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四地之间以竞争关系为主,在 12 个地区间竞争互补关系中,全部地区间关系均呈现出竞争性。针对上海自贸区成立对四地竞争互补关系的影响,以新疆为参考的结果类似于以北京、江苏为参考的结果,自贸区成立没有加剧竞争关系。而以贵州为参考的结果中,自贸区成立与上海 GDP 滞后的交叉项的系数均为正,且在上海、天津和福建的模型中较显著,表明自贸区成立增加了这些地区间的互补关系,结论强于以北京、江苏和天津为参考地区的结论。

表 3 四大自贸区 D-S 模型回归结果 (以新疆、贵州为参考地区)

参考地区	新疆				贵州			
应变量 自变量	上海	天津	广东	福建	上海	天津	广东	福建
2013Q3 后	0.157*** (7.20)	0.121** (5.16)	0.097*** (5.00)	0.130*** (5.01)	0.074*** (2.73)	0.038* (1.85)	0.014 (0.53)	0.047* (1.87)
上海 (t-1)	0.706* (1.92)	0.825** (2.09)	0.655** (2.01)	-0.039 (-0.09)	-0.509 (-1.12)	-0.390 (-1.12)	-0.560 (-1.24)	-1.253*** (-2.98)
天津 (t-1)	0.659** (2.22)	1.162*** (3.64)	0.282 (1.07)	-0.230 (-0.65)	-0.633* (-1.72)	-0.131 (-0.46)	-1.010*** (-2.77)	-1.522*** (-4.47)
广东 (t-1)	1.557** (2.57)	2.529*** (3.87)	2.187*** (4.05)	1.663** (2.31)	-1.660** (-2.20)	-0.687 (-1.19)	-1.030 (-1.38)	-1.554** (-2.23)
福建 (t-1)	1.435*** (2.62)	1.025* (1.74)	1.335*** (2.74)	1.175* (1.81)	-0.846 (-1.24)	-1.256** (-2.42)	-0.946 (-1.41)	-1.105* (-1.76)
上海 (t-1) ×2013Q3 后	0.003 (0.39)	0.007 (0.88)	0.001 (0.21)	0.007 (0.80)	0.015* (1.78)	0.019*** (2.93)	0.014 (1.64)	0.019** (2.4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05—2015 年国家统计局分地区季度数据经 Stata14 软件处理所得。

注:括号内的数据为 t 值;Q3 为第三季度。

在以贵州作为参考地区的回归中,四地区的竞争效应远远大于其互补效应,可能是由于贵州地处西部,且并无港口,与这四个地区相比,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GDP 规模

差别较大，产业结构差异巨大。以贵州为参考所得的结果与以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作为参考所得的结果差别较大。我们的实证分析也表明，D－S 模型在应用中应采用不同的参考地区，比较所得结果的稳定性，并应尽量选取与被解释地区相类似的地区作为参考。

3. 模型检验

本节分析模型回归的相关检验。在以北京为参考地区的模型中（见表 4），方程的拟合度 R^2 均较高，有三个为 0.98，一个为 0.96，说明模型整体的拟合度较高，与文献中 D－S 模型在其他国家的应用结果一致（Hewings，2014；Kamarianakis and Kaslis，2005）。 chi^2 检验检测模型整体的显著性，在以北京为分母的回归中，四个方程 chi^2 的统计值均较高，同时四个方程 chi^2 检验的 P 值均接近 0，因此这四个方程均整体显著。总体而言，模型拟合与显著性较好，并符合文献中其他应用结果。

Breusch－Pagan 相关性检验 chi2 统计值为 104.71，其 P 值为 0.00，表明 Breusch－Pagan 检验拒绝了零假设，四地区的 GDP 权重方程具有同期相关性，需要正确的协方差矩阵 Σ 来进行跨方程检验，所以说使用 SUR 回归来估计 D－S 模型是必要的。

表 4 进一步检验结果（北京、江苏为参考地区）

参考地区	北京				江苏			
应变量	上海	天津	广东	福建	上海	天津	广东	福建
N	43	43	43	43	43	43	43	43
R^2	0.98	0.98	0.96	0.98	0.99	0.98	0.97	0.97
chi^2	2119	2564	1004	2107	5198	2164	1308	1585
P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Breusch－Pagan 相关性检验	$chi^2(6)$	140.71	P	0.00	$chi^2(6)$	38.49	P	0.00

在以江苏为分母的模型中，方程的拟合度 R^2 均高于 0.97，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高，而且四个方程的 chi^2 统计值均较高，检验 P 值也均接近于 0，说明这四个方程均整体显著。总体而言，以江苏为分母的模型拟合与显著性较好，同时符合文献中其他应用的结果。另外，在以中位数新疆和最低数贵州为对比组的检验也有一致稳定的结果，拟合度 R^2 和 chi^2 统计值以及 Breusch－Pagan 相关性检验都与以北京和江苏为对比组的结论一致，总体方程显著（见表 5）。

4. SWOT 分析

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自贸区成立对本地经济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且我国四

大自贸区的协同效应大于竞争效应。那么，通过对自贸区成立后我国四大自贸区的协同发展进行 SWOT 分析，能够得出针对上述实证结论适宜采用的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从而发挥四大自贸区的协同互补效应并更好地利用其竞争效应，使我国四大自贸区在协同竞争效应下进一步快速良性地发展。

表 5 进一步检验结果（新疆、贵州为参考地区）

参考地区	新疆				贵州			
应变量	上海	天津	广东	福建	上海	天津	广东	福建
N	43	43	43	43	43	43	43	43
R ²	0.99	0.98	0.99	0.95	0.99	0.97	0.99	0.98
chi ²	3915	2205	2282	753	7531	1275	4362	2028
P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Breusch – Pagan 相关性检验	chi ² (6)	109.98	P	0.00	chi ² (6)	127.52	P	0.00

表 6 我国自贸区协同发展 SWOT 分析

外部 内部	优势（S） * 产业侧重不同，协同发展潜力巨大 * 面向的市场有很大的区别，协同效应有利于拓展国内市场 * 物质及人力资源异质性较强，有利于在协同互补过程中互通有无，促进各自内部发展	劣势（W） * 发展阶段不同，政府支持不同 * 区内均面临产业结构失衡、产业人才结构失衡的问题 * 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注重打造其独占优势，使其在协同互补中保留信息、资源
	机会（O） * 世界各国自贸区的蓬勃发展给我国提供了借鉴学习的机会 * 区域经济一体化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拓宽了我国的国际市场 * 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有利于我国进行自贸区的协同发展 * 对接日韩东北亚区域、中国—东盟自贸区，为我国自贸区协同发展提供更多外部资源	WO * 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管理制度，以吸引境外长期投资 * 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我国自贸区跨区域产业间协同合作 * 借鉴多方面经验，政府应鼓励四大自贸区之间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以解决资源共享不充分问题

威胁 (T) * 美国主导的 TPP (特朗普上台后宣布退出)、TTIP、TISA 新规则, 把我 国排除在外, 建立起的市场壁垒阻碍 我国经济发展 *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外需依然疲软 * 不少制造业外企迁到东南亚等地, 自贸区内部发展面临资金、人才等资 源流失的现状 * 欧洲央行推出量化宽松政策, 不利 于人民币汇率稳定	ST * 加强与新兴国家合作, 打破美欧 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枷锁 * 争取加入到 TPP、TTIP、TISA 的谈判过程中, 促进推出有利于我 国自贸区发展的新贸易与投资规则 * 加快削减负面清单管理范围进 程, 放松对外企管制, 在自贸区协 同发展及扩围过程中更好地解决资 源流失问题	WT * 政府应尝试建立 “自贸区协调 小组”, 加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自贸区协同发展模式 * 政府应制定多项优惠政策以吸 引外来高素质人才, 因人才制 宜, 解决产业人才结构失衡问题 * 加快我国自贸区内的利率与汇 率市场化进程
--	---	---

五、四大自贸区协同发展策略

通过上述理论、实证及 SWOT 分析可知, 四大自贸区在协同互补发展进程中, 面临着较大压力与挑战。新常态下, 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任务艰巨, 需要寻求制度创新, 从改革要动力。四大自贸区应当避免盲目竞争, 促进协同发展; 避免产业发展同质化, 应寻求产业发展差异化; 转变以往产业先行的老路, 代之以促进产城融合的新路; 改变以往园区发展靠政策要优惠的政策洼地模式, 探索以制度创新和环境改善促发展的自贸区建设新模式; 变先发优势为后发优势。

首先, 要逐步建立与自贸区协同发展相适宜的制度。第一, 需建立自贸区金融监管、市场监管协调机构。过去, 上海自贸区在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多有益经验。中央政府应在国家层面上尝试建立自贸区金融监管、市场监管协调机构, 从机构设置上促进自贸区协同发展。第二, 针对自贸区内部所适用的一些法令存在不完全一致, 影响协同发展的现状, 在自贸区协同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中央政府应逐步稳妥推动相应法令的制定、修改及完善, 促进在自贸区内部得到广泛一致地适用。第三, 各地方政府应出台各种政策, 推动各经济区域由竞争性政策平台转向合作性政策共享平台, 鼓励差异化发展, 在自贸区增强本地区经济活力以及打造本地区优势的同时, 尽可能将对其协同发展有消极影响的因素减至最低, 乃至消除。

其次, 工作重心要逐步转移。自贸区发展应由贸易便利向投资促进、金融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等硬骨头深入挺进。如果仅沿贸易这一路径继续走下去, 难有大的突破, 也不符合自贸区构建高水平开放经济新体制的根本宗旨。为此, 自贸区的工作重心应向投资促进、金融创新、政府职能转变、新业态培育等核心议题上加速转变。第一, 投资促进加速向内外资遵循统一、透明、公平、便捷的规则体制转变; 第二, 金融创新在构建起有效的审慎风险管理体系基础上, 加速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对内对外开放, 着力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逐渐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第三，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最后，积极利用制度创新的便利，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培育互联网+、智能物联网等新型产业与新兴业态上先行先试。

再次，自贸区建设要进一步扩容，推动自贸区与国家重大战略融合。从区域布局上看，重点布局于能够实现对“一带一路”影响与辐射的枢纽城市。“一带一路”建设是新一届政府全球外交的核心，自贸区建设要服从于这一战略部署。与“一带一路”建设相结合，要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筑巢引凤、环境先行”“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原则和规律。目前，自贸区“制度创新—经验推广—倒逼改革”的良性效应已然初步形成。可以预见，未来中央对于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改革步伐的时限要求将进一步收紧，很快将有一批系统性的经验复制推广到全国。长远来看，自贸区发展的目标将是在全国推行同一份投资负面清单、同一套金融开放与监管体制、同一类政府管理与服务模式。这些措施将进一步促进投资、贸易、金融、航运、人员等领域的自由往来，建立自由港，使我国企业通过自贸区进一步走出去。通过自贸区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结合，打造创新的制度环境，为产业发展、企业创新提供优良的市场环境；通过京津冀、长三角经济带建设，发挥自贸区溢出效应及区域经济回馈效应，实现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幼文：《我国开放发展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5日。
2. 杨云母：《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与拟建中日韩自贸区的交织与互补》，《现代日本经济》2011年第2期。
3. 冯宗宪、赵立伟：《基于空间场和引力模型的边界效应分析——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统计与信息论坛》2013年第10期。
4. 张幼文：《自贸区试验与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理论参考》2014年第1期。
5. 成思危：《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区：中国保税区的改革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6. 陈琪、刘卫：《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动因及其经济效应分析》，《科学发展》2014年第2期。
7. 王家庭、孙哲：《自贸区试验服务内容的辐射效应与区域发展》，《上海城市管理》2014年第1期。
8. 周汉民：《我国四大自贸区的共性分析、战略定位和政策建议》，《国际商务研究》2015年第36期。
9. 冯怡康、马树强、金浩：《资源优化视角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8期。

10. 伍长南:《福建自贸试验区产业发展研究》,《东南学术》2015 年第 5 期。
11. 朱斌:《闽台协同发展高科技产业探索》,九州出版社 2006 年版。
12. 涂文明:《我国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延伸》,《改革》2008 年第 4 期。
13. 王珍珍、黄茂兴:《“产业—港口—城市”联动发展的理论演进脉络与协调机制》,《管理学刊》2013 年第 4 期。
14. 刘东方:《上海自贸区金融法制建设分析——基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理论月刊》2015 年第 9 期。
15. 娄文龙:《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测量和比较》,《统计与决策》2014 年第 2 期。
16. 周立群、夏良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来自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证据》,《江海学刊》2010 年第 4 期。
17. 朱列:《区域 GDP 份额演变过程中区域竞争与互补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广西五大经济区为例》,《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 年第 8 期。
18. 苏方林、侯晓博:《基于 D-S 模型的中原城市群产业发展》,《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 年第 5 期。
19. 危曼华、王艳、张莉:《基于 D-S 模型的江西省地市经济增长的竞争互补研究》,《现代企业文化》2012 年第 11 期。
20. Dendrinos, D. S. and Sonis, M. Nonlinear discrete relativ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e U. S. regions. *Applied Mathematics & Computation*, 1988, 25 (4): 265–285.
21. Wooldridge, M. J.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2.
22. Bonet, J. Colombian Regions: Competitive or Complementary?. *Revista De Economia Del Rosario*, 2003 (8): 53–70.
23. Postiglione P, Hewings GJD. Hierarchical spati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Italian regions: a nonlinear relative dynamics approach.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ystems*, 2008, 10 (4): 369–382.
24. Hewings, GJD. Spatially blind trade and fiscal impact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regional economies.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14, 54 (4): 590–602.
25. Kamarianakis, Y. and Kaslis, V. Geographical competition – complementar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Greek regional economies. *ERSA conference papers*. European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5.

责任编辑:谷 岳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资企业 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研究

田昕清 黄永富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使中资企业境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加快产业转型、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外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却对中资企业的境外投资构成了巨大风险。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企业海外利益，减少投资损失，但我国目前与境外投资保险相关的机制安排和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使得企业在风险防范方面十分被动。鉴于此，以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发展现状为切入点，剖析当前制度框架下存在的问题，对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管控能力、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

关键词：一带一路 境外投资 保险制度

作者简介：田昕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
黄永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赴境外投资热情高涨。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额达到144亿美元，进出口总额73745亿元，同比增长17.8%。但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安全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中资企业赴境外投资不仅面临着技术标准、合同履行、劳务用工、环境评价等商业风险，同时也面临着诸如战争、内乱、暴动、汇兑、恐怖主义袭击、绑架、公共卫生安全等一系列非商业性风险。这些风险对境外投资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有些甚至是致命的。因此，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完善企业境外投资的保险制度安排，加强对境外投资保险

体制机制的创新，对于减少企业损失、最大限度地维护企业海外利益、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意义深远。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即海外投资担保，是指资本输出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国民在国外投资的安全，对其在资本输入国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的制度。^①从广义上讲，海外投资保险应覆盖企业投资的所有潜在风险，包括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但从目前海外投资保险的主要险种设置来看，基本都是对政治风险进行承保，商业风险则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向商业保险机构申请。

二战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经常受到战争、内乱、国有化、政府违约、外汇禁兑等一系列风险的影响。为减少本国企业损失，增强本国投资者信心，美国于 1948 年通过了《经济合作法案》，创设了国际投资担保的国内法制度，并设立了专门的政策性保险机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随后，各国纷纷颁布与企业海外投资保险相关的法律，并设立专门的保险机构，鼓励和保护企业境外投资。在机构设置方面，大部分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如法国的外贸保险公司和外贸银行、澳大利亚的出口融资和保险公司、加拿大的出口发展公司、荷兰的信用保险公司和日本的出口保险部。在承保模式方面，形成了以双边投资担保制度为代表的美国模式和以单边投资担保制度为代表的德国模式。^②

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末，为建立起跨国投资保险的国际协作机制，在联合国贸发会、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国际商会的共同努力下，《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通过并生效，并据此成立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以下简称 MIGA）作为世界银行集团的第 5 个新增成员，为全球范围内的私人海外投资可能遭遇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服务。

目前，无论是国内投资保险机构还是国际组织，都在不断拓展自身业务范围，除不断完善其自身保险产品覆盖范围、简化投保流程、降低投保费用外，还将服务扩大到风险咨询、风险评估、主权评级等领域，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的风险管控方案。

二、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保险的机制安排

为进一步加强对外国投资企业的保护，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探索设立专门的投资保

①史晓丽、祁欢：《国际投资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2 页。

②美国模式下，本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提供投资保险的前提是本国政府已经与东道国政府签署了《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德国模式下，海外投资保险产品的提供需依据国内法的规定，而不仅仅依据《双边投资保证协定》。

险机构，承保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同时加强各部门沟通协调，在企业海外投资保险的机制建构方面做了相应安排。

（一）境外投资保险的机构设置

目前，我国对中资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管理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对商业风险的多元化管理模式；另一种是对政治风险的归口管理模式。对于商业风险，国内具有相应资质的保险机构均可承保各类财产、人身类保险；对于政治风险，目前则只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可以提供相应的保险产品。

在机构设置方面，我国现有商业保险机构和政策性保险机构。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数据统计，国内目前共有保险公司 81 家，其中中资保险公司 59 家，外资保险公司 22 家。^① 这些保险机构中除中国信保可以为境外投资提供政治风险保险外，其他机构均未开设政治风险承保业务，主要是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相应的财产、人身等各类保险。

2001 年 12 月 18 日成立的中国信保是中资企业境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产物，整合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的海外投资保险业务。整合后，中国信保致力于鼓励和促进中资企业境外投资，其业务范围主要是向境外投资提供政治风险保险。作为我国唯一一家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保险产品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中国信保自设立以来在业务开展中逐渐建立起了以“国家风险信息库”为基础、以“多元化信息渠道”为支撑、以“参考评级”为核心、以“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和“国家风险地图”为主要载体的国家风险管控体系。

（二）境外投资保险的险种设置

综合性商业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一般囊括财产险、人身险、团体险等类型，各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根据自身发展定位而不尽相同。一般来讲，商业保险公司在承保商业险时都会为企业从事境外投资提供短期和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商务合同信用保险、金融机构贷款损失信用保险、担保机构代偿损失信用保险、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建设工程完工履约保证保险、投标保证保险等服务。对于货物运输，商业保险公司则主要针对公路、铁路、航空、海运以及多式联运中的货物安全进行保险。对于劳务风险，商业保险公司一般会设置与外派劳务人员意外伤害保险类似的服务产品。

^①资料来源：《2016 年财产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情况表》，<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202/info4060014.htm>，2017 年 11 月 4 日。

与商业保险机构不同，中国信保由于其特殊性，在险种设置上主要包括海外投资股权保险、海外投资债权保险和海外投资租赁保险，分别承担投资项下股东权益损失风险、投资中的债权损失、为具有租赁资质的企业及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跨境租赁交易提供租赁项目所在国政治风险及承租人信用风险。^① 在保险产品覆盖范围上，中国信保除提供传统的战争及政治暴乱险、征收险、汇兑限制险、违约风险以及附加政治风险外，近年来还连续发布《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全球投资风险分析报告》，成为企业“走出去”重要的“风向标”之一。据中国信保统计，2016 年度伯尔尼协会^②成员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等三项主要业务共实现承保金额约 18651.8 亿美元（不含部分机构从事的直接贷款业务），同比增长 2.3%。中国信保三项险种总承保金额位列协会各成员机构首位，在协会整体业务规模占比约 23.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海外投资保障力度，中国信保在国家政策指引下不断加大对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扩大了对小微企业的覆盖面，目前已推出“小微企业信保易”。在海外投资保险的业务领域，重点支持能源资源合作、优势产能转移、农业走出去项目、境外经贸合作区以及收购类项目，并且推出了多个全新的风险保障模式，如小额承保模式和政治风险统保模式。

（三）境外投资保险的治理架构

目前，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保险的治理架构是在国务院指导下，以保监会为主、各部委为辅，通过商业保险机构和政策性保险机构具体实施的多层级、全方位治理架构。具体来讲，我国境外投资保险是在保监会的统一监管下，形成了以中国信保和综合性商业保险机构相辅相成的组合治理模式。一方面，保监会作为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的行政管理部门，具有拟定保险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制定行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审批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对政策性保险和强制保险进行业务监管等职能。例如，为密切配合“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日趋增长的境外投资，保监会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又如，2017 年 4 月 27 日发布的《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就如何构建“一带一路”建设保险支持体系和加快保险业国际化步伐做了详细规定，成为各大保险公司、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另一方面，境外投资保险的审批与承保均由中国信保负责。中国信保是由

^①在海外投资租赁保险项下，该项保险产品赔偿比例为 90%~95%，保险期限一般为 3 年。

^②伯尔尼协会又称“国际信用和投资保险人协会”，1934 年在瑞士伯尔尼成立，其宗旨为维护并确立国际贸易信用条件和基本原则；确立海外投资保险的基本原则；为成员之间提供信息交流平台。

国家出资设立、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性保险公司，按照公司架构进行治理。具体来说，在公司高层治理模式方面，中国信保分为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内设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提名薪酬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监事会主要负责对财务和履职尽责的监督管理。在管理层，公司除总部设有 30 个部门外，在全国 25 个地方和伦敦设有分支机构。总而言之，中国信保和各大商业保险机构分别在不同领域对企业“走出去”、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共同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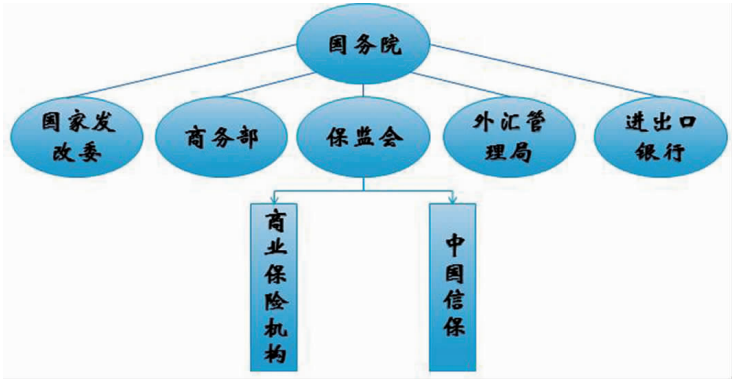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境外投资保险治理架构

三、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律规制

与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相关的法律规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颁布的各类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另一类则是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法律规范。在国内法层面，我国还没有完善的境外投资保险立法，与其相关的规定都散见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机构通知中；在国际法层面，目前主要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为主。

（一）以部门规章为重要载体的国内法律规制

随着中资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案例的增多，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以加大对境外投资的保护力度。纵观我国当前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律规制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与投资保险相关的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中。目前，我国针对境外投资的部分法律法规中包含与投资保险相关的内容，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保险业运行规范进行统一规定外，其他与境外资产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也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例如《国有资产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又如，《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第六章从协议签署、方案设计、风险评估、操作流程等方面对保险资

金境外投资进行了详细规定。二是与境外投资保险相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大多以部门规章或通知的形式出现。比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关于申请办理出口信用保险若干规定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动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开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建立境外投资重点项目风险保障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委关于加强境外安全风险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关于建立境外投资重点项目风险保障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务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关于实行出口信用保险专项优惠措施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通知》《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十二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规划》等文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境外投资保险，但不难发现这些文件大部分都属于位阶较低的部门规章。

（二）以国际公约为主要形式的国际法律规制

作为现阶段全球范围内唯一规制海外投资保险的国际法律文件，《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自生效以来在鼓励和促进海外投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对各国制定海外投资立法起到了示范法的作用，其对保险制度的设计也大大推动了各国实施海外投资便利化。

《公约》分为 11 章和 2 个附件，不仅规定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地位、组织架构、特权和豁免、财务安排，还规定了会员国的资格和资本金、海外投资的承保险别、合格投资、合格投资者、合格东道国、担保条件、担保限度、索赔支付、代位求偿、与私人担保人和再保人的合作、与全国性与区域性实体的关系、再保险、争端解决等内容。

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MIGA 对海外投资的保障作用日益凸显。据 MIGA 发布的最新公告，截至 2017 年 7 月，MIGA 承保总额达到 48 亿美元，挽回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损失高达 159 亿美元。^① 在承保范围方面，MIGA 的业务不仅覆盖大型基础设施，同时也为中小企业项目提供担保。在申请程序方面，初始申请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便可完成，而通过认证后提交最终申请的条件也十分明确。在费用方面，初始申请时完全免费的，提交最终申请时只需缴纳 1 万美元保证金和少量手续费。

四、中资企业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不断加强和完善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保险

^①详见 MIGA 官方简报，<https://www.miga.org/Lists/Press%20Releases/CustomDisp.aspx?ID=537>，2017 年 10 月 14 日。

制度安排，但仍存在立法缺失、境外投资保险覆盖率低、海外投资流向与双边投资协定结合不紧密以及未充分利用国际投资保险规则等一系列问题。

（一）缺乏境外投资保险立法

在一系列国家政策引导下，中资企业的境外投资规模呈扩大趋势，但我国针对境外投资的保险法律体系却相对滞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法律文件的颁布未成体系，且具有滞后性。从我国现有的法律体例来看，我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出台专门调整海外投资保险关系的法律规范。其二，在已有的法律规制框架下，与企业境外投资保险相关的内容相对空洞，缺乏务实抓手。例如，2017年9月1日修订了《中小企业促进法》，但该法仅在第42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为中小企业提供用汇、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的便利，支持中小企业到境外投资，开拓国际市场”。对于海外投资保险方面的内容没有明确规定。

此外，为进一步规范中资企业对外投资，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7年12月26日发布了《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下放权力、简化程序、创新监管、优化服务方面做了调整，重新定义了境外投资、企业、控制等一系列概念。但在风险防控方面的规定却比较笼统，例如，在投资主体权利方面，《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资主体依法享有境外投资自主权，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在第十二条利益保护的相关规定中指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推动海外利益安全保护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导投资主体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维护我国企业合法权益。”但《办法》中并未提及建立海外利益安全保护体系的具体途径，也没有涉及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相关的机制安排。

（二）境外投资保险覆盖率低

目前，为鼓励企业“走出去”，我国不断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但投资保险，特别是投保政治风险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更是在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普及率非常低。一方面，我国境外投资保险机制安排远远落后于大幅增长的境外投资额。在我国开展境外投资的企业中，仍有相当大一部分企业没有办理投资保险，有的企业甚至不知道出口信用保险的存在。另一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统保平台。虽然中国信保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搭建国资企业海外投资保险统保平台，全力支持国有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境外收购及兼并重组，解除企业跨国经营活动中对风险的顾虑，全力满足其对资金的需求，但在搭建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统保平台方面仍未建立起成熟的机制。

（三）海外投资流向与双边投资协定未有效衔接

截至 2016 年，我国已与 104 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① 但从理论上讲，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单边境外投资保险模式，即提供海外投资保险并不以实际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为前提。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保险的覆盖面更加广泛，但其缺点在于一旦发生政治风险，中国信保的代为求偿权迟迟不能实现，从总体上看仍然会造成资产损失。换言之，我国目前实行的单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未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双边投资保险机制。以利比亚危机为例，在危机发生前，我国在利比亚在建大型项目共计 50 个，涉及合同总金额达 188 亿美元，但由于中利之间并未签署投资保证协定，因此企业项目无法获得赔偿，保险机构也不能通过法律手段维护企业海外利益，由此带来的损失及对投资信心的挫败是不可估量的。

（四）未充分利用国际投资保险规则

我国于 1988 年 4 月 12 日批准《公约》，但一直以来并未充分利用其项下的各项制度和便利。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MIGA 的承保额度最多只能达到 7.2 亿美元，不能满足我国对外投资融资需求；二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投资流向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而根据《公约》的设立目的，主要是鼓励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三是语言障碍导致中资企业对国际标准不信任。从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实际情况来看，大部分企业会选择中国信保而不选择由国外保险机构或者国际组织承保，主要是因为对其规则和程序不甚了解，对投保境外机构具有抵触心理。

五、完善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为进一步完善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保险制度，需要在推动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引导投资流向、充分发挥保险咨询机构作用、加强国内法和国际法联动以及完善经贸合作区等几方面重点发力。

（一）推动海外投资保险立法

针对目前尚未颁布海外投资保险法律的现状，我国应进一步加快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工作，通过拓宽海外投资承保范围、完善海外投资保险评估、强化代位求偿维权等途径推动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同时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对承

^①资料来源：《我国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览表》，<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1111/20111107819474.shtml>，2017 年 11 月 7 日。

保机构、承保范围、投保流程、代位求偿等方面进行规制，推动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的法律体系构建。

（二）按照双边投资协定引导投资流向

目前，中国信保在审查海外投资的“合格投资者”与“合格投资”时，并没有将双边投资协定作为考虑因素。为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双边投资协定，有效降低中小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建议逐渐将单边海外投资保险转为双边投资保险。一是加强对中小企业海外投资流向的引导，在符合我国产业发展规划的总体框架下鼓励中小企业考虑与我国签署《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作为投资目标国；二是加大对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中投资及其保险内容的研究，拓宽对中小企业海外投资保险的覆盖范围，加大对其海外投资的保护力度。

（三）充分发挥咨询机构的作用

建立完善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体系除了需要建立成熟的运行机制和完备的法律体系外，还需要进一步发挥咨询机构的作用。一是要发布短期风险报告。目前商务部和中国信保资信平台都会定期发布各地风险报告及预警，但周期相对较长，不利于风险防范方案的提前实施。建议及时发布《投资风险周报》，以便投资企业了解最新投资动态。二是要充分发掘保险经纪人在风险管控方案设计方面的能力。《保险法》第五章对保险经纪人的设立条件、业务范围、禁止性规定等有相关内容。在实践中，一个好的保险经纪人可以根据项目信息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建议保险机构加强与保险经纪人、智库等方面的合作，多渠道、全方位掌握投资风险的最新情况。

（四）加强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联动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完善的投资风险防控体系以保护境外投资。以中国信保为例，其不断加大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机构的合作力度，包括加入伯尔尼协会，与格鲁吉亚伙伴基金、白俄罗斯银行、金砖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等，但在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联动方面却略显不足。鉴此，应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加强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联动：一是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尽快推动颁布体系完整的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填补立法空白；二是加大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相关机构的沟通，在代为求偿、主权豁免、争端解决等问题上开展合作，加大对境外投资的全方位保护力度；三是要积极跟踪国际组织发布的海外投资动态，并对投资争端产生的根源以及产生的影响加以分析研判；四是拓展与 MIGA 的合作领域，争取在支持中资企业境外投资的

保险险种和申请程序方面优化升级。

（五）完善境外经贸合作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

目前，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我国企业“抱团出海”的主要模式，它不仅是大型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成为带动中小企业跻身国际市场的重要抓手。截至 2017 年，中国企业在境外建设经贸合作区共计 99 个，累计投资 307 亿元，入区企业 4364 家。在支持中小企业海外投资方面，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通过信息咨询、管理便利、搭建平台、风险救济等方式为入区企业提供服务，促进中小企业海外投资。从分布情况来看，我国现有的经贸合作区大多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制度安排还不够成熟，对企业投资来说风险系数较高。因此，提升经贸合作区的风险评估能力势在必行。具体来说，一方面，经贸合作区应加大对投资资金的保护力度，重点关注投资资金进出问题、外汇汇兑问题、投资资金筹措和结算问题以及税收问题；另一方面，经贸合作区应根据园区企业的产业方向随时关注投资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并通过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加强对企业的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1. 史晓丽、祁欢：《国际投资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资信评估中心：《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风险管控及案例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5 年版。
3. 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4. 刘锦明、丁安平、黄智虎、周暄明、刘豫徽：《经济外交案例》，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5. 韩燕煦：《条约解释的要素与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6. 竺彩华：《中国经济外交年报》，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7. 赵骏：《变革中的国际经济法—中国的角色、态度和路径选择》，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8. Franklin R. Root, *U. S. Business Abroad and Political Risks*, MSU Business Topics, 1968.
9. Robock, Stefan H., *Political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971.
10. Mudambi R., P. Navarra, Political Tradition, *Political Risk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Italy*,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3.

责任编辑：沈家文

以“智慧监管”破解网络食品安全困境

魏义方

摘要：食品安全是重大民生问题。随着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消费尤其是网络食品交易增长迅猛、发展潜力巨大，网络食品安全问题日渐突出。网络食品市场的高灵活性、交易虚拟性、强交互性等特征增加了安全监管的复杂性。本文在对网络食品安全问题的表现形式和突出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其背后的原因，并进一步探讨了智慧监管这一新兴监管理念在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实操和运用。化解网络社会下市场监管难题应更多地运用网络新工具，更好地发挥社会共治作用，以智慧监管推动实现多方共赢。

关键词：网络食品市场 食品监管 智慧监管

作者简介：魏义方，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引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完善统一权威的监管体制和制度，落实“四个最严”的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群众吃的安心放心。食品安全是重大民生问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保障食品安全，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完善食品安全法规制度，加快完善食品监管制度，健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是“十三五”时期的重要部署。近年来，随着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消费尤其是网络食品交易规模增长迅速，与此同时，食品安全的自身特性与网络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发展的特征，使得网络食品安全监管面临更大的挑战。

学者们对网络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讨。关于网络食品安全的相关概念，

孟璇(2015)认为,网络食品市场是以互联网为支持,以食品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通过网络沟通达成食品交易,在此期间所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总和。从食品安全层次划分的角度,胡颖廉(2016)指出食品安全概念包括粮食数量安全、食品质量安全和食物营养安全三个不同的层面。笔者认为,网络食品市场是互联网与传统食品产业的融合,网络食品交易是通过互联网交易平台(包括第三方平台或自建网站)进行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的经营活动。本文对食品安全的考量更多的侧重于食品质量安全。关于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必要性以及当前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已有研究指出,信息不对称是食品市场的典型特征,也是网络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与传统食品兼具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特性相比较,网络食品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突出,食品安全作为典型的公共产品还具有显著外部性特征(封俊丽,2016)。从企业的食品质量安全决策角度,市场信用(声誉)是促使企业自愿供给安全食品的重要因素。但由于社会整体信用缺失,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评估体系不完善,仅以消费者的购后评价为基础而建立的信用机制无法很好地起到激励作用(封俊丽,2013)。网络食品交易自身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加以监管,但与快速发展的网络经济相比,政府监管还存在明显缺位。缺乏信息公开机制,且网络食品市场的虚拟性不利于监管部门信息获取,网络食品经营跨地区的线上销售模式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孟璇,2015)。

现有研究指出了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对于网络食品安全监管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的剖析尚有待深入,对网络食品交易与传统食品交易的区别和特点以及由此对监管带来的影响等的研究还相对不足。那么,新兴的网络食品交易方式究竟对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哪些挑战?网络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背后的原因有哪些?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如何及时调整创新,以适应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挑战?本研究围绕上述问题,深入探析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新动态和新挑战,并运用智慧监管等新的监管理念,为推进新业态的监管、完善市场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网络食品市场发展的现状和特征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快速推广,我国网络消费市场迅猛发展,用户规模和销售总额持续增长。与传统的食品实体交易相比,网络食品市场在生产方式、交易模式、消费行为等方面有着不同的特征。

(一) 网络食品市场发展基本情况

1. 消费规模庞大

近年来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持续保持全球第一位,是世界第一大网络购物市场。

2016 年，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达 5.16 万亿元，在网络商品零售中食品网购是重要品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调查显示，全国网络购物用户由 2006 年的 3357 万人增加至 2016 年的 4.67 亿人，占网民的比例达 63.8%，2017 年上半年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同比增速达 41.6%。网络交易成为消费者购买食品的重要方式之一。据《全国食品安全调查报告》显示，在购买食品的场所选择中，有近 40%的消费者选择在网店购买食品。

2. 增长势头迅猛

随着网购用户规模的快速增长，消费水平的持续提升，包括食品网络消费在内的网络购物增长显著。CNNIC 数据显示，2006—2016 年，全国网络零售交易额由 258 亿元增加至 51556 亿元，年均增速达 69.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 2006 年不足 4%增加至 2016 年的 15.5%。近年来，随着交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增速有所放缓。2016 年，全国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26.2%，其中，食品类增速显著，达到 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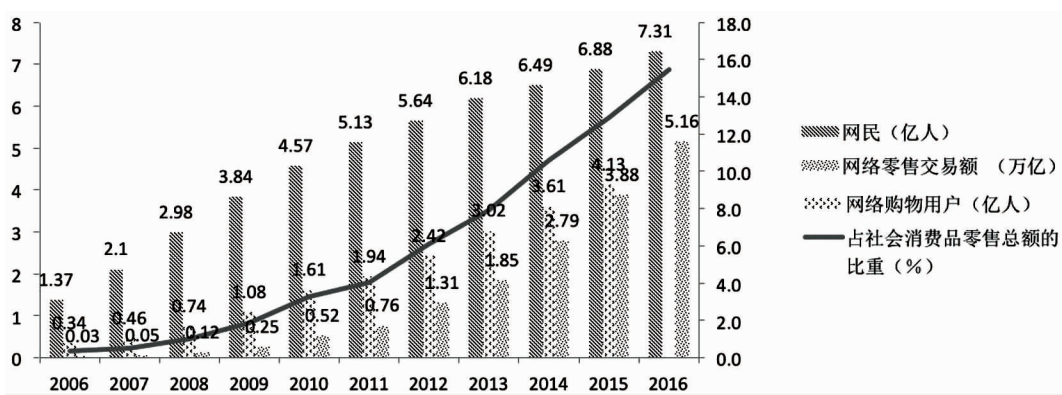


图 1 2006—2016 年我国网络购物市场规模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第 3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整理测算而得。

3. 消费潜力巨大

尽管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网络购物市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互联网普及率和网络购物渗透率（网购用户数量占网民数量的比例）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持续增长，网络消费还有较大的潜力。当前，网络购物已成为多数网民消费习惯。截至 2017 年 6 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 54.3%，网络购物渗透率在 60%左右。即国人中 50%以上为网民，网民中 60%左右为网络购物用户，而发达国家网络普及率和网购渗透率分别在 80%以上和 70%以上。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信息化加速推进，我国网民和网络购物者数量有望持续增长，网络消费市场蕴含较大空间。

（二）网络食品市场主要特征

1. 低成本

与传统的实体经营方式相比，网络食品经营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对网络食品经营者来说，首先，降低了交易成本。与传统商品流通模式相比，网络交易模式为食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建立了直接沟通交易的渠道，缩短了从产品到餐桌的距离，减少了流通环节，提高了商品的流通效率。其次，网店运营成本更低。网络食品经营由于不需要实体商店，房租成本明显低于实体经营，且消费者自行下单等参与程度的提高也减少了运营所需人力成本。此外，对网络食品消费者来说，网络购物的便捷性也减少了自身的时间成本。

2. 高灵活性

一方面，网络食品市场具有生产分散性特征。互联网为分散在不同地理区位的广大生产者建立了信息共享和交流协作平台，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往往连接了大量分散在各地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例如，“百度外卖”在成立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入驻了分布于全国 100 多个大中城市的数十万家餐饮商户。另一方面，网络食品销售流动性强。网络交易方式打破了传统食品销售方式下的时间和区域限制，交易时间上更为灵活，跨区域流通更为便捷。随着农产品网络直销、生鲜电商、进口食品电商等快速发展，网民进行食品网络购物的比例也持续提高。

3. 交易虚拟性

线上交易的虚拟性是网络食品经营的突出特征之一。网络购物过程中消费者既看不到也摸不着实物产品，无法通过传统购物环境下的观察或实际品尝等方式对真实的产品进行直观的挑选体验，只能通过浏览网络上相应的图片或文字描述等信息进行选择判断，难以掌握食品真实质量信息。

4. 强交互性

网络社会具有典型的开放性，网络食品交易中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利用网络平台交流互动更为频繁，消费者对产品信息或品牌的网络评价是食品网购者在网络虚拟交易中进行质量判断的关键因素。CNNIC 调查表明，网络口碑已超过价格因素，成为网购用户决策时最为关注的第一位因素，关注度达 77.5%。

二、网络食品安全问题的表现形式与发展态势

随着网络消费市场的迅猛发展，网络食品经营“野蛮生长”增长下网络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全国食品安全调查》显示，消费者认为网店是仅次于路边早（夜）市或小

摊贩之外的最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场所，57.13%的受访者表示网店最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一）网络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是无许可经营。根据《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的相关规定，网络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当前，网络食品交易平台准入机制不健全，准入门槛往往过低，缺乏对入驻企业商户的严格资质审核，网络平台中无证经营的商户、黑作坊等情况并不罕见，网络食品的卫生状况和质量安全更无法保障。

二是发布虚假信息。网络交易的虚拟性特点使得网络食品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很大程度上依赖网站发布的食品信息，网络食品生产经营者网上发布信息不真实，不完整，与实物信息不一致，“线上高大上、线下脏乱差”，误导消费者购买问题食品，是网络食品安全又一常见表现形式。如一些网络食品经营者不明确告知产品保质日期等信息，消费者购买到变质过期食品的情况屡见不鲜。

三是消费者隐私泄露。除了网络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之外，网络食品交易过程中消费者个人信息资料被公开、转让等用户隐私受到侵犯泄露等问题亦不容忽视。诸如买家给予卖家差评后收到短信电话骚扰、被泄漏转卖个人信息等“差评给不起，隐私受威胁”的新闻报道时有发生。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消费者个人信息网络安全状况报告》显示，网络个人信息被泄漏的情况极为普遍，约2/3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内个人信息曾被泄漏或窃取。

（二）网络食品安全态势

网络食品市场的特殊属性既为网络食品交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传统的食品交易方式下所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相比，网络食品安全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 网络食品安全隐蔽性问题更强

首先，信息不对称，质量安全不易辨别。网络食品交易中，消费者难以通过传统实体交易方式下的鉴别方式对网络食品安全信息进行评估，消费者信息劣势地位更为明显，网络食品生产经营者更容易通过网络虚拟性提供虚假信息、隐藏真实身份信息。以网络订餐平台为例，媒体曝光“饿了么”等问题以来，各地对网络订餐的监管查处力度不断加大，但问题餐馆的伪装手法也持续翻新，从证照不符到“阴阳地址”“一证多店”，再到查处下线后改头换面换个招牌再次上线等等。对于网络消费者鉴别信息的重要方式网络口碑和店铺信用来说，则催生“刷单炒信”以虚假交易提高网络卖家信誉等破坏网络

信用评价机制行为。

其次，分布散、环节多、范围广，加剧网络食品安全复杂性。网络食品市场生产经营者分布散、遍布范围广泛且涉及环节多等特点，也进一步增加了网络食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在网络食品信息发布环节，会出现提供虚假信息等问题；在第三方平台，则存在对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资质审查登记把关不严等问题；在线上线下结算环节，还可能出现支付安全问题；在运输配送环节，则存在物流派送保鲜保温等存储运输条件不达标等隐患。

最后，交易虚拟性下消费者维权难。一方面，网络食品市场作为新兴业态，当前政府监管尚未跟上发展速度，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仍有缺失，网络食品安全出现问题后消费者缺乏有效的维权方式，往往存在投诉无门的情况。另一方面，对网络侵权行为来说，由于网络食品经营的虚拟性，往往造成消费者举证难、监管者调查取证难等，对监管手段和监管方式带来新的挑战。

2. 网络食品安全流动性风险更为突出

网络食品市场的高灵活性加大了网络食品安全问题的流动性风险，网络食品跨区域性突出问题突出。网络食品生产经营者分散，食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地往往不在同一地区，网络食品跨省市、跨地域甚至跨国等异地购买情况普遍，常常出现异地维权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真空。对于问题网络食品，网络食品的生产经营者所在地，与网络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所在地，与消费者购买所在地分属不同监管机构的情况下，不同监督管理部门管辖权如何划分，以及中央、省、市、县以及基层执法机构在网络食品安全事权界定划分等问题都有待厘清。网络食品安全跨区域治理问题愈加紧迫。

3. 网络食品安全敏感性更高

与传统实体交易购买方式相比，网络食品购物人群的年龄结构更轻，收入水平更高，对食品安全的相关知识掌握得更为丰富，相应的维权意识更强，对网络食品安全的敏感性也更高。从网络食品购物人群的特征来看，《食品网购白皮书》显示 28~38 岁中青年全体占全部食品网购者的近半比重，职业分布上白领人群占近半比重。2016 年上半年，全国工商系统累计受理网络购物投诉 10.1 万件，同比增长了 66.2%。如何应对网络食品新业态带来的诸多难题，切实保障网络食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新挑战。

三、网络食品安全频发的原因分析

与快速发展的网络食品市场相比，监管体制机制、监管手段与方法同网络食品市场的发展态势还不匹配，如何处理好市场发展与行业规范之间的关系，如何破解网络食品

市场竞争的难题，以及如何创新监管模式，在更好地发挥政府监管作用的同时，更加有效地发挥市场与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有效促进政府监管与社会治理良性互动是确保网络食品安全的重要考量。

（一）市场发展与行业规范关系尚未理顺：如何处理发展与规范的关系

网络食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在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就餐方式的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推动经济的发展。但行业发展初期网络食品市场无序发展、快速扩张背后隐藏了诸多质量安全隐患。网络食品新型业态的兴起既有互联网企业创新发展的意愿，也存在消费者便捷用餐的市场需求。随着近年来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的出台，监管力度的加大，在执行监管相关规定要求的同时，如何扶持创业、促进市场良性发展，实现“有温度”的监管，需要新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的创新。理顺和处理好网络食品市场发展与行业规范之间的关系逐渐凸显。

（二）监管方式难以适应新业态发展：如何破解市场竞争的难题

网络食品交易新的发展业态下，网络食品交易平台对入驻企业商户的资质审核不够严格，网络平台中无证经营的商户、黑作坊等情况屡屡曝光甚至手段翻新，网络食品的卫生状况和质量安全更无法保障，与传统监管方式难以适应新的业态发展不无关系。尤其是网络平台在以扩展抢占市场为主要目标的竞争环境下，产生了市场“竞次”问题。互联网餐饮平台企业抢占市场阶段，为吸引网商户和消费者，倾向以降低市场门槛换取市场份额，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竞次怪圈。以“命令控制”式的传统监管方法，即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制定相应的标准、行政许可等，对不遵从的行为进行处罚或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等，已难以应对和解决新业态下产业的新问题。如《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按要求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者审查登记、食品安全自查等制度的或者未公开以上制度的，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但对以市场扩张为目的，背后动辄数十、上百亿元巨额融资支持的互联网平台来说难以真正起到警示作用。

（三）监管模式有待改革创新：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1. 在政府内部，多部门监管的困境仍然存在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经历了从“九龙治水”到“三位一体”的转变。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由过去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和卫生部（现国家卫计委）牵头，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分段监管的格局，转变为由管源头的农业部门、管生产流通和消费的食药部门、负责风险评估与标

准制定的卫生部门三家组成的趋向于一体化的监管体制新架构。新一轮食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推进了监管部门一体化，通过监管职能整合减少了监管环节，但食品安全领域多部门监管的架构仍未改变（胡颖廉，2016），带来监管成本增加、监管缺位、问责困难等问题（马英娟，2015）。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如何有效协同部门、提升监管效率的问题仍然存在。如对网络食品生产经营者网上发布信息不真实、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等问题，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归属工商部门查处，尽管食药部门在网络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苗头性问题，但由于不同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机制尚未建立，带来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真空。

2. 在政府外部，市场与社会的力量发挥不足

与传统的食品交易不同，网络食品市场生产具有生产分散性、交易虚拟性和高灵活性等特征，线下餐饮商户多、小、散的特点更为突出，线上交易信息的不对称性更为明显，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难度和挑战也更大。网络食品经营市场主体更为复杂，新业态不断出现，短期内监管资源难以匹配监管对象的迅速扩张。在新的交易方式下，仅仅依靠政府监管部门运用传统的监管手段已难以切实有效地实现消费者的健康保障。在监管主体上，当前仍以政府监管部门为主，企业、协会、社会参与不足；在监管手段上，以传统的查处罚款等事后监管为主，市场机制、信息技术的运用不足等等，已成为当前网络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迫切需要形成网络食品安全多元共治的新格局。

四、完善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政策建议：迈向智慧型监管

《牛津监管手册》指出，除了“命令和控制”这一传统监管机制之外，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监管方式（Baldwin 等，2010），而“智慧监管”正是许多发达国家在近年来监管改革中兴起的新型监管理念之一。Gunningham 和 Sinclair（1998）在环境监管领域率先提出了“智慧监管”的理念，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监管理念相比，智慧监管理论更强调新工具的运用、更关注企业社会等多方参与、更重视激励性监管的作用等（Gunningham 和 Grabosky，1998），为化解互联网社会下的市场监管难题提供了新的治理之道。迈向智慧型的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在落实“四个最严”，即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同时，还应更多地运用网络新工具，更好地发挥社会共治的作用，并更重视激励的作用，实现监管部门、消费者、被监管企业的多方共赢。

（一）政府部门：优化监管机制

一是探索建立网络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探索搭建统一的全链条的网络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整合企业、产品、物流等食品质量安全信息，对网络食品生产、流通运输、餐饮

服务等环节实施信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知情权。统一不同政府部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数据接口，有效对接食品药品监管、农业部门、商务部门等食品安全信息，并积极对接第三方平台、入网食品经营者建立的食品信息溯源系统。强化信息监管，及时公开信息，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二是提升基层监管能力。一方面，积极建立并运用网络监察系统，以网监系统为基础支持，对重点网站、重点品种开展在线检查和取证等工作。针对地址不符、实名不实等网络订餐平台在经营过程中的多发常见问题开展重点核查。另一方面，可对规模较大的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探索派驻监管人员，对平台的经营者开展排查，了解平台的审批条件和基础数据；对新申请的餐饮入网经营者提交的证照实施审核，防止平台审核人员与业务人员以及商家由于自身利益驱动而履行义务不实、发布虚假信息等情况。

三是强化线上线下同步监管。网络食品安全保障离不开线上网络食品经营的审查和处置，更离不开线下实际生产、运输配送等环节的安全保障和监管。建议在注重线上无证无照商户排查等基础上，积极开展线下无证餐饮的清查以及配送运输等线下环节的安全监管。对线下无证经营、配送运输等不符合相关标准等生产经营不良行为及时纳入网络食品经营监管黑名单管理，并定期向媒体社会公布。

四是加强横向部门协作和跨地区合作。探索建立网络食品安全联合协查执法机制，开展食药、工信、工商、发改等部门间沟通协作，共享部门间监管信息，联合开展网络食品查处专项执法行动。深化地区间配合，推动实现网络办案的跨地域办案无障碍。

（二）行业企业：加强行业自律

行业组织的协调监督是政府监管的重要补充，行业企业的良性发展可减轻政府监管的压力，提高监管的效率，网络食品的智慧监管离不开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离不开网络食品经营企业以及第三方平台的自我监管。发达国家的市场监管经验表明，行业组织的监管作用往往通过设立严格的人会资质和制定行业规范两方面实现行业自律（徐双敏，2016）。

发挥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中行业组织作用。首先，倡导食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组织设立适宜的人会门槛，以良好的信誉条件和经营口碑作为企业入会的重要资质条件。具有良好声誉的行业组织的人会企业也会让消费者更加青睐，才能为入会企业提供更好的保障，进而提高入会的吸引力。

其次，加强网络食品行业规范的制定，以行业规范提升行业企业的社会公信力，更好地促进行业良性发展和公平竞争。充分发挥食品、餐饮服务等行业协会正向引导、负向抵制的作用，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信用评价的正向激励、逆向淘汰作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最后，鼓励行业协会积极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培训。通过行业协会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解读和食品安全知识相关宣传、培训工作，引导网络食品生产经营者和第三方平台自觉履行义务，推进行业自律。

（三）消费者及第三方：积极参与共治

多方参与发挥社会共治的作用是智慧监管的重要理念，网络食品市场的高灵活性、强交互性等特征也要求消费者以及第三方的积极参与。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多元共治体系，变单一政府监管主体为政府监管、市场机制、社会监督等政府、企业、协会、公众、新闻媒体多元主体共治。鼓励第三方平台将消费者评价信息和政府监管信息等纳入入网餐饮商户的信用评价体系，引入消费者和政府部门的多维评价，提供入网餐饮商户按照食品安全指标由高至低的搜索排名，为消费者提供更高食品安全质量保障，激励入网商户提升自身食品安全水平，促进入网餐饮企业规范自律。加强网络消费教育，拓展消费者监督举报渠道，鼓励以大数据等新兴网络技术便捷消费者投诉举报方式、减轻消费者举证成本。

参考文献：

1. 孟璇：《对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探讨》，《法制与社会》2015 年第 12 期。
2. 胡颖廉：《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行政管理改革》2016 年第 6 期。
3. 胡颖廉：《食品安全理念与实践演进的中国策》，《改革》2016 年第 5 期。
4. 封俊丽：《完善我国网络市场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研究》，《食品工业科技》2013 年第 23 期。
5. 封俊丽：《网络食品市场中的柠檬问题探讨》，《商业时代》2016 年第 4 期。
6. 马英娟：《走出多部门监管的困境——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间的协调合作》，《清华法学》2015 年第 3 期。
7. 徐双敏：《市场监管的国际经验初探》，《中国行政管理》第 2016 年第 2 期。
8. Robert Baldwin, Martin Cave, and Martin Lodg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egu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 2010.
9. Neil Gunningham and Darren Sinclair, *Designing Smart Regulation*, <https://www.oecd.org/>, 1998.
10. Neil Gunningham and Peter Grabosky. *Smart Regulation: Design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责任编辑：谷 岳

我国银行体系突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孙晓涛

摘要：金融监管在逐步加强，作为处于我国金融体系主导地位的银行，其风险问题不容忽视。我国银行体系突出的金融风险点主要包括：一是不良贷款问题。银行不良贷款绝对水平和未来形势仍不容乐观，应对不良贷款的支出已经严重影响了银行利润，不良贷款压力制约了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二是债券业务风险。银行资金大量流入债券市场，小型银行风险问题突出，部分机构的高杠杆操作提高了债券市场脆弱性。三是资产管理业务风险。表现为资金规模庞大，业务大量交叉，创新层出不穷，监管不足。除此之外，还有金融监管领域存在的问题。为应对上述金融风险点，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监管理念、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金融机构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银行风险 不良贷款 资产管理业务 金融监管

作者简介：孙晓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金融风险问题引起了决策层面的高度重视，并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重要的位置。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从 2016 年末的数据来看，银行总资产占银、证、保总资产的逾 90%，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近 70%。金融业务交叉程度不断加深，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规模也不断扩大，作为金融体系资金的主要提供者，银行对于金融体系的影响不断加深。为贯彻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要求，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积极采取措施加强银行体系的风险防控，开展了将表外理财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考核，治理“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等工作取得积极效果，银行表外风险得到控制，跨行业、跨市场的复杂同业业务的快速增长势头得到遏制。但我国银

行体系仍然面临突出风险，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涉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是防控风险的重点领域。虽然不良贷款恶化势头有所缓解，但总体水平仍处于高位，银行仍面临较大压力。同时，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所形成的交叉风险突出，资管业务等影子银行风险不容忽视，金融监管对银行风险状况的影响需要引起关注。

一、当前银行体系风险的总体状况

（一）信用风险状况

银行不良贷款率止升，关注类贷款率回落，持续恶化势头得到遏制。2017 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1.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增速分别比上季度和 2016 年同期回落 2 个百分点和 14.1 个百分点，增速比全部贷款增速低 1.6 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为 1.74%，与上季度持平，连续 20 个季度持续攀升的势头得到遏制。关注类贷款余额为 3.42 万亿元，同比下降 1.6%，本轮不良贷款爆发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6 年同期增速还高达 23.6%。关注类贷款率为 3.56%，比上季度回落 0.08 个百分点，已连续 4 个季度出现回落。总体来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持续恶化的势头已经得到了遏制。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问题的高度重视，加大不良贷款、关注类贷款和存在风险隐患贷款的清收和回收力度，大力开展不良贷款打包转让，积极争取不良贷款核销。在新增贷款发放方面，商业银行普遍提高了风险控制力度，逐渐上收不良贷款高发地区分支机构的贷款审批权限，严格控制新增贷款流向，积极开拓政府类项目和个人贷款等信用风险较低的贷款领域。除商业银行自身努力之外，2016 年末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趋于平稳，企业经营情况整体稳定，也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形势的缓解提供了积极的外部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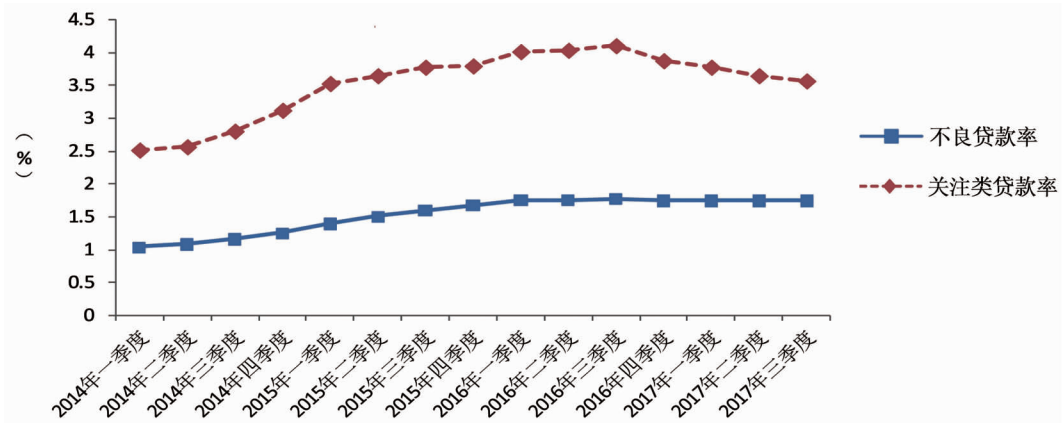


图 1 2014—2017 年三季度不良贷款率和关注类贷款率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银监会网站。

债券违约事件持续频发，银行机构风险敞口较大。2017 年 1—10 月，沪深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共发生债券违约事件 35 起，违约金额共 255 亿元，是 2016 年全年违约事件数量和违约金额的 63.6% 和 65.2%。银行间市场第一次违约发生于 2015 年 4 月，随后逐渐代替沪深交易所成为债券违约的主要市场。我国银行间市场的债券承销和债券持有主体均为银行机构，其违约事件频发对银行机构的影响较大。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融资特点并不突出，发债融资项目由银行推介，购买债券的资金由银行间协调，银行机构持有债券的信用风险由自身承担，银行机构资金通过非法人类产品持有债券的信用风险由于刚性兑付等原因目前也无法转移给投资者。整体来看，与不良贷款问题较为类似，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风险还主要集中在银行体系内部。

面对当前严峻的不良贷款形势，商业银行仍然能够按照监管要求及时补充贷款损失准备金，维持充足的拨备水平，提高应对信用风险的能力。2017 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已经达到 3.13%，同比提高了 0.04 个百分点，保持持续上升趋势。2016 年以来，拨备覆盖率结束了持续下滑的势头，总体保持稳定；2017 年三季度末为 180.39%，同比提升 4.87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的趋稳，一方面是商业银行大幅提取贷款损失准备，贷款拨备率持续提高，另一方面也受益于目前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势头得到遏制。

（二）流动性风险状况

同业存单推动银行主动负债占比提升。2017 年 10 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中，金融债券余额（排除银行业金融机构相互持有部分）为 4.57 万亿元，占比为 2.6%，比 2016 年末提高 0.5 个百分点，金融债券余额同比增速为 52.2%，虽然 2017 年以来增速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银行机构通过金融债券开展主动负债逐渐成为资金来源的重要途径之一，2017 年 1—10 月，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资金来源新增中，金融债券的占比为 8.1%，其中 1 月、5 月、8 月和 9 月资金来源新增中，金融债券占比更是分别达到 19.7%、13.6%、12.6% 和 13.8%。从金融债券结构来看，不排除银行业金融机构相互持有部分，2017 年 10 月末，政策性银行债、商业银行债和同业存单的余额分别为 13.23 万亿元、2.97 万亿元和 8.06 万亿元，分别比年初增加 0.84 万亿元、0.45 万亿元和 1.79 万亿元。同业存单已经成为银行机构通过金融债券开展主动负债的主要手段。从银行类型来看，中小型银行是银行体系内部主动负债的主体，2017 年 10 月末中小型银行来自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往来资金为 10.85 万亿元，大型银行仅为 1.34 万亿元。从中小型银行体系内部主动负债余额占资金来源余额的比例来看，近 2 年来也保持持续增长，至 2017 年 1 月末达到 11.8% 的高位，随后有所回落，2017 年 10 月末为 10.4%。

通过金融债券开展主动负债规模的快速增长，对银行机构负债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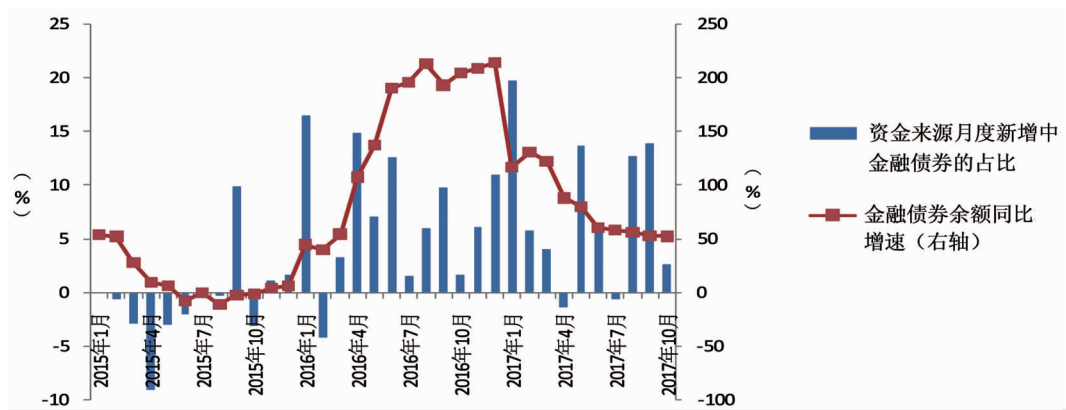


图 2 2015—2017 年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债券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注：金融债券金额已经排除银行业金融机构相互持有部分。

资金来源中的各项存款增速显著回落。2017 年 10 月末，存款类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速为 9.2%，2016 年初以来共下降 2.1 个百分点左右。虽然银行机构在资金运用方面同样积极开展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等，但对各项贷款的冲击相对有限，目前各项贷款增速能够相对稳定地保持在 13% 左右。各项存款增速持续低于各项贷款增速，导致商业银行存贷比指标持续走高，2017 年三季度为 70.01%，同比提高了 2.74 个百分点。从另外两个主要的流动性指标来看，流动性比率指标处于合理水平，2017 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流动性比率为 49.17%，同比增长 2.24 个百分点，说明商业银行仍然能够重视加强流动性管理。但超额备付金率指标出现下降，2017 年三季度末为 1.42%，从 2015 年 9 月人民银行改革存款准备金考核制度，由时点法改为平均法以来，超额备付金率整体下行 了 1% 左右。除制度因素外，超额备付金率的下行也表明了货币市场资金状况趋紧。

（三）市场风险状况

整体利率水平走高，利率债市场久期继续下行。经历了一年半左右时间的低利率后，2017 年以来整体利率水平开始提高，尤其是 1—3 月利率水平上行速度较快，4 月份以来利率上行压力有所缓解。2017 年 10 月，7 天回购定盘利率、3 个月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和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日平均值分别为 3.22%、4.37% 和 3.73%。受平均剩余期限持续下行的影响，我国利率债市场久期继续保持下行，2017 年以来，受利率走高的影响，市场久期下行程度进一步扩大。这表明我国债券市场价格受利率波动的影响程度减弱，由此减轻了银行机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债券资产的减值压力。未来国债市场平均剩余期限有望进一步下行，这主要受益于近年来我国短期国债品种的大量推出，尤其是 2015 年 4 月以来 6 个月期限的国债每月定期发行，2015 年 10 月以来 3 个月期限的国

债每周定期发行。但对于国开债和政策性银行债，随着债券发行历史不断加长，未来平均剩余期限下行空间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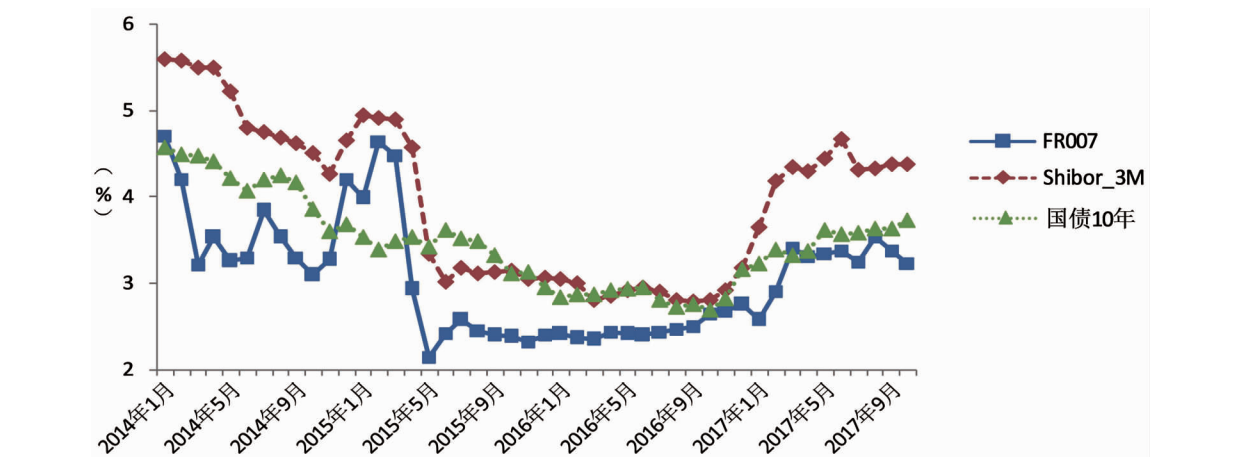


图 3 2014—2017 年代表性利率月度日平均值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FR007，Shibor_3M，10 年期国债的原始数据来自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网站，图中数据经过作者整理。

银行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比提高，受利率波动影响增大。交易性金融资产是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资产，银行持有的这类资产主要是受利率变动影响较大的债券资产。2017 年三季度末，沪深股市 23 家上市银行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资产总计 3.05 万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2.1%，近年来占比持续提高，分别比 2015 年末和 2016 年末提高了 0.7 个百分点和 0.2 个百分点。分类来看，近年来股份制银行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比持续大幅提高，2017 年以来有所企稳，2017 年三季度末为 2.2%，比 2014 年末提高 1.5 个百分点。城商行和农商行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比 2017 年以来提高较大，共 1.6 个百分点。

二、银行体系面临的突出风险点

（一）银行不良贷款问题

这一轮银行不良贷款问题起始于 2012 年左右的长三角地区，并逐步向全国扩散，成为近年来我国银行机构面临的最突出问题。虽然 2017 年不良贷款率指标企稳，但不良贷款的绝对水平和未来形势仍需引起关注。不良贷款的持续压力对我国银行机构的信贷投放、业务发展、机构管理等经营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造成我国目前银行体系乃至整个经济领域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

1. 不良贷款绝对水平和未来形势仍不容乐观

虽然 2017 年以来全国不良贷款率指标持续攀升的势头得到遏制，截至 2017 年三季度

末关注类贷款率也实现了连续 4 个季度回落，但不良贷款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一是不良贷款水平仍处高位且数量庞大。2017 年三季度末不良贷款余额为 1.67 万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为 3.42 万亿元，合计相当于商业银行 2016 年净利润的 3 倍。二是商业银行消化存量仍需时日。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来看，2017 年上半年分别为 12.3%、16.01%、15.62%、14.31%，虽然与 2015 和 2016 年相比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高位。

2. 应对不良贷款的资金支出严重影响银行利润

我国这一轮银行不良贷款问题从区域性爆发开始，至今已有 5 年左右的时间，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经历换档期，企业利润下滑、杠杆率较高、财务成本攀升、偿债能力下降。在此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目前能够维持在 1.74% 的水平，银行机构积极开展不良资产处置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打包转让和核销等处置方式造成了银行机构利润的严重损失。同时，我国商业银行 2017 年三季度末能够维持 180.39% 的拨备覆盖率，银行机构为此也大幅压缩了当期利润，目前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已经达到了 3.13%。从我国沪深股市上市银行数据来看，2014—2016 年，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长分别为 62.8%、52% 和 16.7%，而贷款期末余额同比增长分别为 11.8%、10.4% 和 12.2%，资产减值损失增速远高于新增贷款增速。资产减值损失作为营业支出的组成部分，2013 年与税前利润之比为 17.6%，随后逐年攀升，至 2016 年达到 46.1%。

3. 不良率较高是银行资金无法流向实体企业的重要原因

银行机构市场化经营均有趋利避害的特征，在目前不良贷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银行机构主动避免涉足风险较高行业，将资金更多用于风险较低行业。从我国不良贷款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是不良贷款的高发区，以工商银行为例，2017 年二季度末的不良贷款率为 2.15%，其中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分别为 4.41% 和 9.04%。与之相比，政府类项目和房地产项目信贷需求规模较大，不良贷款率较低，成为银行机构积极营销的对象，银行资金大量流入相关领域。

（二）银行债券市场业务的风险

我国近一轮债券牛市持续了两年多，债券发行规模快速增长，各类资金大量涌入，部分机构采取高杠杆博取高收益。2016 年底以来，债券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利率短期内明显走高，对市场造成较大冲击。受金融去杠杆、央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美国处于加息周期等内外部因素影响，未来债券市场很难出现大幅新增资金流入，债券市场已有风险问题会加速暴露。

1. 未来债券到期数量大幅增加，再融资压力较大

2014 年以来，我国企业发行债券的规模快速增长。中期票据市场由平均每年 7000 亿元左右跃升至 2014—2016 年的 9780 亿元、12780 亿元和 11450 亿元，公司债（不含私募债）市场由平均每年 1000 亿元左右跃升至 2015—2016 年的 5250 亿元和 12860 亿元。我国企业类债券期限以 5 年期居多，3 年期次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企业类债券到期数量将大幅增加。中期票据、公司债（不含私募债）、企业债合计总偿还量，将由 2016 年的 11400 亿元跃升至 2017 和 2018 年的 14600 亿元和 15500 亿元。大量到期企业债券需要再融资，一方面会对债券市场产生较大的冲击，进一步抬高利率水平，另一方面目前较高的利率水平也会提高企业再融资成本，为经营依然没有明显改善的实体企业带来更大负担。

2. 银行资金大量流入债券市场

近年来，大量资金流入债券市场的推动力量是同业存单、同业理财、债券投资业务链条的形成和扩张。在此业务链条中，银行机构之间首先根据自身特点寻找合理位置，资金最终直接或委托非银行机构投资于债券市场。具体来看，同业存单方面，国有银行存款较为稳定，接收货币政策规模较大，同业存单发行规模不大。2017 年 6 月末，国有银行和邮储银行同业存单发行占比仅为 1.3%；股份制银行和部分规模较大城商行做大规模冲动最为强烈，同业存单发行最为积极，其他城商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传统存贷业务受阻的情况下，也积极参与同业存单赚取利润，股份制银行同业存单发行占比为 43.7%，城商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其他银行机构占比为 55%。银行理财方面，大型商业银行依靠销售渠道广、信用等级高的优势，可以抢占个人、机构客户、私人银行客户，小型银行对同业理财产品的依赖程度更强。最终，业务链条中，小型银行发行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直接投资或委托外部投资于债券市场，大型银行通过存款和非同业类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投资小型银行发行的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同时还存在较大银行通过同业存单募集资金投资于较小银行的同业理财。

3. 小型银行机构受债券市场波动影响较大

在同业存单、同业理财、债券投资所形成的业务链条中，处于链条末端的直接或委托投资于债券市场的小型银行机构面临的风险更大。一是债券市场风险。大型银行处于业务链条前端，资产端的配置更多为小型银行的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小型银行处于业务链条末端，率先承受了债券市场风险，成为大型银行债券市场风险的缓冲。二是期限错配。为了提高资产端收益来弥补负债端成本的不断攀升，银行债券投资普遍提高久期，通常到期期限在 2 年左右，而银行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通常为半年左右，小型银行同业负债和债券投资模式存在较强的期限错配。三是流动性风险。2017 年以来，我国利率中枢整体上移，增加了小型银行滚动发行同业存单和提前处置债券资产的成本。同时，银行

之间购买理财的忠诚度也不高，同业理财流动性风险也较大。

4. 高杠杆操作提高债券市场系统性风险

在长达两年多的债券牛市中，非银机构普遍采用高杠杆博取高收益，回购交易被各类机构普遍采用，证券公司和基金子公司的资管计划、私募基金等普遍采用分级模式，杠杆率进一步提升。从银行间市场来看，2014 年证券公司和基金类机构质押式净正回购合计为 14.8 万亿元，2015—2016 年分别达到 34.3 万亿元和 50.6 万亿元，增速分别达到 131.2% 和 47.5%，2017 年上半年为 20.2 万亿元。机构高杠杆率操作提高了自身脆弱性，降低了抵抗风险能力。从债权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来看，风险之间的传染性增强，市场风险更容易转化为流动性风险。在目前利率由低位向高位过渡阶段，高杠杆机构对利率上涨的承受能力较弱，被迫抛售债券降低杠杆率，并引发利率继续上行，进一步触及杠杆率略低机构的承受水平，由此形成机构降杠杆和利率攀升的恶性循环。利率风险引发机构的流动性风险，并形成两类风险的相互促进。

（三）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快速扩张，银行大量资金通过资产管理业务流向表外，突破原有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由于各类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纷纷涉足，资产管理行业资金规模迅速膨胀，机构间存在大量业务交叉，建立在有限基础资产之上的快速膨胀的庞大资金提高了体系的脆弱性。2017 年 11 月，央行就《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我国资管行业统一监管取得了重大进展。

1. 银行大量资金通过资产管理业务流向表外

通过资产管理业务，银行机构将原有存贷款业务转移至表外。从负债端来看，个人和企业存款转换成银行理财产品。2017 年 6 月末，全国银行理财资金账面余额 28.38 万亿元，其中个人类产品余额为 13.14 万亿元，机构专属类产品余额为 6.48 万亿元，分别占比为 46.3% 和 22.8%。两类产品与住户和企业存款之比为 16.4%。从资产端来看，贷款业务转换成对接银行理财产品。2017 年 6 月末，银行理财产品中有 16.1% 配置了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10% 左右配置了权益类资产。银行体系通过存款准备金制度、资本充足率考核、贷款损失准备制度等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降低了靠负债运行的银行机构的风险。资产管理业务使得银行机构能够将表内的存贷款业务转移至表外，逃避相关制度约束，大幅降低了成本，但却提高了风险水平。

2. 过度复杂提高资管行业整体脆弱性

资产管理机构间存在大量业务交叉，从资金来源方至资金最终使用方之间资金链条

过长、业务环节过。加之不同类型机构对资管产品存在或明或暗的担保责任，资产管理业务过于复杂，相关机构责任很难有效区分，风险有效识别性较弱，提高了系统的脆弱性。以宝能万科事件为例，浙商宝能产业投资合伙企业的资金流入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和前海人寿，用于购买万科股票。浙商宝能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注册资金 200 亿元，其中 132.9 亿元来自有限合伙人华福浙商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此计划为华福证券公司的通道业务。浙商银行理财产品资金通过五矿信托的通道业务进入浙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后，购买了华福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在整个链条中，银行理财产品最终投资了上市公司股票，其中经过信托和证券公司两个通道业务。

3. 金融监管模式面临挑战

近年来，金融类和非金融类机构均对资产管理业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预期未来的大资管时代，纷纷涉足或者做大相关业务，使得资产管理行业机构庞杂、创新层出不穷、业务种类繁多，传统金融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传统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边界也变得模糊。

一方面，资产管理业务逐渐形成对传统金融业务的替代，传统金融业务也开始向资产管理业务模式靠拢。银行机构通过理财产品对接项目实现了对传统存贷款业务的替代。证券公司及其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子公司通过一对多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实现了对传统债券融资的替代。与此同时，传统金融业务也在发生转变，如新锐保险公司积极开展短期高回报万能险业务，资产端广泛配置于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业务形态更加趋近资产管理业务。由于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银行、证券、保险传统业务之间的边界已经变得模糊。

另一方面，非金融机构涉足资产管理业务使得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网贷公司线上募集资金、线下找项目，互联网消费金融公司线上推销消费贷款、线下找资金，金交所的理财产品也大量通过线上进行代理销售，借助自身平台优势投资相关项目。与私募性质的资产管理业务不同，这类业务依靠互联网可以大幅提高受众面，实现与传统银行业务、信托业务、公募基金业务的竞争，使得相应业务更大程度地向传统金融业务靠拢。从目前情况来看，非金融类资产管理机构资金募集和使用还缺乏有效监管，同时机构自身实力有限，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线上发售，受众面提高，风险事件处理难度增大。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实行的是中央集中的分业监管模式。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业金融机构、保险业金融机构作为金融机构统一由中央设立监管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设立金融工作办公室，监管地方性的类金融机构，如代理银监会管理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交易场所等。在银行、证券、保险传统业务之间的边界已经变得

模糊、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的情况下，现有金融管理体制存在无法适应的情况。

4. 资管行业监管框架的形成与挑战

我国目前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模式，面对各类金融机构资管业务大量交叉，现有监管模式显得力不从心，监管协调不足。由此，形成资管行业统一监管规则得到普遍认可。2017 年以来，统一监管制度制定进程加快，11 月，人民银行就《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有文件明确了资管业务和资管产品的定义，从募集方式和投资领域两个维度对资管产品进行了分类，将投资者分为不特定社会公众和合格投资者两类，成为制订相关制度的基础。未来资管业务监管原则将包括：严控风险、服务实体经济、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解决目前问题与留出发展空间相结合、积极稳妥审慎推进。目前的《指导意见》为资管行业统一监管指明了方向，从未来看，推进资管行业统一监管是大势所趋，但从具体过程来看，统一监管措施的推进仍面临一些挑战。一是期限错配。从负债端来看，银行理财产品主要以 1 年期以内的短期产品为主，从资产端来看，按照工程施工周期，期限则通常达到 3~5 年。按《指导意见》给出的截至 2019 年 6 月的过渡期，银行控制期限错配风险的压力将陡增。二是刚性对付。《指导意见》提出资管产品实行净值化管理，这是打破刚性对付的有效手段。但银行理财产品的吸引力在于安全性，短期内打破刚性对付将使赎回压力陡增。对于以债券为投资标的银行理财产品问题更加突出，按债券持有到期方式计算理财产品收益率银行承担风险有限，但按净值管理，银行理财产品将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四）金融监管领域存在的问题

1. 监管不足导致我国资产管理行业通道化

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刺激政策，使我国企业和银行都产生了强烈的信贷扩张冲动。在监管部门控制信贷规模的压力下，银行机构开始通过银行理财产品对接信贷项目达到出表的目的。由于银行理财产品无法直接对接信贷项目，通道业务便应运而生。开始涉足通道业务的是信托公司，2012 年以后，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纷纷涉足，由此形成了银信合作、银证合作、银证信合作、银基合作、银保合作等各种形态的通道业务模式。面对各类机构争相开展通道业务的情况，各金融监管部门直到目前仍无法形成一个监管配合机制，导致监管套利行为盛行，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严重偏离代客理财和提高自身投资能力的本质。

2. 监管制度执行不到位

我国已经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金融监管规章制度体系，但现实中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表现为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缓冲地带，容忍金融机构打擦边球，处罚机制执行不严格等。究其原因，一是监管部门存在适度监管的观念。目前金融领域的业务模式发展日新月异，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监管部门思想上存在适度监管的理念，对现有制度执行不到位。二是行业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平衡把握不准。金融监管部门在对风险进行预防和处置的过程中，会掺杂考虑行业的发展问题，导致对各类潜在风险投鼠忌器。三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关系复杂。金融监管部门在观念上和现实中均存在扶持行业做强做大的义务，金融监管部门很难做到零容忍，很难做到违规必究。

3. 非金融机构类金融业务存在监管真空

近年来，我国非金融机构涉足类金融业务大量涌现，风险事件也大量暴露，虽然与金融机构相比，涉及的资金规模还不大，但这类业务通常与居民联系密切，涉及人数较多、范围较高，风险发生后的牵扯面较高，容易引发社会问题。由于这类机构数量较多，准入门槛较低，人员流动较大，业务通常跨越不同监管领域，又通常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各金融监管部门介入意愿不强，导致监管真空问题大量存在。其中与银行体系风险密切相关的是个人对个人（P2P）网络借贷和区域性金融资产交易所资产管理计划等资产管理业务，一方面部分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利用这类渠道资金的企业可能同时利用了银行的信贷资金。虽然 2016—2017 年以来，我国逐步加强了对相关领域风险的重视程度，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

三、应对措施

（一）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要继续保持稳健的总基调，增强货币政策定力，形成稳定市场预期，维持金融机构逐步压缩表内外资产规模的态势，挤出金融体系内部循环的过量资金，稳步去除金融体系风险隐患。继续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增强银银间回购定盘利率的影响力，形成我国货币政策的市場基准利率，引导以银银间回购定盘利率为参考利率的利率互换交易的活跃度，提高利率传导效果。提高中期借贷便利（MLF）和补充抵押贷款（PSL）等货币政策工具对 Shibor、国债收益率曲线、LPR 等基础利率的引导作用，增强基础利率在债券发行定价等领域的参考作用。支持同业存单业务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公开、透明、高流动性的特点，将其打造为银行同业业务的主力产品。但要避免同业存单业务发展过快，造成部分银行机构主动负债水平过高，建议将同业存单纳入现有同业业务管理体系。

（二）发挥宏观审慎政策逆周期调控作用

协调货币政策手段，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坚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增强 MPA 考核政策的引导作用，赋予 MPA 考核更灵活的政策手段，实施非对称的差别准备金调节机制，增强达标机构存款准备金下浮空间。进一步扩大宏观审慎政策范围，重点研究制定资产管理行业宏观审慎逆周期调控政策，在现有资管行业统一监管框架下，与微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使资管行业真正回到受托理财的业务本源，有效降低资管行业潜在风险。重视对多牌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集团的管理，将重点企业纳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加强监管。由于此类集团下设机构众多、业务繁多、管理复杂、涉及多种金融牌照，建议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建立相应的监管框架。

（三）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一是确立全面监管理念。所有金融活动都要在监管视野之内，所有的信息监管机构都要能看得到，所有的行为监管机构都要能监管到。二是确立依法依规监管理念。明确树立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权威性，对于现有制度，不允许监管主体自己去判断管还是不管，不允许市场主体自己决定遵守不遵守。对于需要进行政策扶持或政策豁免的行业或企业，应该首先体现在制度和文件上。三是正确认识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对于新出现的金融业态和业务，监管部门需要主动了解其运作机制，及时给出监管红线，根据业务发展情况逐步更新监管红线，达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在业务发展成熟后，及时出台相关监管制度文件。

（四）协调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

逐步提高功能监管在整个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占比，适应金融机构业务交叉扩大的趋势，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过度。一是明确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界限。对于资产管理行业等共性业务，要发挥功能监管的主导作用。建议由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牵头制定规则，各监管部门制定相关细则，监管细则需要以功能监管规则为依据，并且监管强度不能弱于功能监管规则。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类金融机构传统业务实施机构监管，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纳入人民银行监管范围。二是建立有效的监管协调体系。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金融交叉业务领域监管协调功能，研究新出现的金融业态的功能划分问题，对于无法划分到现有金融功能的金融业务进行新功能定性，并明确监管归属。三是明确集团内部各金融功能相互独立原则，对业务形态已经成型的金融功能进行拆分，提高功能监管的效率。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需要对其资产管理业务进行拆分，成立相应子公司进行运营。

（五）金融机构要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一是加强流动性风险防范工作。银行机构要合理控制主动负债规模，拓展资金来源渠道，提高主动负债管理的能力，及时做好压力测试，提前做好备付金准备工作和融资安排工作，提升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银行机构要密切关注债市、汇市、股市波动的影响，完善应急预案，防范市场风险向流动性风险转化。二是注重金融机构的交叉风险。金融机构要平衡好金融同业业务利润与风险的关系，提高对风险的重视程度，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全面做好风险管理工作。金融机构要逐步摆脱对提供扩大投资范围和规避监管的通道业务的依赖，回归金融业务本源，降低金融业务跨行业、跨市场的复杂程度，避免系统性风险。三是主动打破刚性兑付。在有选择性的和数量可控的情况下，打破刚性兑付问题，使信用风险溢价真正体现出来，使整个金融体系摆脱为风险溢价买单的零和博弈。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分支机构和销售渠道的管控能力，要重视金融产品销售合规问题，要加强内控管理，堵住内部漏洞。

参考文献：

1. 连平、许文兵：《双重压力下的银行风险》，《中国金融》2017年第15期。
2. 马玉荣、李佩珈、邓海清、郑联盛：《中国金融监管框架谋变》，《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第9期。
3. 祁红：《从“万宝之争”看中国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下的金融监管》，《西南金融》2017年第3期。
4. 沈伟：《中国的影子银行风险及规制工具选择》，《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
5. 杨凯生：《控制试错成本是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基础》，《中国经济导报》2016年8月17日。
6. 张吉光：《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与应对》，《中国金融》2017年第5期。
7. 张守川：《对经济下行期商业银行风险管控的几点思考》，《国际金融》2015年第3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 产业 发展 ·

软件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林笑跃 董庆伟 高小玉

摘要：软件产业涵盖的产业类型宽泛，适用的知识产权类型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商业秘密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用权，软件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场景和问题也因交易标的的不同而表现各异。随着技术发展，行业自主创新需求压力日益迫切，软件行业发展演变带来的知识产权场景变化，软件行业不断分层带来的知识产权关注诉求分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需求也越发迫切。因此，需要不断加强软件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和力度，有针对性的对待软件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问题，通过促进行业专利标准化逐步制定行业规则，协调产业引导政策以鼓励软件行业发展知识产权实力，从而不断提升我国软件产业在软件贸易中的竞争力。

关键词：软件贸易 知识产权 专利标准化

作者简介：林笑跃，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外观设计审查部部长；

董庆伟，北京知翌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小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外观设计审查部综合处副处长。

随着中国制造 2025 战略的不断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特征不断加深，信息产业中最为重要的软件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同时，随着软件产业的国际化分工愈加精细，软件贸易逐步成为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出口的主要形式，对我国出口总值的贡献度不断提升。提升软件贸易的竞争力，支撑软件行业的自我升级和创新发展，既需要软件企业的创新和进步，更需要激励软件创新的制度和环境。知识产权作为激励创新的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① 可以有效激励和保护软件企业的研发及创新，促进软件行业向

^①许春明：《解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国知识产权报》2015 年 4 月 10 日。

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在软件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一、软件行业知识产权现状

知识产权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是一种无形财产。知识产权制度随着科技的发展应运而生并不断完善，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版权（也称著作权）、商业秘密专有权等形式。软件行业的范围大致包括集成电路（IC）设计、通用软件产品、嵌入式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务和系统集成服务等五个细分产业类型。不同的产业细分领域，适用的知识产权类型和规则会有所区别，甚至有较大差异。但总体而言，知识产权制度创设的初衷是通过保护产业的创新成果，更好地激励和评价行业的创新强度，从而不断优化行业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推动行业不断转型升级。

（一）软件行业相关的知识产权概念逐步清晰

软件知识产权是计算机软件人员对自己的研发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问题是自 20 世纪 50、60 年代随着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

目前，国际上对软件知识产权的保护法律还不是完全一致，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著作权法来保护软件知识产权的。专利方面，国际主流做法对软件相关专利保护的态度较为开放，对于计算机可读介质、计算机程序产品都给予发明专利做法，美国对数据结构也可以进行专利保护。在美国、日本、欧盟、韩国和中国，软件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 User Interface，简称 GUI）逐步都可以进行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商标方面，在适用《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的大多数国家，涉及电子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广告、金融事务、通讯服务、在线影音服务、云计算和云存储、社交网站等的软件产品及服务均可以进行商标保护。在软件中涉及的集成电路方面，美国、日本、瑞典、英国、德国等国也相继制订了自己的布图设计法，确认布图设计的专有权，给予其他知识产权保护。

（二）我国软件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不断健全

在我国，对于计算机软件进行保护的法律保护形式很多，如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根据软件自身的特点，软件应用于不同的目的、表达不同的形式，可以采用不同的法律保护形式。

1. 软件的著作权保护。软件著作权保护是软件常用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式。1991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1992 年 4 月，《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颁布并实施。1998 年 9 月，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成立。2001 年 12 月和 2012 年 2 月国家版

权局分别对软件保护条例和登记办法进行了修订，在 2001 年修订中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制度修正为自愿性登记。

表 1 我国软件知识产权有关法律列表

序号	名称	实施时间	修订时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1983 年 3 月 1 日	2013 年 8 月第 3 次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1983 年 3 月 10 日	2014 年 4 月第 3 次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1985 年 4 月 1 日	2008 年 12 月第 3 次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1992 年 12 月 21 日	2010 年 1 月第 3 次修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1991 年 6 月 1 日	2010 年月 2 第 2 次修订
6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1991 年 6 月 4 日	2013 年 3 月第 2 次修订
7	《反不正当竞争法》	1993 年 12 月 1 日	2018 年 1 月修订
8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2001 年 10 月 1 日	

2. 软件的专利权保护。1985 年，我国开始实施《专利法》，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形式，发明保护期限 20 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保护期限 10 年。根据软件产品的特点，可以选择不同的专利保护形式。其中，软件产品的构思如数据处理方法和用户界面是软件产品价值的核心，也是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的常见形式。软件产品的主要数据处理方法包括数据的处理逻辑和流程，一般涉及软件产品的核心算法，可以申请发明专利予以保护，体现为软件产品的内在价值。

软件的用户界面可以采用申请外观设计专利予以保护，保护的是软件的 GUI 界面，体现了软件与用户交互的逻辑及软件的外在形态，应用领域包括计算机、手机、电器、仪器、仪表、工业设备、电子乐器等，是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重要形式。2014 年 5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第 68 号局令，正式将符合条件的带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纳入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客体。

3. 软件的其他知识产权保护。软件行业是新兴的高科技产业，软件企业具有传统企业没有的高科技、服务性、网络化等特性，软件企业的品牌管理和商业秘密也有其独特性。软件具有存在形式与交易过程“不可见性”特点，其商标使用方式也由此不同于有形商品或普通服务。对于计算机软件是否属于商业秘密，应结合具体情况，从是否符合构成商业秘密需要的条件的角度加以具体分析，如果满足商业秘密的构成条件则应当作为商业秘密来给予保护。

由于现有专利权和著作权对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均不适用，我国自

2001 年 10 月 1 日开始施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专有权进行注册登记。但是业界对于芯片等半导体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目前还大都通过制程、工艺和上层的指令集等非 IC 设计因素予以实现，所依赖的也并非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而是制造工艺中的商业秘密、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类型。

（三）我国软件知识产权数量快速增长

信息技术是数字时代的真正基石，有专家预测，在物联网的推动下，全球数据量预计到 2020 年将会增长 800%。^① 2016 年，全球信息技术方面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保持 15% 的快速增长，全球排名前 10 的创新机构中，我国占据 4 席。

表 2 2016 年信息技术领域全球排名前 10 位的创新机构

公司	国家	发明数量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	8231
IBM	美国	7433
佳能	日本	5982
三星	韩国	5746
中兴	中国	3317
理光	日本	3108
LG	韩国	2746
华为	中国	2740
谷歌	美国	2706
联想	中国	2595

数据来源：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2017 全球创新报告——进无止境》，2017 年 9 月 26 日。

随着一系列鼓励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软件企业自主开发的产业政策出台，我国的软件产业发展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软件著作权的登记量也呈现出阶段性跨越式增长。2006—2016 年，全国软件著作权登记量以平均每年 35% 以上的速度保持高速增长。

2016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收到 GUI 申请 9864 件，较 2015 年（6638 件）增长 48.6%。从申请人分布来看，91.7% 的 GUI 申请来自国内申请人，体现出国内对于 GUI 申请的强烈需求以及我国在 GUI 类产品方面的创新能力。将目前国内已授权 GUI 外观专

^①汤森路透：《2016 全球创新报告》，2016 年 5 月 11 日。

利的界面类型进行分类，大致分为设备专用界面、通用操作系统界面、网页应用界面、应用软件界面四类，在专利数量上应用手机软件界面明显领先于其他三类的专利申请数量（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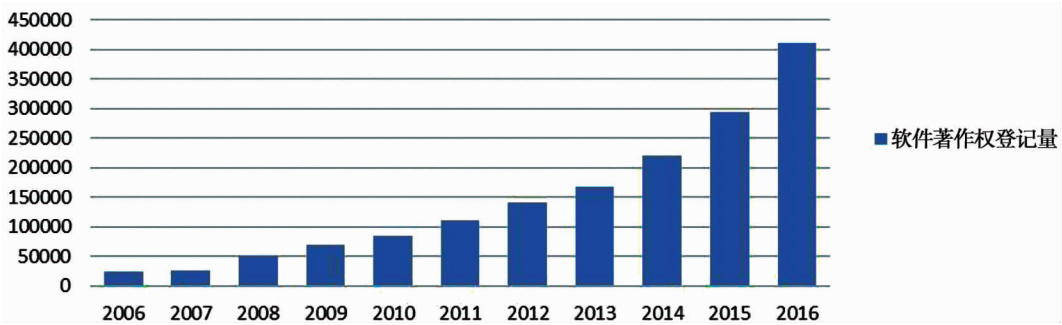


图 1 2006—2016 年我国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10—2016 年《中国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分析报告》数据整理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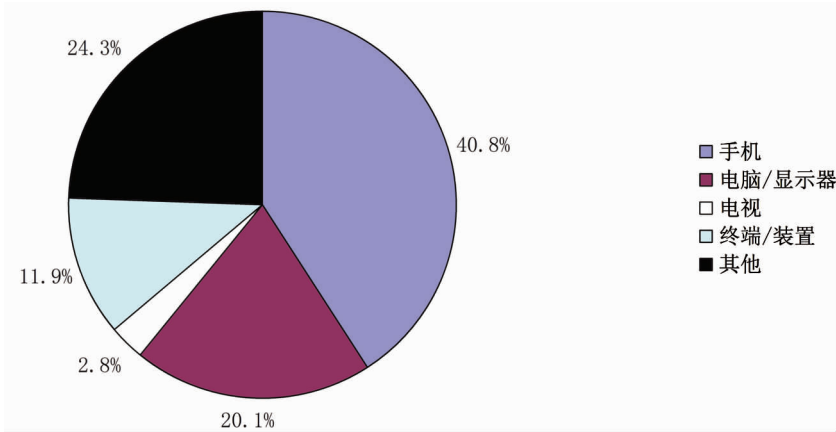


图 2 2016 年 GUI 外观专利主要类别分布图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审查部。

（四）软件知识产权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2015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对软件相关的知识产权工作提出了目标和方向。在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中，对软件相关知识产权也提出了具体的指标和要求。

2016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专利密集型产业目录（2016）》，与软件直接相关的有 2 大产业 11 个中类。充分说明了软件产业具有明显的专利优势，依赖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参与市场竞争，产业成长性好，与创新发展的政策导向高度契合。

表 3 “十三五”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主要指标

指标	2015 年	2020 年	累计增加值	属性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6. 3	12	5. 7	预期性
PCT 专利申请量（万件）	3	6	3	预期性
植物新品种申请总量（万件）	1. 7	2. 5	0. 8	预期性
全国作品登记数量（万件）	135	220	85	预期性
年度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亿元）	750	1800	1050	预期性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万件）	29	44	15	预期性
规模以上制造业每亿元主营业务收入有效发明专利数（件）	0. 56	0. 7	0. 14	预期性
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亿美元）	44. 4	100	55. 6	预期性
知识产权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20	20	—	预期性

表 4 2016 年与软件相关的专利密集型产业目录

专利密集型产业分类名称	国民经济行业代码	国民经济行业名称
一、信息基础产业	391	计算机制造
	392	通信设备制造
	393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394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396	电子器件制造
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51	软件开发
	652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653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654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655	集成电路设计
	659	其他信息技术服务业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扶持计算机软件等相关产业发展，加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有效利用”。《2017 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推进计划》进一步提出，“完善计算机软件等知识产权产品的核算方法；加强网络侵权盗版治理，突出软件等重点领域的专项整治”。

（五）新兴软件领域的专利保护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现行专利制度对技术及其创新高度的理解均基于工业时代的烙印。在现阶段，当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重新构建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时，现行专利保护政策与科技创新的显示需求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我国《专利法》不排除计算机软件作为专利保护的客体，但在专利审查中却被视为较为特殊领域。

表 5 我国专利审查中关于软件专利的特殊规定及发展演变进程

相关规定	1987 年	1993 年	2001 年	2006 年	2014 年
保护客体总要求	利用了自然力，对客观世界进行了改造，具有专利法所规定的技术解决方案	其解决方案执行计算机程序的目的是解决技术问题、其采用技术手段、并能获得技术效果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专利保护类型	应当为“方法”发明	方法权利要求、装置权利要求均允许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特别排除的权利要求主题	计算机程序本身不被允许	无变化	无变化	计算机程序本身、程序记录介质、程序产品均不被允许	无变化
撰写形式的特殊要求	无	无	倡导：装置与方法权利要求对应一致撰写	明确：装置权利要求需与程序方法对应一致	无变化
图形用户界面	无	无	无	无	可以，但必须与产品结合

从表 5 可以看出，我国自 1993 年开始给予软件专利以产品类型的保护，但自 2006 年以后专利的授权标准却再无变化，^① 仅在 2014 年 5 月开始对图形用户界面进行保护，但因为目前的外观设计专利制度不保护部分设计，图形用户界面要求必须是与产品的结合，这不利于软件界面的表达和保护。

“十二五”期间，我国累计登记物联网软件 26307 件，年均增速 138.02%；登记 App

^①李熙：《互联网+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软件专利保护政策的若干思考》，《审查业务通讯》2017 年 3 月。

软件 105037 件，与 2014 年相比增长 86.77%，与 2012 年相比增长超过 800%。^① 2016 年，我国大数据以及虚拟现实（VR）两类新技术领域的代表软件登记增速连续两年超过全国软件登记整体增长，共登记 VR 软件 856 件，与 2015 年相比登记数量增加 817 件，增势凸显。^② 这充分说明我国在物联网、App、大数据、VR 等新型软件领域的快速发展。同时，这迫切需要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的专利方面进一步完善，才能适合我国在新兴软件方面的快速发展。

二、软件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体现创新成果保护的无形产权，本质上是一种私权，但其权力的确定和运用又与行政、司法等公权力的运行密不可分。在此背景下，知识产权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明确地体现为两种工具，一是作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工具，二是作为控制产品流通的贸易工具。因此，贸易场景下的权力运用是知识产权制度效应发挥的主要场景之一，软件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因素也是整个软件行业知识产权问题的主要构成。

（一）软件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非关税壁垒

世界范围内的国际贸易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大类型。软件贸易的范围比较宽泛，同时涵盖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种类型，软件产品和嵌入式软件贸易大致属于货物贸易范畴，软件技术服务、IC 设计和 SaaS（软件即服务）云服务大致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所以软件贸易是一个统称概念，其所指的五种细分行业发展模式和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各有不同，有必要针对各细分行业逐一解读。

近年来，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权不断以非关税壁垒的形式，越发频繁地出现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场景中，其中尤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ITC）发起的 337 调查为典型。337 调查针对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企业，一般以侵犯知识产权调查为主，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一旦被认定违反该条款，后果可能招致包括对物、对人的全面禁令。2017 年美国对我国企业发起 337 调查 24 起，^③ 占发起调查总数的 37.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等涉及软件行业的企业和领域是调查重点，^④ 理由全部是专利侵权。

^①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十二五”中国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分析报告》，2016 年 4 月 26 日。

^②中国版权保护中心：《2016 年中国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分析报告》，2017 年 7 月 14 日。

^③商务部：《2017 年商务工作年终综述之十四 积极开展贸易救济工作 切实维护贸易秩序和产业安全》，商务部网站，2018 年 1 月 19 日。

^④李晓丹：《“337 调查”报告：美国近半数调查针对中国》，《经济观察报》2017 年 6 月 23 日。

据统计，专利侵权一直以来就是美国启动 337 调查的最主要诉由，详见图 3。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走向海外，通过专利布局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将是我国企业未来的必修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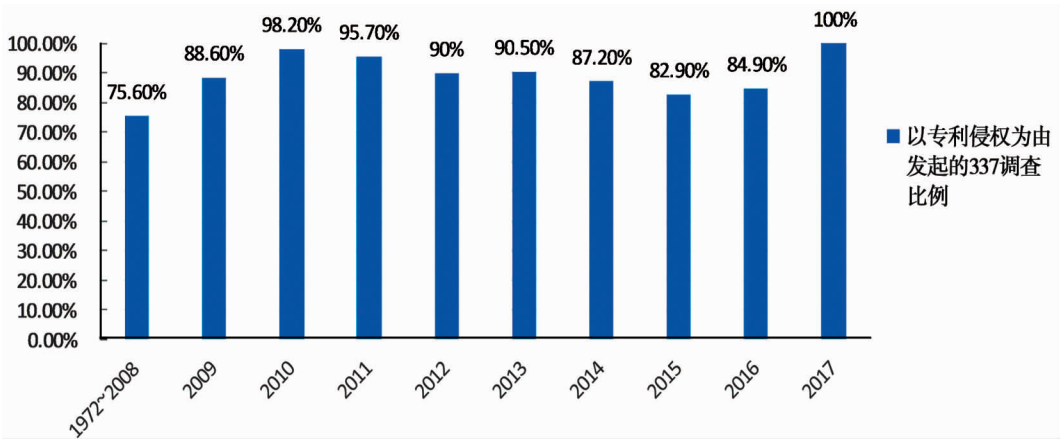


图 3 历年美国 337 调查中专利侵权的比例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数据整理而得。

（二）软件产品行业以软件著作权为主的商业模式

软件产品一般是通用的系统软件、应用软件、行业软件和中间件等软件成品。在这个领域中，我国面临国外软件开发商的强力垄断，知名的系统软件、行业软件基本被国外软件企业垄断，如微软、SAP 和甲骨文等。软件产品的知识产权主要是著作权，其次是专利权。软件著作权在软件产品的贸易中多以软件许可证的形式予以确认和体现，随着复制分发技术的进步，基于软件著作权的软件许可证销售仍将是软件产品的主要获利模式。

软件产品企业，也就是软件产品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可以凭借依附于软件产品上的知识产权，通过排除目标市场上的竞争者，来赋予软件产品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但在具体市场运作中，不同的知识产权类型作用于市场的方式和权重也有所不同。软件著作权是软件产品企业应主要关注的知识产权，作为软件产品的创建者，其主要获利来源就是基于软件著作权出售软件产品的拷贝，即使用许可证。因此，著作权是软件产品厂商主要的、直接的获利来源，著作权保护的也是软件产品的直接使用价值，排除的市场竞争者多是采用盗版、剽窃等侵权行为的不法经营者。发明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的是软件产品的内在核心算法和外在用户界面，排除的是市场上出现与被保护软件产品功能、界面雷同的软件产品，针对的竞争对手一般是市场上具备实力的合法经营企业。

目前来看，软件产品企业应首先关注的知识产权问题仍是软件著作权的注册和保护，

这既是软件产品企业获得市场收益的主要和直接权利依据，也是对抗盗版、剽窃等现状市场主要威胁的基本手段；其次，应对发明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予以相当重视，对其进行恰当布局和使用，能为软件企业带来更为充分的保障和竞争力，特别在侵权维权方面具有相对较强的保护。

（三）软件技术服务业发展所需的知识产权环境

在软件技术服务贸易中，发包方一般是发达国家的软件企业，承包方是具备人力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软件企业。软件技术服务贸易中，承接外包的企业会接触到发包方大量的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承包方必须尊重并按约定在受控环境中使用这些知识产权，因为机密泄露，会对发包方造成严重的商业损失。研发型软件企业对无形资产的保护十分重视，采用商务流程外包（BPO）的软件企业对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保护要求更高，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软件企业，会对承包方软件技术服务企业及其所在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十分关注。

美国商会 2017 年 2 月发布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在专利、著作权、商标、商业秘密、市场准入和批准国际条约六个方面对全球 45 个经济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进行了打分，我国在其中排名 27，虽然得分逐年提高（2014 年得分 11.62 分，2015 年得分 12.4 分，2016 年 12.64 分，2017 年得分 14.83 分），但和美国（2017 年得分 32.62 分，排名第一）、日本（2017 年得分 31.29，排名第四）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

下表列出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对数字计算处理/通讯技术领域专利保护主题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我国软件专利保护的范围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

表 6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专利保护主题对比分析

国家或地区	计算机可读介质	计算机程序产品	数据结构	信号/数据源
美国	保护	保护	保护	不保护
欧洲	保护	保护	不保护	保护
日本	保护	保护	不保护	不保护
韩国	保护	保护	不保护	不保护
中国	不保护	不保护	不保护	不保护

注：欧洲资料来源为欧洲专利局（EPO），主要负责发明专利的审批。涵盖 28 个欧盟地区和 10 个欧盟外国家。

而在 GUI 专利保护方面，虽然各国都已经支持对 GUI 进行保护，但具体的保护范围

以及视图提交的形式也各有差别。例如，美国、欧盟^①、韩国的保护范围包括网页和游戏界面的 GUI，而我国和日本则不对网页及游戏界面进行保护。同时，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是 GUI 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基础。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先后确立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但我国目前还没有此项制度。

（四）嵌入式软件产业链上的知识产权合规与保护

嵌入式软件包括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嵌入式开发工具软件，都与专用硬件共生存在。嵌入式软件作为电子设备的灵魂，日益构成了电子设备主要功能发挥的支点，特别是在近年人工智能、物联网概念和技术发展的冲刷下，嵌入式软件和其实体智能硬件，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和发展契机。嵌入式软件行业存在两个知识产权场景，首先是实体产品研发开发阶段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开发工具和中间件的知识产权合规问题，然后是嵌入式应用开发完成后集成到实体产品中的整体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我国作为电子设备的制造大国，嵌入式基础软件发展还存在不足，目前很多电子设备制造企业使用的嵌入式基础软件都来自于国外企业。国外企业对于嵌入式基础软件的销售或授权形式也比较复杂，有根据产品型号或开发人员数量一次性打包许可的（包含了软件的著作权、专利权等）；也有根据产品销售情况按量收取版税的；还有以年度为单位收取订阅费用的；以及结合上述形式的混合模式的。而少数强势企业和行业，如通信行业的华为、中兴等，大部分嵌入式基础软件都是自产自用，很难向行业内部或其他行业有溢出效应。因此，我国企业在嵌入式基础软件的知识产权合规问题上，行业内缺乏协调、缺少标准，行业间发展不均衡。

在嵌入式应用软件完成开发和实体产品集成后，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是如何保护以嵌入式软件体现出的产品特性和功能，这在目前要依靠工业产权中的发明专利权。发明专利权中的方法专利能有效保护嵌入式软件的数据处理算法和逻辑，从而有效保护整体产品的功能。这在物联网、人工智能逐步渗透到电子终端设备的背景下，尤其具有促进行业创新的作用。

（五）SaaS 云服务对专利权保护的需求

对于 SaaS 模式下云服务软件的知识产权，应关注部署在云端的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用户使用 SaaS 软件时，是在服务器端产生了一个服务于用户的运行实例，并没有在用户端生成代码或可执行实体的拷贝，也没有向用户售出传统软件著作权意义上的拷贝或复

^① 欧盟知识产权局（ZUIPO）主要负责商标和外观设计的注册及管理，成员国主要是欧盟国家。

制品，软件的主体和实例都在服务器端，运行实例也只在服务用户时生成和运行。

SaaS 模式下云服务软件在服务器端的集中式部署，降低了软件被逆向工程所造成的软件代码逻辑泄露风险，同时凸显了软件用户界面面临的侵权风险。GUI 界面是软件面临用户的窗口，也是软件产品逻辑和用户体验等易用性指标的载体，对于软件 GUI 界面的保护，适用于采用外观设计专利权。目前，外观设计专利权 3 个月的审查周期和各种快速维权、确权机制的建立，也有利于软件企业快速获取保护，从而有利于产品在市面上的及时推广。

云服务软件界面背后的核心算法和数据处理方法，也是 SaaS 模式下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在开源生态发展如火如荼之际，大部分的软件创新都脱离不开集成创新的窠臼，竞争者大部分情形下容易从 SaaS 软件的表象去推测和掌握其数据处理方法甚至核心算法。这就需要将云服务软件的数据处理方法 and 核心算法申请发明专利权，以保护云服务软件的完整创新成果。

SaaS 云服务是一种创新的软件部署、使用方式，但软件的知识产权价值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因此，将 SaaS 云服务软件的数据处理方法和创新的核心算法用发明专利予以保护，将 SaaS 软件的用户界面用外观设计专利予以保护，同时辅以部分软件代码和平面显示元素的著作权保护，将会是 SaaS 软件企业和互联网企业保护创新成果的最优选择。

三、软件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发展趋势

（一）软件业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将更为严格

2014 年 8 月 31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2015 年，《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研究，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目前，《专利法》第四次修改正在进行中，新版专利法将以大幅提高侵权赔偿额，倒置侵权举证责任等显著改变，大幅提升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截至 2017 年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全国批准设立了 31 家集专利申请、维权援助、调解执法、司法审判于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不断严格知识产权保护。

2017 年，以软件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仍在不断深刻地改变着整个社会，在当前我国经济由资源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背景下，软件行业的自主创新需求日益迫切，软件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也将更趋严格。

随着国家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软件行业将面临一个不断趋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司法环境和政策环境。这对于行业内的大多数企业都将是一个积极因素，特别对于软件技术服务业而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将使其面对国外竞争者更为有利。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也将有利于软件企业自身的创新和发展，以自主知识产权的不断创造为标志，加强我国软件企业的创新节奏，从而构筑更坚实的市场竞争力，并不断打破国外企业构筑的知识产权壁垒，拓展我国软件企业的市场边界和创新边界。

（二）软件知识产权场景重心转向专利权

软件业从诞生起就是技术、创新演变快速的行业，其速度要大大快于传统行业。从通用软件产品到软件技术服务，从构筑互联网到支撑云计算、大数据，再到 2017 年涌动的人工智能、物联网浪潮，软件行业每一次的发展演变都迅速而深刻，这种演变不但让软件业更深入地融入了整个经济体，同时也影响了软件知识产权场景重心的变化。

从目前知识产权类型的保护力度而言，专利权因为保护软件构思等核心因素，保护的力度比传统的软件著作权要更为显著。再者，从发达国家的实践和发展来看，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方向也在不断地转向保护力度更强的专利权。

通用软件产品时代，行业发展范式是基于软件著作权的许可证和实体拷贝销售，此时最重要的知识产权问题是基于软件著作权的反盗版；软件技术服务发展之时，来自目标市场的外在性诉求要求我们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尊重包括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和专利权在内的广泛知识产权。近年来，软件逐步互联网化和 SaaS 化，获利方式也转向提供服务和产品体验，此时用专利权保护软件的“思想”创新势成必然。展望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当物联网、人工智能时代到来时，软件的存在可能更加千姿百态，服务和盈利模式也更加灵活，软件业对专利权的需求也将日益迫切。

（三）软件知识产权维权问题将日益增多

随着软件数量的增多，软件知识产权诉讼和维权也逐渐增多，从近几年公布的年度知识产权案例来看，软件知识产权的案例总是位列其中。以软件的 GUI 保护来看，2012 年以苹果公司与三星公司的 GUI 大战拉开了世界范围内对于 GUI 的探讨。在国内，2014 年 5 月开始对 GUI 外观设计专利进行保护，2016 年 4 月 360 公司向法院提起 GUI 外观设计专利侵权诉讼，拉开了软件 GUI 保护的帷幕，随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先后受理了多起涉 GUI 外观设计侵权案。不难预见，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未来 GUI 设计将是企业市场竞争的利器，相关专利申请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相应的维权案件也将屡见

不鲜。相对应的，关于软件的著作权、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纠纷也将逐渐增多，涉案的金额和内容等方面也愈加复杂。

2015 年 5 月，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该委员会依托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主要受理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知识产权维权咨询及纠纷调解。这是对软件知识产权维权的一种有益尝试。

（四）软件知识产权贸易渐趋成形

知识产权贸易在各个领域已逐渐成为一种贸易的主要形式。狭义的知识产权贸易是指单纯将知识产权本身（转让和许可）作为一种交易商品的形式；广义的知识产权贸易包括知识产权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软件、多媒体产品）的交易。软件贸易中，交易的既有基于软件著作权的许可证或实物拷贝，又有信息技术外包（ITO）、BPO 和 IC 设计服务贸易中的服务产品和含有嵌入式软件的实体知识产权产品，还有 SaaS 模式下兼具软件许可证和知识产权产品特征的云服务。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我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贸易额归属在服务贸易中，从 2014 年以来一直保持增长。特别在 2017 年，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金额发生了爆发性增长，这应该和我国 2016 年以来的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深度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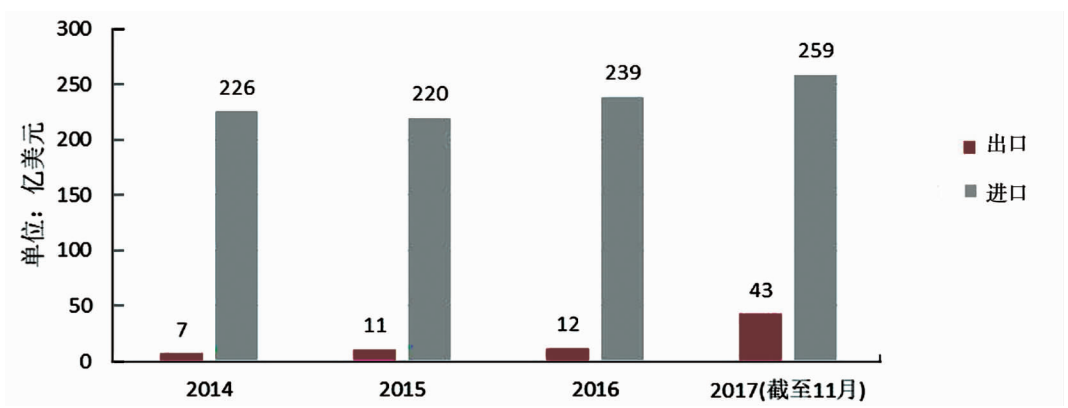


图 4 2014—2017 年知识产权使用费贸易额

软件业作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软件贸易的客体附加了大量软件从业者的创新成果和软件企业的知识产权，在交易价格中体现的知识产权比重也越来越高。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相关会计核算体系的逐步健全，知识产权在软件贸易中所占的权重会越来越大，软件企业应该积极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做好企业知识产权的布局、保护和运用，以提高知识产权贸易在贸易标的中的比重，提升行业贸易竞争力。

四、促进软件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一）探索完善软件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

软件产业属于数字产业，技术发展速度和创新节奏快，行业和产业都不断涌现出新的创新形态和业态，迫切需要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层面对这些创新的成果给以保护和确认，才能通过保证创新产出来不断激励行业进一步的创新投入。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应针对软件产业的特点和现状，不断调整制度环境的包容性和运作规则。在保护范围方面，将软件行业的创新纳入制度保护客体，扩展对新业态、新创新形态保护的覆盖度。在制度运行方面，应不断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和司法力度，提升执法效率和司法判赔额度，树立整个社会尊重知识产权、激励创新的文化氛围。

具体而言，软件著作权的保护应该简化注册程序，提高注册程序效率和便利度，以让尽可能多的软件产品都能通过注册获得软件著作权登记，强化软件的著作权保护。专利权对软件的保护范围和力度应与国际接轨，逐步放宽对软件相关创新成果的课题保护，放宽发明专利权利要求撰写方式对涉及软件技术方案的约束，考虑将互联网、大数据领域的微创新成果和数据库创新纳入专利权保护课题，以及解决目前司法保护和行政审查在软件专利权保护范围上的不一致问题。强化外观设计专利对软件 GUI 保护的覆盖范围，进一步完善 GUI 的保护内容和方式。进一步明确商业秘密纳入知识产权范畴后，行政和司法保护的操作规则，以确立业界对于商业秘密保护的信心。

（二）深化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整合软件知识产权保护

目前，我国与软件业知识产权相关的管理分布在专利、商标、版权等多个部门和机构，影响了知识产权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设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能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中央多次强调，要“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加强知识产权综合行政执法。目前，上海浦东、上海自贸区、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等地已率先开展知识产权“三合一”综合管理改革的实践，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其他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探索了方向、积累了经验。^①

^①靳晶：《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需要“全链条”打通：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中国小康网，2017 年 3 月 7 日。

2016 年底，国务院印发了《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总体方案》，预计在“十三五”时期，多头分散的知识产权管理局面将会不断完善，这对适用较多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软件业将是很好的机遇。

（三）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海外布局，积极应对知识产权壁垒

总体来看，我国软件出口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的拐点，但增长质量不断改善，对服务贸易发展的贡献不断提高，出口结构升级效应明显，出口多元化格局日益丰富，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加速拓展，软件出口基地和软件园区的产业集聚能力不断增强，软件企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持续提升。^① 我国软件业融入全球市场是必然趋势，但软件企业在知识产权海外布局方面的步伐却仍显落后，这对于软件企业面对全球日渐兴起的以知识产权为主要手段的非关税壁垒极为不利。

因此，国内企业一方面应提高意识，积极谋求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权的海外布局；另一方面需要主动了解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差异，通过目标市场本土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协助，更好地完成知识产权海外布局。

（四）建立软件行业知识产权协调机构，推动行业专利标准化

我国的软件行业在基础软件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打造出了具备世界竞争力的应用方案解决水平。这些应用层面的实力和经验，在服务我国行业需求的同时，也逐步地完成了抽象和产品化，具备了应用到世界其他市场的实力和前景。但是在软件国际贸易中，专利和以核心专利为主的技术标准，构成了高精尖产品出口贸易的主要非关税壁垒。如何打破这些壁垒，为我国软件企业应用层面的能力找到走出去的突破口，我们要积极构建知识产权行业联盟，形成合力，推进优势领域核心专利构建行业技术标准，将行业在应用层面的创新成果专利化，进而以行业的力量将这些专利标准化，最后推进进入国际标准，最终在软件贸易中取得竞争力和优势地位。

责任编辑：李 蕊

^①王晓红、于倩：《中国软件出口现状及趋势》，《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 年第 9 期。

数字经济与软件业发展研究^{*}

沈家文

摘要：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我国已进入数字经济引领经济发展的新时代。技术革命加速全球软件业增长，我国软件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加速转型升级，企业数字化转型给我国软件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国数字创意产业面临巨大成长空间，数字贸易有望成为我国软件业发展的新增长点，数字产品出口正成为推动我国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力量，数字化成为我国软件出口发展新趋势。发达国家加快数字经济战略布局，加强对全球数字贸易政策的影响和引领。我国数字贸易和数据全球化有巨大发展空间，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对提升我国软件出口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国亟待积极构建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加强数字内容产业发展规划，加速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动软件业与科学和工程技术业融合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 软件产业 数字贸易 服务外包

作者简介：沈家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全球化》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为建立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支撑。数字经济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以信息为载体、以互联网为通道，

^{*} 本文为商务部课题《中国软件出口发展报告 2017》的部分研究成果。

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渗透并影响整个经济领域乃至人类社会。数字经济有别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也有别于服务经济，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经济。人类社会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我国软件业发展面临重大机遇。

一、数字经济加速全球经济与软件业增长

数字经济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经济，由于受到梅特卡夫法则、摩尔定律和达维多定律的影响，可实现定期升级创新，拥有着巨大的市场和活力，正在成为全球发展最快、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的经济活动。

（一）数字经济的概念与内涵

关于数字经济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数字经济有别于信息化、两化融合、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等概念，目前仍然存在不同的定义。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 1995 年出版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书中首次提出数字经济概念，预见了互联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美国商务部 1998 年发布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首次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信息技术产业和电子商务，其后陆续发布《新兴的数字经济（1999）》《数字经济 2000》《数字经济 2002》《数字经济 2003》等系列报告，对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英国研究委员会（2013）认为，数字经济是通过人、过程和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在数字经济中，数字网络和通信基础设施提供一种全球化的平台，促进个人和组织的相互交往、通信、合作及信息分享。在众多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中，2016 年 9 月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发布的《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最具代表性，明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一定义阐明了数字经济的本质和核心特征，超出了此前狭义的信息产业和电子商务范畴。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及跨界融合，数字经济的内涵不断丰富，各国政府以及国内外学者对于数字经济分类的理解仍然有较大差异。美国统计局 1999 年 10 月发布的《电子商务的定义及其衡量标准》将数字经济分为四部分：数字基础建设、电子化企业、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英国的标准行业代码（2003）将数字经济分为两类：信息通信技术、数字内容；信息通信技术系统、硬件、软件和与此相关的服务。其中，数字内容分为核心内容产业、嵌入式内容产业和数字内容的分发者。澳大利亚《数

字产业指南》将内容制作、数字咨询或专业服务、数字/广告公司、多媒体/流媒体服务、搜索技术、社交媒体等 24 个产业部门列入数字经济范畴。美国商务部数字经济顾问委员会（2016）认为用传统方法来测量数字经济是困难的，提出四部分框架：数字化的范围、数字化的影响、数字化对经济指标的累积性影响、数字化新兴领域的监控。阿里研究院（2017）将数字经济分为 1.0 和 2.0 两个阶段：数字经济 1.0 的核心是信息化，信息技术在传统的行业和领域得到推广应用；数字经济 2.0 的核心是数字化，即万物在线互联，数据成为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和发展的核心力量。腾讯研究院（2017）根据数字化程度的不同，将数字经济分为信息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和数字化转型三阶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7）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2017》中提出，数字经济是信息经济、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部分。目前看，数字经济的未来演进方向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尚未形成广泛认同的数字经济定义和分类，国内外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在大量展开，还未形成系统性理论架构，对于数字经济本身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还较欠缺。

（二）发达国家加快数字经济战略布局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并产生巨大活力，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2016 埃森哲技术趋势与展望》提出，数字经济实现了乘数效应的增长，2005 年数字经济占全球生产总值（GDP）的 15%，2015 年为 22%，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25%。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基于数据的商品和服务的全球化趋势在最近 10 年全球化发展历程中得到显著体现，不仅支撑起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其他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同时也在发挥着越来越独立的作用。

基于数字经济重要性的认识，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G20 等国际组织也对数字经济发展表现出极大关注，发布了多项研究报告，将数字经济视为全球经济复苏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美国、欧盟、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优先事项，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数字议程等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美国商务部早在 1999 年开始连续多年发布数字经济的系列报告，促进美国数字经济发展。英国政府 2009 年 6 月公布了《数字英国》白皮书，目标是将英国打造成世界的“数字之都”。日本政府 2009 年 7 月制定《2015 年 i-Japan 战略》，主要包括促进电子政务、医疗保健和教育、人力资源领域建设 3 个领域的优先发展，促进产业和当地社会的复兴并培育新产业，大力开展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澳大利亚政府于 2011 年 5 月启

动了《国家数字经济战略》，涉及宽带建设、在线教育、政府互联网教育等 8 项目标。2013 年 8 月中国工信部赛迪研究院《装备工业研究》（2013 年第 4 期）首次阐述了制造业数字化的概念与内涵，分析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的发展现状、趋势以及制约因素，提出了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战略的政策建议。2015 年 2 月英国政府出台《英国 2015—2018 年数字经济战略》，倡导通过数字化创新来驱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把英国建设成为未来的数字化强国部署战略方向。德国联邦政府 2015 年正式提出数字化战略；2016 年 3 月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发布《德国数字化战略 2025》报告，涵盖基础设施、创新创业、经济发展、数据治理、监管、人才和组织等 10 个方面。2016 年下半年，美国政府连续发布了 3 份人工智能战略计划和研究报告：《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

展战略计划》和《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英国政府 2017 年 3 月发布《英国数字化战略》，设定了明确途径以帮助英国启动并推进数字化业务。综合而言，各国的数字经济战略仍聚焦在狭义数字经济的层面，即信息通信技术和电子商务等领域。

（三）数字技术革命加速全球软件业增长

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是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改变，现代信息网络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数字技术革命成为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第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全球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带来巨大机遇。全球数字经济高速增长、快速创新，并广泛渗透到其他经济领域，深刻改变世界经济的发展动力、发展方式。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用户的增长，全球电子商务高速发展，根据互联网统计公司 Statista 的报告，全球零售类电子商务 2013 年的销售额为 8398 亿美元，2015 年增长至 1.55 万亿美元，年均增幅高达 35.9%，预计到 2020 年将增至 4.06 万亿美元。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将是以软件技术及信息通信技术（ICT）为基础，通过物联网将所有数字化产品和服务连接起来，运用云技术实现对整个社会、全领域的数字化管理，形成数字家庭、数字城市、数字国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给软件服务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软件服务业推动数字技术向纵深发展，深刻改变全球经济发展格局。

第二，人类社会已经从个人计算机（PC）时代迈入云时代，数字技术革命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加速全球软件业持续增长的新动力。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加快应用，创新活力、集聚效应和应用潜能快速释放，众创、众包、众筹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将带动全球软件业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根据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研究报告显示，全球公

有云市场规模从 2010 年的 683 亿美元增长至 2016 年的 2092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高达 20.51%；预计 2017—2020 年行业规模增速维持在 15% 以上，到 2020 年有望达到 3834 亿美元。

第三，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软件市场需求持续扩大的重要动力。全球软件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软件支出和软件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互联网技术（IT）设备和 IT 服务。根据 Gartner 的研究数据，2017 全球 IT 与软件支出增长 2.9%，其中软件支出 3570 亿美元，增速 7.2%。大数据、云计算、移动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传统的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交汇融合，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正加速与制造、生物、能源、金融等融合，传统产业正在网络化连接、数字化转型、融合化发展。全球服务分工网络体系的迅猛发展使得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渗透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整合协调着全球化生产的各个方面。

二、数字经济对于我国软件业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对于扩展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提升社会管理和服务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数字经济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我国数字经济正在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由要素投入的“规模效应”转变为知识“溢出效应”，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显著增强，成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第一，我国已进入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出台了《互联网+”行动》《国家信息化发展纲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系列重大战略和政策措施，数字经济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2016 年 9 月，在杭州召开的 G20 峰会上，我国首次提出“数字经济”议题，为全球经济发展指明方向。2017 年 3 月，数字经济首次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2017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 G20 汉堡峰会讨论数字化议题时强调，要携手构建增长友好型、就业友好型数字经济，为世界经济开辟更广阔空间。中国信息化百人会课题组测算结果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达到 30.1%，美国、英国、日本这一比重分别为

59.2%、54.5%、45.9%。根据数字经济指数报告，“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新增城镇就业人数将上升1.73万人，由此估算数字经济在2016年带来了280.17万新增就业人数，占我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第二，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高速进展。建成全球领先的光纤宽带网络和4G网络，截至2017年底，全国光缆总长达到3747万公里，全国所有地市基本建成光网城市。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到3.49亿户，移动宽带用户总数达11.3亿户；部署服务器116万台。

第三，我国数字服务产业核心竞争力明显提升。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分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快速发展，2016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26.1万亿元，交易额约占全球电子商务零售市场的39.2%。信息消费规模由2013年的2.2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4.5万亿元，占最终消费支出比重为10%。2017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5.48万亿元，同比增长2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15%。

第四，我国数字产品产业进入快速成长期。根据《2016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报告》的研究数据，2015年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已拥有36948家企业、近384万从业人员；产值突破5939亿元，同比增长22.9%，其中虚拟现实（VR）增幅最大，达267.5%。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期。七大细分领域中，网络文学是IP（知识产权）源头，增速快；动漫的衍生市场潜力大；影视受众广泛，爆发强劲；游戏规模达1424亿元，电竞、VR是新增长点；VR规模达15.4亿元，处于起步阶段，潜力旺盛；在线教育结合语音识别、人工智能（AI）等技术将有更多应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1—11月，我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3.3%，数字内容服务行业同比增长34.0%，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行业同比增长37.5%，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行业同比增长43.6%；网络游戏业务收入1341亿元，同比增长22.1%。

第五，我国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智能机器人、移动智能终端等快速发展，制造业骨干企业“双创”普及率达60%，工业互联网供给能力持续提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16年底，完成贯标的企业累计超过4300家，开展自评估自诊断自对标的企业超过70000家，制造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62.4%和45.4%。

（二）我国软件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加速转型升级

第一，软件服务业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向网络化、移动化、平台化转型发展。一是

软件产品开发行业发展水平呈现加速提升发展态势，在新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向网络化、移动化、平台化方向发展。根据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7 年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5.5 万亿元，呈现稳健增长的发展态势（见图 1）。2017 年我国软件业实现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8%；其中，云计算相关的运营服务（包括在线软件运营服务、平台运营服务、基础设施运营服务等在内的信息技术服务）收入超过 80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5%。二是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发展水平高位波动，在服务支撑和发展环境方面提升较快，信息安全服务需求迅速增长。2017 年我国软件业信息安全和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均超过 1000 亿元，分别增长 14% 和 19.9%。三是嵌入式系统软件行业发展水平提升相对平缓，嵌入式系统软件已成为产品和装备数字化改造、智能化增值的关键技术，企业跨界融合发展、产品智能化带动嵌入式研发投入强度稳步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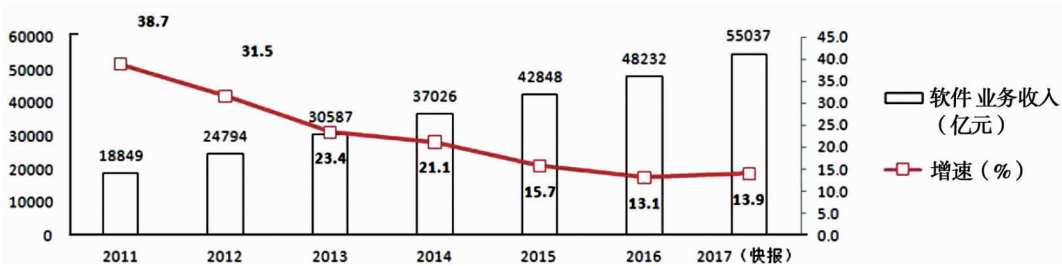


图 1 2011—2017 年我国软件产业发展态势

第二，我国软件业发展呈现出高质化、服务化、融合化的转型升级特点。一是服务化趋势明显，产业结构高端转型，软件业务收入中信息技术服务比重过半，数据服务、运营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从 2014 年的 36.6% 提高到 2016 年的 40.8%。二是融合渗透加速，服务支撑作用凸显，面向行业应用、智能制造、信息安全等各领域的应用软件、工业软件、信息安全服务、平台运营服务业务快速增长，2016 年我国电子商务平台运营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30.8%。三是研发投入保持较高水平，知识产权储备持续增强，2016 年我国软件业研发投入 4545 亿元，占软件业务收入比重达 7.2%，软件著作权数量超过 2 万件。产业创新活跃，新业态发展迅速，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驱动下，产业进入新一轮创新活跃期。

第三，我国软件业在全球软件产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全球 IT 软件和信息服务贸易多年来一直呈现持续上升态势，2016 年全球 IT 信息服务贸易增长 4.52%。其中，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为 2.47%，发达经济体增速达 5.31%。近年来，我国软件服务业在全球软件产业调整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06—2016 年我国服务外包执行金额从 13.8 亿美元增至 1064.6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 54%；离岸服务外包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从不到 1% 攀升到

33%，稳居全球第二位；离岸市场从以日本为主拓展至北美、欧洲、东南亚等 200 个国家和地区。

（三）企业数字化转型给我国软件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未来数据资源将成为企业经营决策的新驱动，企业都将转型为数字化企业，数字化的价值创造潜能大幅提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领域面临着新机遇。

第一，数字化已成为企业创新驱动的首选战略。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制造业竞争已经发展至创新能力的竞争。企业竞争聚焦在产品研发速度和创新能力上，为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数字化战略已成为企业创新的首选战略。据波士顿咨询公司预测，到 2035 年我国整体数字经济规模接近 16 万亿美元，数字经济渗透率 48%，总就业容量达 4.15 亿人。随着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管理科学等学科不断交叉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融合发展面临技术突破，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重要战略机遇。

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给软件服务业带来巨大机遇。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是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更主要是满足企业可持续成长和创新发展的需求。“互联网+”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石，促进企业数字化业务的发展，同时给软件服务业带来更大的商机。2016 年我国互联网用户达到 7.31 亿，数量巨大的年轻网民为数字商业模式迅速投入商用创造了条件，促进数字化创新企业快速实现规模经济，数字化生态圈不断拓展延伸。

第三，企业数字化推动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快速研发与应用，促进云服务、互联网反欺诈、大数据征信、供应链金融服务、工业物联网应用、智能化设计、知识产权服务、汽车服务、空间地理信息服务、创意设计等发展，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力。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网络经济、分享经济等新形态、新模式在交通出行、商旅住宿、快递物流等领域渗透，并向知识内容、文化创意等领域不断拓展。

（四）我国数字创意产业面临巨大成长空间

第一，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数字创意产业是以创意为核心、数字技术引领的新兴产业，主要包含网络文学、动漫、影视、游戏、创意设计、VR、在线教育。根据《2016 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报告》的数据，2015 年我国数字创意产业规模达到 5939 亿元，同比增长 22.9%，其中 VR 增幅 267.5%；我国数字创意企业数量近

37000 家，从业人员 384 万，产业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随着云计算、VR、AI 等新技术的演进，互联网企业竞相布局，影游漫文联动和产业融合将成为趋势，移动电竞、互联网影视成为新的探索点。

第二，我国数字创意产业规模仍有巨大增长空间。根据智研咨询的研究数据，英国数字创意产业占 GDP 的比重达到 8%，居全球首位，全球音乐的 15% 来自英国；美国数字创意产业年营收约 4000 亿美元，占 GDP 比重为 4%；日本的媒体技术、电子游戏、动漫卡通等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汽车产业的第二大产业，数字创意产业占 GDP 比重为 2.4%，日本动漫制作占全球 60% 份额。我国数字创意产业规模 5939 亿元，占 GDP 比重为 0.7%，还有十余倍的巨大增长空间。

第三，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游戏市场，市场重心从 PC 端向移动端转移。国家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发展，2009 年以来出台多项鼓励政策，促进我国游戏市场发展。2015 年我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 1435 亿元，同比增长 30%；PC 游戏占 61%。2016 年我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移动游戏占比上升至 57%。根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伽马数据、国际数据公司发布的《2017 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我国游戏市场 2017 年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2036.1 亿元，同比增长 23.0%，保持高速增长的发展态势（见图 2）；游戏用户规模达到 5.83 亿人，同比增长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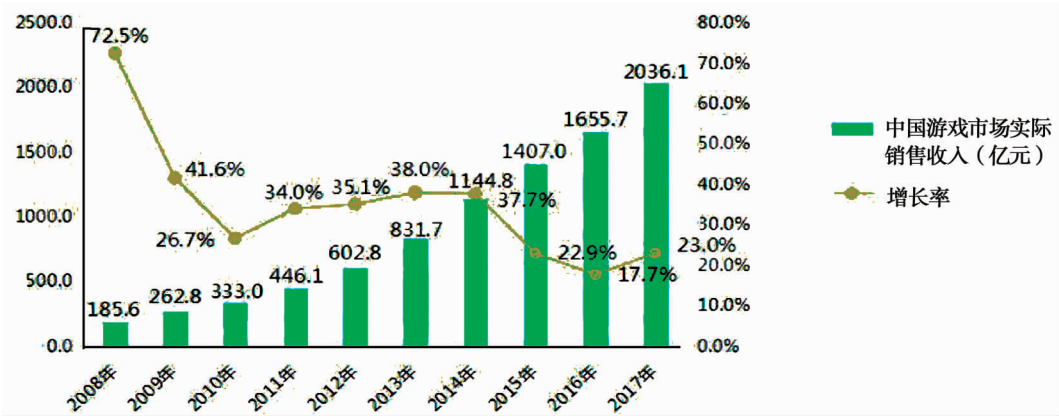


图 2 2008—2017 年我国游戏市场发展态势

（五）数字经济对软件业发展模式的影响

第一，跨境电商借势数字技术转型升级。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通过拥抱互联网融入到数字贸易，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从跨境电商到数字贸易。2012 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额，包括企业对企业（B2B）和企业对消费者（B2C），不到外贸总额的 1/10，但 2016 年跨境电商已经占到我国外贸的 1/4。艾瑞咨询、中投顾问等机构预测，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 2018 年将达到 8.8 万亿元，2020 年有望达到 12 万亿。未来几年，我国跨境

电商交易规模将保持高速增长，传统软件出口模式面临新转变，线上线下融合趋势化。

第二，数字贸易有望成为我国软件业发展的新增长点。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世界主要跨国企业纷纷开启了数字经济战略。埃森哲 2016 年的报告显示，超过 50% 的跨境服务通过数字化平台完成，超过 12% 的跨境实物贸易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数字化给商业模式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和重构，数字贸易成为数字经济的驱动力。

第三，网络经济成为驱动软件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网络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根据艾瑞咨询的《2017 年中国网络经济年度监测报告》，2016 年我国网络经济营收规模达到 14707 亿元，同比增长 28.5%，预计 2018—2019 年仍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见图 3）。随着我国推进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政策陆续出台，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网络经济的快速增长将加快软件业的转型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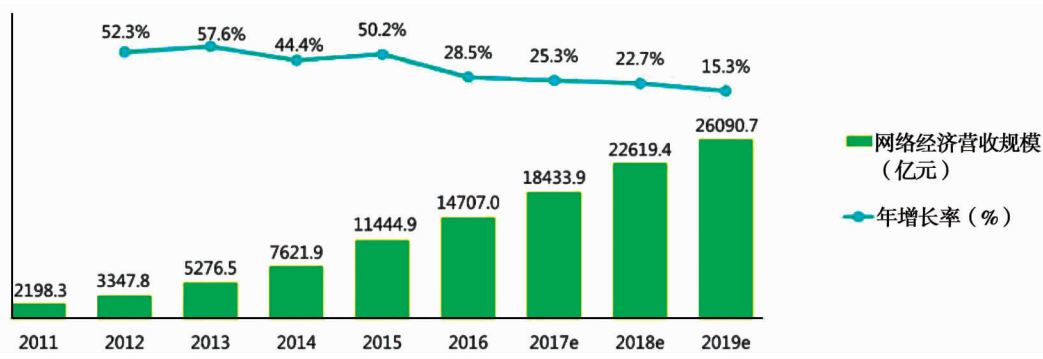


图 3 2011—2019 年我国网络经济营收规模

（六）软件业发展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计算、网络、数据、软件”无处不在，软件是支撑计算、网络和数据的基础，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第一，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我国服务进出口年均增长 15.7%，2016 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突破 5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2%，我国市场吸纳了近 1/10 的全球服务出口。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软件服务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成为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动力。

第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成为塑造全球数字经济格局的中坚力量，从产业投资、商业模式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引领全球数字经济新趋势。我国拥有全球最活跃的数字化投资与创业生态系统，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占全球电商交易总额 40% 以上，我国与个人消费相关的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额是美国的 11 倍。2016 年我国金融科技领域风险

投资位列全球第一位；虚拟现实、自动驾驶、可穿戴设备、教育技术、机器与无人机和 3D 打印领域的风险投资位列全球第二；大数据领域、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领域的风险投资位列全球第三。区块链技术应用用于资产托管、产业链金融、消费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推动更多企业与服务提供商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区块链服务合作，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能级再上新台阶。

（七）数字化成为我国软件出口发展新趋势

第一，基于云的数字服务模式被软件出口企业广泛认可。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催生的经济形态，数字化是人类从传统生产社会向数字生产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软件企业开始摒弃传统的模式，不断地进行创新，运用新的信息技术、智能化设备来帮助客户实现数字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与传统软件出口企业融合，基于云的服务模式被广泛认可，云端交付也大量被传统软件出口企业所采用，软件即服务（SaaS）和按需付费（On-demand Payment）成为主流的交付与定价模式。根据商务部的有关数据，信息技术外包是我国软件出口的主要方式，2016 年信息技术外包出口执行金额为 330.48 亿美元，占软件出口比重 96.55%；软件产品出口执行金额为 11.82 亿美元，占比 3.45%。我国率先应用的多种数字商业模式如今已在全世界流行，从共享单车到视频社交网络等等。新型经济全球化正在加速发展，催生 E 国际贸易，越来越多的我国数字企业通过并购、商业模式拓展、提供技术供应等方式扩展全球业务，我国软件企业开始步入全球数字化发展的最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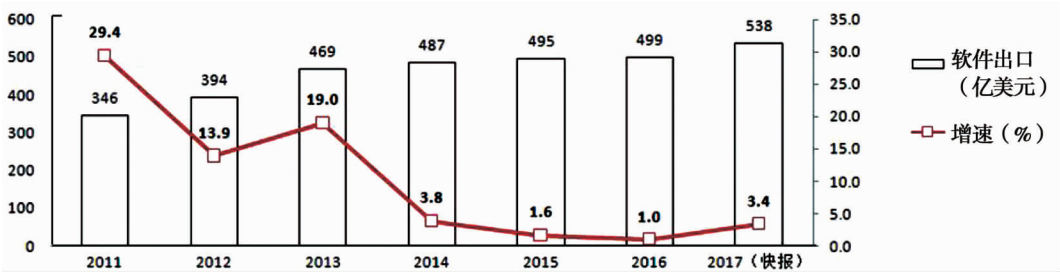


图 4 2011—2017 年我国软件出口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第二，数字产品出口正成为推动我国培育软件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力量。全球软件出口市场目前由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主导。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软件发包国家，2015 年发包规模占全球市场的 55.3%；欧洲和日本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25.5% 和 10.2%。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占我国软件出口市场规模的 50% 以上，2016 年三大经济体共计出口执行金额为 170.38 亿美元，占比为 50%。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服务经济引

领期和创新国际竞争优势关键期，数字产品出口正成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吸纳中高端人才就业、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与提升全球价值链的中坚力量。

第三，数字经济成为国际合作的新热点。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06—2016 年，我国服务外包执行金额从 13.8 亿美元增至 1064.26 亿美元；从业企业从 500 多家迅速扩展至近 40000 家；从业人员由不足 6 万人增长至 856 万人。随着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不断加强，数字贸易将成为提升我国软件业全球价值链层级的战略选择，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国软件服务业出口规模将不断扩大。根据工信部的快报数据，2017 年我国软件业实现出口 5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见图 4）；其中，外包服务出口增长 5.1%，嵌入式系统软件出口增长 2.3%。

三、我国软件业面临数字经济引发的新问题

（一）数字技术创新和温特尔模式变革带来新挑战

数字经济在全球形成巨大的市场网络效应，催生新消费模式，软件业发展面临数字经济时代的温特尔模式变革。按照因特网经济学理论，网络固定成本不变而边际成本趋近零，随着网络用户数量提高而增加网络的价值。近年来我国分享经济高速增长，2017 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 4.9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2%；分享经济平台的就业人数约 716 万人，同比增加 131 万人。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数字化和消费网络化相结合，形成温特尔模式，生产者和消费者借助数字化、网络化实现平台化分工，突破传统的规模经济模式，传统的软件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面临变革。一是数字经济推动生产方式的新变革。数字化生产方式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权重，影响各国的比较优势，将重塑软件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二是数字化引发对商业竞争的新关注。传统软件系统架构已经难以支撑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鼓励软件业新模式、新业态迅速增长的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充分竞争与有序发展，成为软件业市场主体和政策制定者、监管者面前的共同挑战。

（二）软件业面临成本上升、高端人才缺乏等新问题

一是软件企业的管理成本和风险上升。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软件服务业规模扩大和业务增长，对软件企业的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研发能力等多方面经营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趋于复杂化。2017 年我国软件业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增长 14.9%，人均工资增长 11.2%，增速高于其他费用增长，企业管理成本明显上升。二是软件企业的核心人才缺乏、人才流失以及人工成本上升问题并存。

2017 年我国软件业就业人数接近 600 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约 20 万人，软件企业面临转型升级压力，高端人才的争夺趋向激烈，随着网络化智能化不断推进，互联网公司加入软件人才争夺行列，跨界竞争超出软件业内部竞争，软件产业可持续盈利能力面临新挑战。

（三）我国软件业数字化竞争力亟待提升

我国信息服务业近年来快速增长，但软件业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很弱小，软件业整体偏小偏弱，核心技术、产品成熟度、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全球软件重点企业主要分布在美国，占比达到 75%；其次为欧洲、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占比为 22%；发展中国家占比仅为 3%。2016 年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名单中，美国有 14 家芯片公司与 14 家软件公司，而我国无一家软件公司入选。我国货物贸易居世界前列，但数字贸易相比明显偏低，数字产品服务的标准规范发展滞后，数据流尤其是跨境数据流动的监测标准缺乏，基础软件、系统软件非常薄弱，国产软件基本属于应用型软件，在软件开发技术、开发工具和开发理念方面仍然是追随者，我国软件业的数字化竞争力亟待提升。

四、结论与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人类社会已经从 PC 时代迈入云时代，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软件市场需求持续扩大的重要动力，数字技术革命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加速全球软件业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全球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带来巨大机遇，软件服务业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向网络化、移动化、平台化转型发展。在数字经济驱动的新一轮全球化发展浪潮中，我国软件业和数字贸易有巨大发展空间，数字产品出口正成为推动我国培育软件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力量。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对提升我国软件出口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一）加强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规划

数字经济正从“硬件为王”“软件为王”进入“内容为王”的阶段。2016 年 12 月数字创意产业被纳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但目前仍缺乏相应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我国数字内容产业高速增长，但同发达国家相比，在产业链条、产业规划和法律环境等方面还存在差距，亟待统筹制定数字内容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加快以数字内容产品为核心，通过前后关联机制，发挥链条经济效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避免数字侵权抑制数字内容产业创新。加强国家层面的数字内

容产业规划布局，促进产业做优做强做大。

（二）推动软件业与金融、工程 and 科技服务业等传统产业的跨界融合

软件和硬件的融合、软件和服务的融合、软件 and 信息的融合、软件和科技的融合、软件企业的融合，融合才能做大做强，先进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创新已成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离不开建模、算法 and 软件，软件企业要与科研机构 and 工程技术跨界融合，协同开发计算、网络 and 数据问题的软件解决方案及高端软件产品。软件业要加快产业融合，根据软件产品的定位 and 发展方向，吸收工程 and 科学技术人员，改变软件业的人才结构，抢占数字经济制高点，通过数字化融合来驱动软件业发展。

（三）加速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数字经济时代，价值创造不再强调竞争，而是通过整合产品和服务供给者，并促成交易协作 and 适度竞争，共同创造价值，构建共建共赢的生态系统。平台是数字经济时代协调 and 配置资源的基本经济组织，是价值创造 and 价值汇聚的核心。要把握窗口期，抢占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制造业生态发展主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推动产业组织关系从线性竞争到生态共赢转变。

（四）促进软件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组织方式

软件产业尚未形成现代化产业组织方式，尚未进入能极大满足消费需求的流水线作业的工业化时代。要加快软件产业的专业化分工，促进软件企业改变依靠程序员编码实现价值的盈利模式，将技术架构、业务架构、应用架构专业化分工，发展“业务架构 + 应用架构 + 技术平台”的组织模式，技术构架通过平台公司技术开发、编码实现，业务 and 应用架构由业务 and 产品人员设计，提高开发效率 and 质量、降低开发到运营的成本，提升软件创造力和产业竞争力。

（五）把握区块链发展机遇实现换道超车

人类正在从信息互联网阶段进入价值互联网阶段，区块链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形态，可能重塑货币市场、支付系统、金融服务 and 经济形态，还将改变人类社会众多领域。全球最大的 10 家信息互联网公司分布在美国（6 家） and 中国（4 家），价值互联网时代的 market 格局或将面临变革。在数字经济的价值互联网时代，软件业需要把应用创新方面作为突破口，区块链技术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块链的共识算法 and 加密算法等核心技术仍存在很大的优化 and 创新空间，我国软件企业要把握区块链发展的历史机遇，开拓产业创新路径，进行换道超车，构建价值互联网时代的主导应用范式。

参考文献：

1. 何皋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及我国的战略抉择》，《现代经济探讨》2013 年第 3 期。
2. 沈家文：《破解李约瑟难题：制造业数字化战略》，《中国发展观察》2014 年第 3 期。
3. 周宏仁：《软件业发展的战略思考》，《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4 年第 4 期。
4. 李忠民、周维颖：《美国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及我国的对策思考》，《全球化》2014 年第 11 期。
5. 李忠民、周维颖、田仲他：《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影响及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11 期。
6. 肖风：《区块链让价值互联网露出曙光》，《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10 日。
7. 邢厚媛、涂舒：《2017 年服务外包七大发展趋势》，《国际商报》2017 年 2 月 7 日。
8. 沈家文：《产业融合创新提升软件出口竞争力》，《中国发展观察》2017 年第 2 期。
9. 李国杰：《从信息技术的发展态势看新经济》，《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 年第 3 期。
10. 王灏晨：《国外数字经济发展的特点》，《瞭望》2017 年第 6 期。
11. 经伟：《G20 推动数字经济迸发巨大潜力》，《经济日报》2017 年 7 月 7 日。
12. 欧阳日辉、孙宝文：《数字经济——中国经济提质增效新引擎》，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 年 9 月 6 日。
13. 王晓红：《中国软件出口：现状趋势与战略机遇》，《全球化》2017 年第 9 期。
14. 工信部信软司：《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中国经济网，2017 年 10 月 11 日。
15. 陈文玲、颜少君：《“E 国际贸易”的理论内涵与理论体系》，《全球化》2017 年第 12 期。

责任编辑：李蕊

全球软件贸易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谢兰兰

摘要：信息技术在金融、通信、交通、贸易、物流、能源等领域广泛运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稳定而持续的需求。占据垄断地位的发达国家和发展基础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持续对外大量输出优势软件产品，供需双向扩张的格局将使全球软件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同时非授权软件大规模泛滥、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软件跨境提供的限制等正在制约全球软件产业的良性发展。新兴市场的崛起、人工智能的发展、基于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安全软件服务需求扩张将成为全球软件贸易新的发展机遇。

关键词：软件贸易 大数据应用 非授权软件 软件外包

作者简介：谢兰兰，廊坊师范学院副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一、全球软件产业的发展状况与特点

（一）全球软件市场将延续平稳发展态势

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报告显示，2016 年全球信息科技和产业（IT）总支出 35360 亿美元，比 2015 年（35170 亿美元）增长 0.6%。其中软件市场发展明显优于硬件市场。在云计算拉动下，全球新一代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加速期，软件市场延续平稳发展态势。数据中心系统、软件、IT 服务支出在 2016 年稳定增长。其中，数据中心系统支出 750 亿美元，比 2015 年提高 3%。尤其是得益于一些超大型机构强劲而持续的需求，全球服务器市场实现了超预期增长；软件支出和软件服务支出分别为 3260 亿美元和 9400 亿美元，比 2015 年提高 5.3% 和 3.1%（表 1）。

相比较下，硬件方面需求下降。电子信息产品^①支出 6410 亿美元，比 2015 年下降 1.9%。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俄罗斯、日本和巴西经济持续低迷，短期无法恢复强劲增长；二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对低成本手机需求增加以及这些地区较低的平板电脑使用率；三是欧亚大陆、日本、中东和北非地区短期内对高端智能装备消费量无法有效提升。

表 1 2015—2016 年全球 IT 支出预测 单位：10 亿美元

项目/年份	2015 年	增长率 (%)	2016 年	增长率 (%)
数据中心系统	170	1.8	175	3.0
软件	310	-1.4	326	5.3
电子信息产品	653	-5.8	641	-1.9
IT 服务	912	-4.5	940	3.1
通讯服务	1472	-8.3	1454	-1.2
总额	3517	-5.8	3536	0.6

数据来源：Gartner。

大数据应用是软件市场的重要增长动力。根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 Wikibon 对全球大数据市场的分析和预测，2016 年，全球大数据硬件、软件和服务整体市场规模为 281 亿美元，增长 22%；预计到 2027 年，在大数据硬件、软件和服务上的整体开支将高达约 970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CAGR）为 12%。其中大数据服务硬件复合年增长率 9%，大数据软件复合年增长率 17%，大数据服务复合年增长率 10%；在大数据软件细分市场，应用数据库总规模 26 亿美元，MPP SQL 数据库总规模 25 亿美元，机器人学习应用、物联网应用和数据科学工具链规模相对较小，分别是 9 亿美元、2 亿美元和 2 亿美元，未来几年将保持高速增长，到 2020 年规模分别达到 63 亿美元、18 亿美元和 18 亿美元。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在工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成熟应用，机器人学习应用市场规模将赶超其他大数据细分市场，成为最大的大数据应用领域。

移动互联装备的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全球软件市场的热点，助推了全球移动安全软件市场的蓬勃发展。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报告显示，全球手机安全软件市场将从 2016 年的 20 亿美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33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 10.3%。增长最快的领域是手机身份与访问管理软件，2016—2021 年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14.1%。

^① 电脑、手机、平板电脑和打印机

（二）智慧城市和物联网的迅速发展带动相关领域软件投资的快速增长

智慧城市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它的实质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借助新一代的物联网、云计算、决策分析优化等信息技术，将城市中的物理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商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连接起来，构成一个不同部门和系统间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的生态系统，实现城市的智慧化管理和运行，从而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城市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美国市场调查咨询公司 MarketsandMarkets 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有 200 多个智慧城市项目。预计 2015—2020 年智慧城市项目带动的物联网市场规模将从 519.6 亿美元增长至 1475.1 亿美元，CAGR 高达 23.2%。

IDC 报告显示，2017 年全球吸引投资最多的是物联网领域（基于市场份额），尤其是智能家居技术的长尾投资，预计未来 5 年内将大幅增长。虽然从技术角度看，硬件吸引的投资额最多，但是软件和服务支出增长最快，尤其是应用软件将占有所有物联网软件投资的 50% 以上（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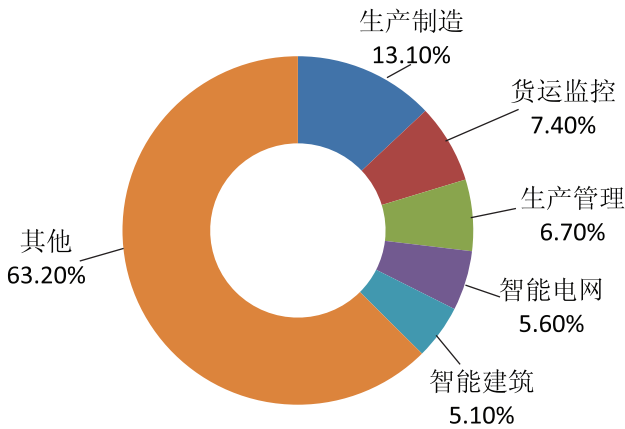


图 1 2017 年全球物联网市场支出份额

数据来源：IDC。

（三）中小企业对 IT 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潜力巨大

IDC《全球中小企业支出半年度指南》显示，2016—2021 年，全球最大的软件市场来自于中小企业。^① 预计全球 IT 产品和服务收入中有 38.5% 来自于中小企业。2017 年全球中小企业整体 IT 支出将达到 5680 亿美元，到 2021 年将增加 1000 多亿美元达到 6760 亿美元，5 年复合年增长率为 4.5%。

中小企业的 IT 需求主要用于硬件、软件和 IT 服务三个方面，这三大类占到全球中

^① 中小企业为员工规模在 100 人至 499 人之间的企业。

小企业技术支出的 85%以上。IDC 预测 2019 年全球中小企业 IT 需求中，软件和 IT 服务支出将超过硬件支出。其中 IT 服务增幅最大，复合年增长率为 71%；其次是软件，复合年增长率为 6.9%（图 2）。

2017 年中小企业的软件采购主要来自企业资源管理（ERM）、客户关系管理（CRM）和内容应用等三大类。此外，应用开发与部署、系统基础设施软件也将是中小企业软件投资的重要领域。

从地区来看，美国是中小企业 IT 支出的最大市场，到 2017 年总体规模将达到 1713 亿美元。预测期内，美洲占到了全球中小企业 IT 支出的大约 1/3，西欧和亚太（不包括日本）位列第二、三位。从增速看，5 年预测期内增长最快的地区是拉丁美洲（复合年增长为 6.3%），亚太地区的增长也快于整体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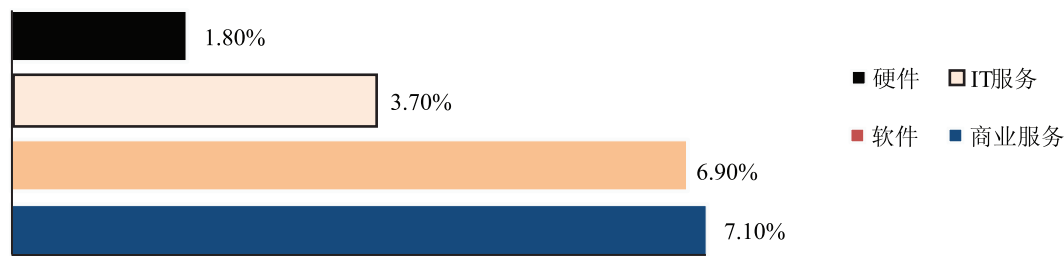


图 2 2016—2021 年全球中小企业 IT 投资复合增长率

数据来源：IDC。

（四）非授权软件全球泛滥，严重威胁全球软件产业的良性发展

商业软件联盟（BSA）在 2016 年的一项针对全球软件调查^①的数据表明，尽管相对于 2013 年的调查结果全球范围内非授权软件的使用率（43%）已经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 39%。即使在银行、证券、保险等网络攻击的主要行业，非授权软件的使用率也高达 25%。

按地区划分，非授权软件整体使用率最高的是亚太地区，达 61%，相比 2013 年下降了 1%。中欧和东欧地区以 58%的非授权软件使用率排名第二，比 2013 年降低 3%；中东和非洲地区占比 57%，位居第三，比 2013 年下降 2%。作为全球软件环境最好的地区，北美地区仍然保持全球最低的非授权软件使用率水平（17%），但其涉及的商业价值总额高达 100 亿美元。西欧地区的整体使用率为 28%，下降了 1%（图 3）。

在两个报告期内，中国的非授权软件使用率从 74%下降至 70%，是亚太地区进步最显著的国家之一。但绝对使用率仍然高居不下，目前仍有大量系统面临网络攻击威胁，现

^①BSA, Seizing Opportunity Through License Compliance; BSA Global Software Survey, 2016.

状不容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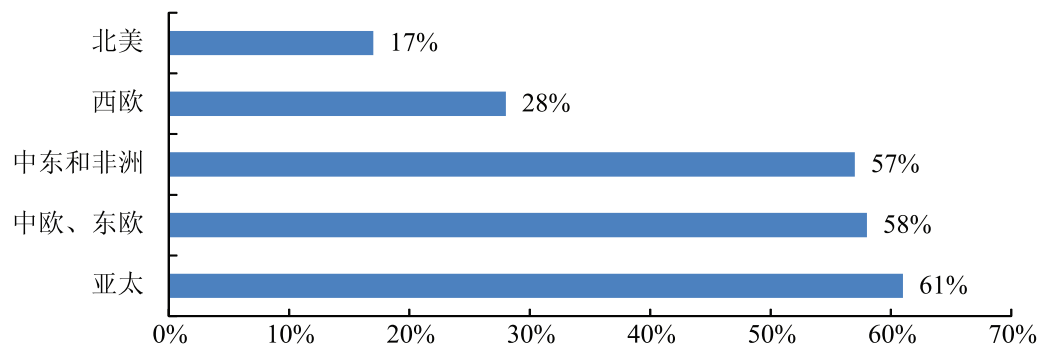


图 3 2015 年全球非授权软件使用率

数据来源：BSA。

二、全球软件贸易的状况与特点

（一）全球软件贸易增长稳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包括通讯、计算机服务和信息服务在内的全球软件贸易持续稳定增长。2005—2016 年，全球软件出口总额由 2027 亿美元增长至 4080 亿美元，翻了 1 倍。其中，计算机服务增速最快，由 1184 亿美元增长至 3531 亿美元，翻了 2 倍（表 2）。从区域构成看，发达经济体仍然是主要出口来源国，2016 年，发达经济体占比高达 70%，发展中经济体占比为 27%。但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明显快于发达经济体（表 3）；从发展中经济体的区域构成看，亚洲占据绝对比重，2016 年亚洲、美洲、非洲的出口额分别为 1197 亿美元、78 亿美元和 60 亿美元，其中南亚和东亚是出口占比最高的区域，南亚的印度和东亚的中国贡献最大（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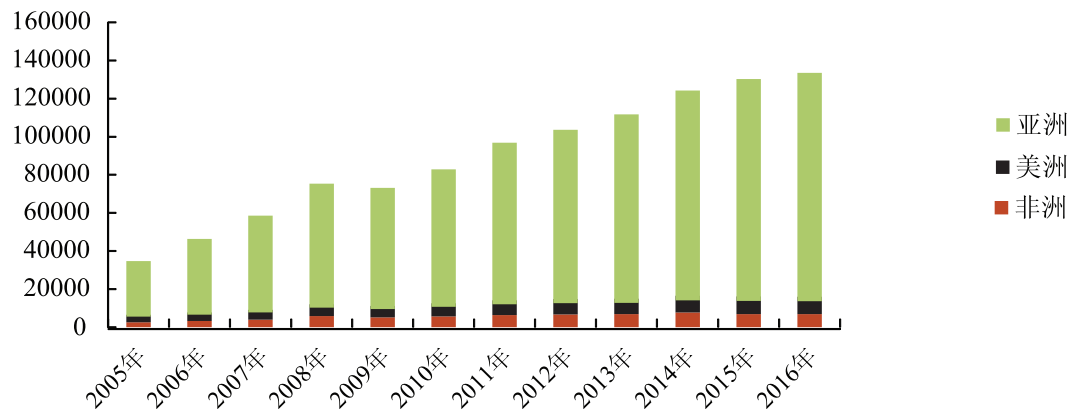


图 4 2005—2016 年全球通讯、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贸易发展中经济体构成（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UNCTAD 数据库。

表 2 2005—2016 年全球通讯、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贸易

单位：百万美元，现价

年份	通讯服务	计算机服务	信息服务	其他	总额
2005 年	74670	118420	9500	100	202690
2006 年	86310	139240	10490	110	236150
2007 年	99730	171580	11980	110	283400
2008 年	116730	203540	13100	160	333530
2009 年	111670	195090	12750	210	319720
2010 年	98890	215290	16300	180	330660
2011 年	108870	258030	16490	180	383570
2012 年	113460	276900	17440	200	408000
2013 年	116930	302840	20940	240	440950
2014 年	123020	346030	23970	300	493320
2015 年	112980	333700	24790	250	471720
2016 年	113530	353100	26150	270	493050

数据来源：UNCTAD 数据库。

注：以出口额统计，在计算机服务中包括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表 3 2005—2016 年全球通讯、计算机及信息服务出口区域构成

单位：百万美元，现价

年份	发展中经济体	发达经济体	转型期经济体	全球
2005 年	34760	165750	2180	202690
2006 年	46400	187110	2640	236150
2007 年	58600	220890	3910	283400
2008 年	75430	252840	5270	333530
2009 年	73190	241510	5020	319720
2010 年	82970	242300	5390	330660
2011 年	96870	280200	6490	383570
2012 年	103680	296860	7470	408000
2013 年	111800	320120	9030	440950
2014 年	124240	359210	9870	493320
2015 年	130320	332010	9400	471720
2016 年	133550	349640	9870	493050

数据来源：UNCTAD 数据库。

注：以出口额统计，在计算机服务中包括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二）软件外包服务市场容量巨大且逐年稳步增长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政府、金融、通信、交通、贸易、物流、能源等领域广泛运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稳定而持续的需求，为软件外包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在新技术、新应用和新模式以及外包服务供应链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推动下，全球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持续增长。美国市场调查机构 Statista 报告显示，2016 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总额为 3415 亿美元，预计每年以 5.84% 的幅度成长，2017 年、2018 年分别达到 3615 亿美元和 3825 亿美元（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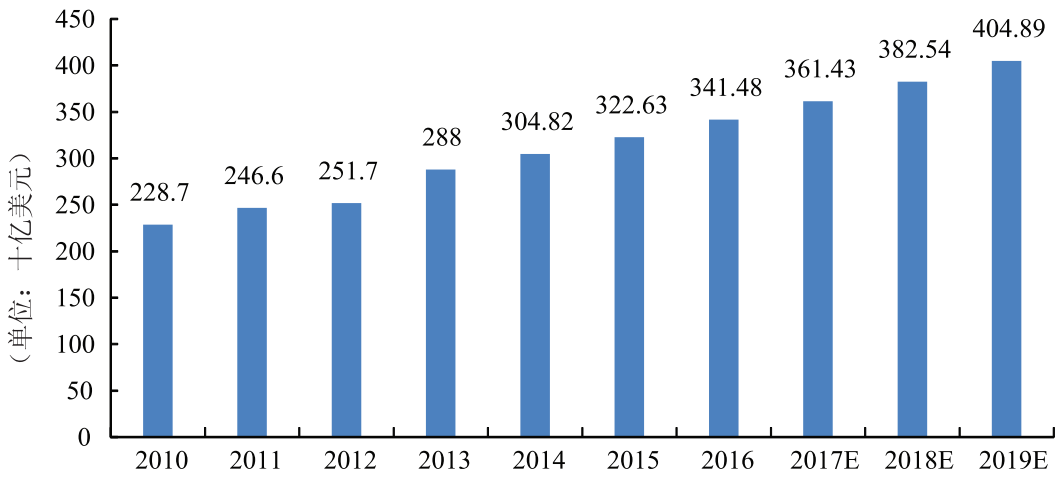


图 5 2010—2019 年全球软件外包规模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Statista，2016。

（三）基于网络安全的外包服务重要性不断凸显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一系列新技术正在颠覆全球软件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网络攻击和数据泄漏严重威胁着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由此推动了全球安全测试、IT 外包、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SIEM）等安全服务需求。Gartner 数据显示，2016 年、2017 年全球安全支出分别达 822 亿美元和 891 亿美元，预测 2018 年继续保持 8% 的增长率（表 4）。企业在网络安全监督和防范方面的需求推动了与安全相关的软件外包服务的发展。2017 年全球 IT 安全外包服务支出 167 亿美元，到 2018 年，这方面支出达 185 亿美元，比 2017 年增长 11%。据 Gartner 预测，2019 年，全球企业对安全外包服务的支出将占安全软件和硬件产品总支出的 75%，高于 2016 年的 63%。

表 4 2016—2018 年全球安全支出 单位：百万美元，现价

部门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预计）
身份识别和访问管理	3911	4279	4695
基础设施保护	15156	16217	17467
网络安全设备	9789	10934	11669
安全服务	48796	53065	57719
消费者安全软件	4573	4637	4746
总额	82225	89133	96296

数据来源：Gartner。

（四）软件贸易自由化将越发受制于 IT 基础设施和政策等软环境

全球数字贸易呈爆炸式增长，数据服务成为越来越多经济活动的基础，包括数据存储、加工和分析等经济活动，都是通过云计算得以实现。云计算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应用，正在使全球经济模式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无论初创企业还是个人消费者，政府机关还是中小型企业，云计算都能帮助他们以低成本高收益的方式快速并有效地获取技术和数据服务。这些服务打破了过去少数大企业数据的垄断格局，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前所未有的互联，空前提高了生产率和市场竞争性。云技术由于实现了技术层面的无国界性，可以在全球市场共享资源和信息，因而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器。与此同时，由于海量信息存储于云端，亦产生了大量关于隐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云计算是一种需要跨境运营的服务，在数字技术和云计算的跨国提供方面，大部分国家趋于谨慎和保守。无国界技术并没有在现实跨国贸易中得以实现。BSA 对占全球 80% IT 市场份额的 24 个国家^①从数据隐私、信息安全、网络犯罪、知识产权、产业标准和国际协调规则、法律环境和自由贸易、IT 基础设施数据等 7 个维度进行量化测评，^② 结果显示，只有极少数国家，如美国和日本，有成熟的数据跨境法规，对互操作性相对开放，较少对境外数据外包进行限制；相对于 2013 年测评结果，所有国家在改善 IT 基础设施环境方面均取得进展；政策环境改善状况明显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尽管许多国家已经发展和实行了新的网络安全框架、法律和政策措施，但是，除美国和加拿大实行自由贸易外，大部分国家仍然在政府采购中对国内和外国提供商实行差别对待，或设置

①分别是日本、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意大利、英国、波兰、西班牙、韩国、马来西亚、南非、墨西哥、阿根廷、俄罗斯、印度、土耳其、印尼、泰国、巴西、中国、越南。

②BSA，2016 BSA Global cloud computing scorecard，2016.

其他贸易壁垒。发达国家中，韩国（6.2）得分最低。发展中国家中，中国（1.0）、越南（1.4）、南非（1.8），印尼（2.0）和巴西（2.2）得分最低。此外，在产业标准和国际协调规则方面，美国是最积极的倡导者，大部分国家不具备同美国一样完善的网络安全体系、法律和政策框架，因此这方面进展不大，甚至推出了阻碍云计算发展的政策，限制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在数据提供方面的跨境自由迁移。

三、全球软件贸易的发展趋势

（一）全球软件贸易规模将持续增长

全球软件产业供需双向扩张的格局将使软件贸易规模保持持续扩大的发展趋势。

软件产业已经成为基础性经济产业，信息技术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无处不在，在金融、通信、交通、贸易、物流、能源等领域广泛运用。即使是最不发达经济体，都将对信息技术产生稳定而持续的需求，这是带动全球软件贸易增长的内在动力。

在宏观层面上，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减弱，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好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表明，自2017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速结束了持续多年的下滑趋势。IMF预计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3.6%，OECD在2017年追踪的245个经济体全部实现经济增长。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均表现出加速的经济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还是产业结构升级调整，都将释放出大量与软件需求相关的项目，带动软件贸易规模的扩大。

在供给层面，许多国家将发展软件产业作为战略优先。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在软件产业上的先发优势，必将进一步在全球市场确立软件产业规则制定中的垄断地位，通过不断挖掘和向外输出新的软件市场需求，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软件行业和相关技术标准；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经过多年的持续积累，在软件产业的某些细分领域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和技术优势，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与发达国家错位竞争，持续对外输出优势软件产能。

（二）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向新兴市场转移

全球软件外包产业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趋势性变化，向新兴市场的战略转移是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转移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推动着新兴市场软件外包服务业迅速发展。

兴起于发达国家的软件服务业，本质上是高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高素质软件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软件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发达国家，软件劳动力短缺和人力资本高企造成国内软件劳动力严重短缺，因此需要从国外大量购买软件服务，造成其在通用软件领域贸易顺差和软件服务领域贸易逆差的分化局面。这为软件产业发展基础良好，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裕的新兴市场国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管理咨询公司 A. T. Kearney 发布的 2016 年全球离岸服务外包目的地指数^①排名中，前 10 名分别是印度、中国、马来西亚、巴西、印尼、泰国、菲律宾、墨西哥、智利和波兰，大部分为新兴市场国家。印度由于工程、产品研发、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吸引力以及房地产、劳动力方面相对便利性等长期积累下来的软件外包优势位居榜首，中国因治理改善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等因素位居第二，波兰在欧洲近岸外包中占据绝对优势，马来西亚、巴西、印尼、菲律宾、墨西哥和智利等国家在资源禀赋、政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有优势，均榜上有名。除了承接业务流程外包必备的人力资源外，墨西哥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以及毗邻美国的区位优势，对希望在北美市场开展业务的发包公司极具吸引力。

（三）人工智能重塑软件外包行业，低端软件外包业务将逐渐被取代

业务流程外包是软件服务外包的主要形式之一。发包方将业务进行外包的最大动机是剥离非核心业务，降低成本，以专注保持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经济学人》2016 年的一篇文章认为，呼叫中心为新兴市场国家创造了数百万工作岗位，但是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威胁并夺走这些工作。

人工智能在许多领域已经能取代人类的工作。在业务流程外包领域，话务和数据处理等基本的常规性工作，人工智能可以更高效、低价的完成。目前，许多大公司的常规数据监控和基础设施数据维护已经实现了完全自动化，而在更高服务水平上的一些解决方案，如解决代码执行错误或开发新功能，自动化程序亦可以完成 40% 左右的比例。在业务流程外包领域，一些发包公司正在通过电子邮件或聊天机器人取代呼叫中心，另外一些对外发包的西方公司也正在将语音服务等离岸外包业务收回国内。Everest 数据显示，2013—2014 年，美国占全球客服中心从业人数的份额从 19% 上升至 21%，业务流程外包正在减少。

数字化和自动化的普及，给许多接包国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纽约时报》2017 年 6 月的一篇报道称，印度 IT 产业已经开始大量裁员。麦肯锡预测 50%~70% 的印度科技行

^①该指数基于对 55 个经济体的分析数据，包括金融吸引力、劳动人口技能和可获得性、营商环境等 3 项主要分指标，以及信息技术预期可交付成果、业务流程外包等辅助指标。

业员工可能会在 2020 年失业。

（四）基于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的软件服务在全球软件贸易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对网络风险的应变能力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世界经济论坛《2017 年全球风险报告》^① 的结果显示，网络攻击是全球最大的安全问题。总体看，全球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投入仍然不足，目前只有 50% 的国家部署了网络安全战略。在企业层面上，为了及时适应市场的高速变化，以保持竞争力，未来将有更多企业发展云技术，将企业的运营和财务等功能迁移至云端，大量的 IT 服务采取云交付模式，数据泄露风险随之增大。在普华永道的调查中，仅有不到 50% 的调查对象正在采用基本网络安全控制，这为基于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的软件服务贸易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

企业对新兴威胁的意识增强以及向数字化商业战略的演变，促使未来几年成为全球安全软件服务贸易发展的黄金期。与安全服务相关的 IT 外包、咨询和实施服务，新兴应用安全测试工具，尤其是交互式应用程序的安全测试等是增长最快的领域。此外，根据 Gartner 预测，由于大型组织希望“在短时间内对设计、构建和运行成熟安全程序的复杂性”加以管理，安全服务与 IT 外包（ITO）项目的捆绑销售也将大幅上升，比例将从目前的 20% 上升到 2020 年的 40%。

参考文献：

- 1. 李庭辉：《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发展概览》，《全球化》2017 年第 4 期。
- 2. 方虹、王旭、李静：《全球软件贸易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全球化》2017 年第 12 期。
- 3. 王晓红、柯建飞：《全球服务贸易形势分析及展望》，《国际贸易》2018 年第 1 期。
- 4. 李庭辉：《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现状及趋势》，《全球化》2017 年第 8 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①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2017 *Global Risks Report*, 2017.

· 新 书 推 介 ·

开放发展 与世界共赢

——王晓红、陈超等著《“十三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战略研究》简介

书 讯

王晓红、陈超等著《“十三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8 年 3 月出版），该书的出版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决策、理论研究和企业国际化经营都具有较强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本书的研究目的与战略意义

实施积极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健康发展，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既是经济新常态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把握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的长远战略需要。将有利于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紧密结合、投资与贸易紧密结合、国际国内产业联动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放型经济迈向更高水平。通过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秉持互利共赢、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理念，有利于构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输出国，也是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将为国际直接投资增长奠定有利基础，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实施振兴制造业战略将大力吸引世界跨国投资，这些都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随着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高，国内产业结构加快调整以及投资促进政策不断完善，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开拓了新的市场空间，这些都将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规模化加速发展的历

史新时期。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风险性更大。发达国家继续主导新一轮高标准投资规则，逆全球化思潮不断上演将导致保护主义；发达国家政府更迭，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区域战争冲突，宗教民族矛盾加剧等将导致全球政治风险；全球经济复苏仍不稳定，国际金融动荡将导致汇率风险等等。这些都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构成严峻挑战，要求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精准施策。

基于此，本书从国家宏观战略出发，站在理论高度，结合企业实际，在系统分析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趋势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总体布局及发展思路，力求对新形势下“走出去”战略宏观决策发挥积极参谋作用，对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切实发挥指导作用。同时，对于该问题的理论学术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二、本书的主要特色与创新之处

本书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16 年重大课题项目《“十三五”时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组顾问：张晓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张祥（商务部原副部长）；课题负责人：谢平（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课题组长：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该研究团队是由长期从事对外开放问题研究的专家组成，他们分别来自各个智库，大家齐心协力、大胆探索创新，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扎实研究，终于形成了目前的成果。

在研究视角上，注重发挥智库特色，以聚焦国家战略、服务中央决策为导向，立足全球视野、面向国情实际，力求做到前瞻性、战略性、理论性、科学性和应用实操性相统一。本书分析了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新变化、新特征和新趋势，以及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为我国制定“十三五”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提供了依据。

在研究重点中，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问题，注重典型引路，由点到面，点面结合。比如，针对“一带一路”建设，选取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合作、矿产资源投资作为典型行业进行研究；针对近年来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快速增长的问题展开研究。在投资区域中，针对我国新时期的区域投资战略布局，选取美国、欧盟、亚洲、非洲进行深入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一是理论架构比较系统，对现实分析起到了支撑作用。作者在参阅大量国际国内文献的基础上，对跨国直接投资理论的演进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尤其注重对全球化深入发展以来新的国

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研究，为研究新形势下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运用大量权威数据进行定量分析。该研究十分注重用数据说话，用数据支撑观点，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严谨、系统、完整的问题分析视角，使结论做到科学准确，针对性和应用性较强。三是注重调查研究、问题导向和成果转化。在研究期间，课题组对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先后召开了相关企业、政府部门、产业园区、行业协会、金融服务机构等座谈会，认真听取了反映的问题，并实地调研了杭州、温州等地，对于相关部门完善促进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四是注重案例研究，窥一斑而见全豹。为了给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和绿色投资提供活生生的样本，从中吸取成功做法和经验教训，研究选取了多个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大经典案例进行解剖。作者在深入企业调研、了解详情、掌握了鲜活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总结和归纳，并抓住问题的关键点展开分析，从而为我国企业减少“走出去”的损失，提高成功率提供指导和借鉴。

全书由一个总报告、十二个专题报告和两个附录构成。总报告是在高度概括各专题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总体战略思路。专题一至专题四重点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演进与现实进展进行研究。专题五至专题七选取制造业和矿产资源两个典型行业以及跨国并购这一投资方式进行研究。专题八至专题十一对我国重点投资区域进行了研究。专题十二则是对相关政策的梳理研究。

其中，总报告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思路。分析了当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曲折前行、产业结构和布局加快调整、跨境并购高速增长，新一轮跨国直接投资将呈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轮驱动，投资规制将呈现全球投资自由化与区域保护主义并存等总体态势。从国际国内环境层面分析了“十三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析了“十二五”以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成绩及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已经形成辐射全球的区域布局，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增强并逐步形成国企与民企双轮驱动的格局，跨境并购成为我国企业获取全球战略资源的重要方式，并从企业层面、服务体系层面、政策层面等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实施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等方面，提出了构建“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体制和新格局的思路。

责任编辑：李蕊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8年3月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和专家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经合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形势良好

2018年3月13日，经合组织（OECD）发表最新的经济前景预测报告称，全球经济形势良好，美国的减税和加大开支政策以及德国的财政刺激政策等将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增长，世界经济将呈现2011年以来最快增速，未来两年内经济增幅均将达到3.9%。这一数值高于2017年11月公布的3.7%（2018年）和3.6%（2019年）。

英国2018年经济增长将慢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走高的通胀将继续侵蚀家庭收入，因脱欧不确定性趋弱的商业投资也将在未来两年影响经济增长。OECD预计，2018年英国GDP将增长1.3%，虽然高于之前公布的1.2%，但低于其他二十国集团（G20）成员；2019年英国经济增长1.1%，与日本同为G20国家中增长最慢者。除俄罗斯外，其他G20成员的经济增长都将比2017年11月的预期加速。OECD首席经济学家Pereira称，投资的复苏将促进全球增长，同时贸易量也将持续2017年的增势，“投资归来，这对于就业和经济增长都是好消息”。

然而，有损于增长和就业的贸易壁垒是潜在风险。对于美国总统签署的提高进口关税命令，OECD也表示担忧，认为其将成为对经济增长的威胁。Pereira表示：“任何形势的恶化、任何报复或针锋相对的场景都将非常具有破坏性。我认为重要的是避免恶化，并促进全球对话，不仅解决钢铁问题，还要避免更大的贸易间接后果。”

（二）世界贸易组织：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将威胁全球经济

2018 年 3 月 30 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对外表示，美国与中国之间若爆发完全贸易战，将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影响”。这一表态说明，美国近期的种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不仅公然违反 WTO 国际义务，更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蔑视和践踏，这将会把全球经济引入危险境地。

贸易摩擦高发对全球经济的发展极具危害。以 WTO 为主体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历史的选择，其解决全球贸易投资问题主渠道的地位不容改变。如果有成员抛开 WTO 规则谈双边贸易，可能将全球经济引入“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危险境地。以 301 调查为依据对中国产品征税，这是公然违反 WTO 规则，把多边贸易体制完全抛在脑后，是对多边规则的蔑视和践踏。美国的恶劣行径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连锁反应，使本已复苏的全球经济再次蒙上阴影。

历史已经证明，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WTO 规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多边贸易体制是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如果有关成员国不遵守多边贸易体制规则，世界贸易将再度进入强权竞争的无序时代，导致贸易和投资萎缩，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最终也会危及各方自身利益。

（三）高盛预测全球经济前景仍然向好

2018 年 3 月 26 日，高盛集团发布了 2018 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展望报告，指出目前金融环境收紧以及各方对关税的担忧将使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长承压，但没有理由担心会出现更加严重的经济放缓，全球经济整体前景仍向好。

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在报告中指出，尽管 2018 年前三个月经济出现一些衰退迹象，但全球生产总值（GDP）增速仍略高于高盛预测的 4.1%。报告称：“假设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收关税的行为引发其他国家报复性贸易行动，并且关税将推高通胀，这会使得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承压。但高盛的经济模型显示，在数据表现良好的大环境下，这些影响将显得微不足道。”自 2017 年底以来，高盛用于衡量全球经济增长势头的指标“仅略有放缓”。

此外，高盛经济学家们坚持对 2018 年美联储加息 4 次以及 2019 年再加息 4 次的预测，“相对于市场定价而言，这显然是鹰派的，尽管相对于美联储的观点而言，这种差异现在只是一个时机问题”。

（四）穆迪：侵蚀贸易体系会重创全球经济

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对华关税计划，准备对每年高达 500 亿～

6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服务机构之一穆迪认为，这些措施对中美两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但这是美国政府迄今采取的贸易措施中最严厉的一次。

穆迪发出警告，如果特朗普政府此举标志着基于现行规则的架构被打破的开端，那么美国及全球经济都将受到重大的负面影响。穆迪相关负责人表示，关税的整体影响将取决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是否会随之采取一系列类似行动，从而逐步侵蚀基于现行规则的贸易体系。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那么物价上升以及商业和消费者信心减弱就将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重击。

（五）国际能源署预计 2018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加速增长

2018 年 3 月 15 日，国际能源署（IEA）预测 2018 年全球石油需求会加速增长，将全球石油需求上调至 9930 万桶/日，高于 2017 年的 9780 万桶/日。OECD 国家 2018 年 1 月商业原油库存出现 7 个月以来的首次增长，达到 28.71 亿桶，较 5 年均值高出 5300 万桶。但 IEA 强调，委内瑞拉的问题仍有可能引发新一波的库存下滑。委内瑞拉目前出现经济危机，两年来石油生产已经下滑 50%，降至逾 10 年来的最低位。

为削减库存，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俄罗斯及其他几个产油国从 2017 年 1 月起执行减产协议，期限直至 2018 年底。IEA 指出，假设 2018 年底前 OPEC 产量没有变化，预计 2018 年第一季度 OECD 原油库存将小幅增加，此后减少。同时，预计 2018 年非 OPEC 产油国供应量将增加 180 万桶/日至 9790 万桶/日。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世界银行评中国经济年报——史无前例的成就

世界银行 2018 年 3 月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在推进经济快速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广泛的改革使中国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可能，这些改革把一个由政府主导、以农业为主、封闭型的计划经济体转变为更加市场化、城镇化的开放型经济体。

在实现经济实力新跃升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2017 年中国 GDP 折算超过 12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 15% 左右，比 5 年前提高 3 个百分点以上，稳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规模有望重回世界首位；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高铁运营网和移动宽带网；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在 30% 左右，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重要引擎。

“在全球经济层面，中国经济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塞内加尔中国问题专家阿达玛·盖伊表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作用越来越关键，“向东看”成为趋势。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局长阿伊汗·高斯认为，中国经济取得了出人预料且令人印象深刻的优异表现，对中国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抱有信心。

（二）世行亚行关注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 2018 年 3 月 24 日开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和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他们认为的当前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中国金融部门面临三大挑战，金融部门改革与发展始终是中国进步的组成部分。今天，中国的金融部门与市场经济的需求已经非常接近，更加多元化，融入世界的程度更高，受到更好的监管，并有能力为中国充裕的储蓄提供中介服务，但挑战依然存在。

第一项关键挑战是维护金融部门的稳定。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金融部门支持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在增长与就业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但系统风险也随之上升，中国监管当局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风险。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预期，就业增长创纪录，世界经济复苏迅速，是解决中国金融风险的良好时机。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减少对国内刺激措施的依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第二项关键挑战是改革金融部门使其能够支持中国新的发展目标。对于下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寻求高质量增长、生产率和创新驱动型增长、包容性增长及更加绿色的增长。要想达到生产率驱动型增长，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对于金融部门更为重要。具有良好的监管和发达的资本市场、更加平衡的金融部门结构、普惠金融的进步都十分重要。

第三个关键挑战是顺应国际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作用，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在全世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对外投资遵循中国金融机构在国内践行并已成为国际社会规范的高标准，就能实现效益最大化，但中国越来越需要考虑接受国的债务可持续性。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高度称赞了过去 40 年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他表示，新时代下中国在迈向高质量增长时面临三大政策挑战。首先是包容性，中国面临着不平等加剧的挑战。加大城乡之间的流动性，改革税收制度，促进收入再分配、教育和技能发展，以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都有助于增进包容性。其次是气候变化和环境。中国在绿色

经济建设上已遥遥领先，并成为《巴黎协定》下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的重要参与者。再次是老龄化。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在 2016 年为 15%，到 21 世纪 30 年代中期，这一数字将超过 30%。

中尾武彦特别强调包容性：“中国已经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能力的国家，并且具有持续增长的势头。与进一步实现科技发展和产业转型相比，增强社会包容性是中国面临的更大挑战。”他强调，应对三大挑战、促进可持续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市场的有效性。

（三）摩根大通：中国 6.5% 经济增速可以实现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在 2018 年 3 月 8 日表示，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当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在 6.5% 左右，与 2017 年 6.5% 左右的目标基本一致，是比较合适、可以实现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对于经济新动能的政策支持以及全球经济以高于趋势的水平保持同步增长的外部环境因素。

他认为，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强调“质量第一”，愿意为了更高的增长质量容忍小幅下降的增长速度。但中国政府并不会为了推行激进的结构改革而允许破坏性的经济增长减速。报告首次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纳入预期目标，也突显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再平衡、拉动内需及就业市场稳定的持续关注。报告还强调了经济进一步开放及市场化，强调了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支持以及通过协商方式解决贸易争端。

他表示，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预计基准利率将维持不变（但不排除年内上调利率的可能），且整体信贷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如果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意外上行（受食品价格反弹幅度强于预期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意外上行影响波及中国等因素影响），且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稳固或意外上行，加之围绕美联储将持续加息的市场预期升温，中国央行 2018 年仍可能考虑上调基准政策利率。

（四）高盛大幅上调人民币汇率预期

随着美联储加息落地、贸易摩擦升级等因素影响，美元近期出现下跌，人民币上涨。进入 2018 年以来，离岸和在岸人民币一路上涨，3 月底/4 月初甚至涨至 2015 年“811 汇改”以来新高。

据彭博社报道，高盛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称，中美贸易局势紧张，人民币 2018 年预计将升值。高盛修订了美元/在岸人民币在 3 个月、6 个月和 12 个月的汇率预测，从 6.35、6.40 和 6.45 分别上调至 6.30、6.25 和 6.20，不仅人民币汇率上修，而且走势预判还从逐步贬值改为稳定升值。

（五）联合国报告赞中国“海绵城市”项目节水先行

2018 年 3 月 19 日，联合国发布《2018 年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称，据估计每年有 36 亿人也就是全球近 50% 的人口，生活在一年中至少有一个月可能出现水资源短缺的地区，该数字到 2050 年可能升至 57 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在巴西利亚举行的报告发布会上表示：“这份报告提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更好管理水资源，这是所有人需要一同尽责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力求避免与水有关的冲突。”报告称，近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水资源使用量增加了 6 倍，“并且继续以每年约 1% 的速度稳步增长”。由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变化等因素，使用量预计将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由于气候变化，全球水资源不平衡问题不断加剧，“较湿润地区普遍变得更湿润，较干旱地区变得更干旱”。

报告主编理查德·康纳认为，水库、灌溉渠和处理厂等所谓的“灰色”或者说是人造水基础设施，已经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报告称，绿色解决方案已经呈现巨大潜力。例如，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通过森林保护项目以及为鼓励农民采取环保做法而向其付费，纽约保护了向城市供水的三个最大流域。另一个例子是中国旨在改善水供应的“海绵城市”项目。到 2020 年，中国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打造 16 个试点项目，目标是通过提高渗水、保水和蓄水、水净化以及恢复附近湿地等方式，回收 70% 的雨水。康纳指出，“这些解决方案具有成本效益”，并且成本不高于传统系统。

联合国指出，如果采用更加绿色的水资源管理做法，估计全世界农业产量可能增加约 20%。联合国世界水评估计划协调员斯蒂芬·乌伦布鲁克表示，除了改善水质外，“通过更好的水资源管理可能增加每公顷的农业产量”，从而养活更多的人。报道称，“绿色”基础设施还有助于对抗侵蚀、干旱和洪水风险，同时提升土壤质量并增加植被。

责任编辑：李 蕊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估计值	2018 年 预测值	2019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 年 4 月)				
世 界	3.2	3.8	3.9	3.9
发达国家	1.7	2.3	2.5	2.2
美 国	1.5	2.3	2.9	2.7
欧元区	1.8	2.3	2.4	2.0
日 本	0.9	1.7	1.2	0.9
发展中国家	4.4	4.8	4.9	5.1
印 度	7.1	6.7	7.4	7.8
俄罗斯	-0.2	1.5	1.7	1.5
巴 西	-3.5	1.0	2.3	2.5
世界银行(WB,2018 年 1 月)				
世 界	2.4	3.0	3.1	3.0
发达国家	1.6	2.3	2.2	1.9
发展中国家	3.7	4.3	4.5	4.7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8 年 4 月)				
世 界	2.5	3.2	3.3	3.2
美 国	1.5	2.3	2.8	2.6
欧元区	1.8	2.5	2.4	1.9
日 本	0.9	1.7	1.4	1.1
印 度	7.1	6.7	7.4	7.6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3)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估计值	2018 年 预测值	2019 年 预测值
世 界	2.3	4.9	5.1	4.7
进口				
发达国家	2.7	4.0	5.1	4.5
发展中国家	1.8	6.4	6.0	5.6
出口				
发达国家	2.0	4.2	4.5	3.9
发展中国家	2.6	6.4	5.1	5.3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7 年 10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估计值	2018 年 预测值	2019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 年 4 月)				
世界	2.8	3.1	3.3	3.3
发达国家	0.8	1.7	2.0	1.9
发展中国家	4.3	4.0	4.6	4.3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18 年 4 月)				
世 界	2.5	2.5	2.7	2.6
美 国	1.3	2.1	2.5	2.1
欧元区	0.2	1.5	1.5	1.5
日 本	-0.1	0.5	1.0	1.0
印 度	4.5	3.7	4.8	4.8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7 年		4.8	3.3	5.8
	3 月	3.7	2.6	4.6
	4 月	2.6	1.4	4.3
	5 月	2.1	1.0	3.6
	6 月	1.3	0.2	2.6
	7 月	1.5	0.5	2.8
	8 月	2.1	1.4	3.4
	9 月	2.7	1.7	4.0
	10 月	2.3	1.8	3.9
	11 月	2.1	1.5	3.5
	12 月	1.9	1.1	3.3
2018 年		2.2	1.4	3.1
	1 月	2.2	1.4	3.4
	2 月	2.2	1.5	3.4
	3 月	2.3	1.5	3.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7 年		4.2	3.0	5.4			
	3 月	3.8	2.6	5.2	52.7	53.6	53.5
	4 月	4.5	3.6	5.4	52.6	53.4	53.5
	5 月	3.8	3.1	5.1	52.6	53.2	53.3
	6 月	3.8	3.1	5.4	52.7	53.1	53.6
	7 月	3.8	3.3	5.5	53.1	53.7	54.2
	8 月	3.8	2.9	5.8	53.2	53.9	53.7
	9 月	4.4	3.5	5.2	53.4	53.7	54.1
	10 月	4.4	3.2	5.6	54.0	54.9	55.1
	11 月	4.3	3.6	5.5	54.5	55.5	55.8
	12 月	2.5	1.8	4.4	52.9	54.2	54.1
2018 年							
	1 月	4.3	2.8	6.4	54.4	55.6	55.4
	2 月	5.0	3.5	6.1	54.1	54.8	55.0
	3 月				53.4	53.5	53.9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6 年		1.5	2.7	0.8
	2 季度	2.2	3.8	-0.9
	3 季度	2.8	2.8	0.5
	4 季度	1.8	2.9	0.2
2017 年		2.3	2.8	0.1
	1 季度	1.2	1.9	-0.6
	2 季度	3.1	3.3	-0.2
	3 季度	3.2	2.2	0.7
2018 年		2.9	4.0	3.0
	1 季度	2.3	1.1	1.2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0.7	-0.3	1.3
	2 季度	1.4	2.8	0.4
	3 季度	1.5	6.4	2.7
	4 季度	1.7	-3.8	8.1
2017 年		4.0	3.4	4.0
	1 季度	8.1	7.3	4.3
	2 季度	3.2	3.5	1.5
	3 季度	2.4	2.1	-0.7
2018 年		8.2	7.0	14.1
	1 季度	4.6	4.8	2.6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6 年		1.5	2.7	0.8
	2 季度	1.2	2.8	0.6
	3 季度	1.5	2.8	0.4
	4 季度	1.8	2.8	0.4
2017 年		2.3	2.8	0.1
	1 季度	2.0	2.9	-0.2
	2 季度	2.2	2.7	0.0
	3 季度	2.3	2.6	0.0
2018 年		2.6	2.8	0.7
	1 季度	2.9	2.6	1.2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					单位:亿美元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月份		(%)	(%)		(%)	(%)	
2016 年		0.7	-0.3	1.3	2017 年	21913		3.4	28128		3.9	-6215
	2 季度	0.5	-1.6	0.5	2 月	1918	0.3	6.0	2362	-1.5	4.5	-444
	3 季度	0.1	1.0	0.7	3 月	1917	0.0	6.6	2364	0.1	8.8	-447
	4 季度	1.1	0.6	2.7	4 月	1906	-0.6	4.7	2386	0.9	8.3	-480
2017 年		4.0	3.4	4.0	5 月	1908	0.2	4.8	2386	0.0	6.7	-478
	1 季度	3.2	3.1	3.8	6 月	1931	1.2	5.1	2386	0.0	4.9	-455
	2 季度	3.6	3.2	4.1	7 月	1933	-0.1	4.3	2387	0.0	5.3	-454
	3 季度	3.8	2.2	3.2	8 月	1937	0.2	3.4	2383	-0.2	4.3	-446
2018 年	4 季度	5.4	5.0	4.7	9 月	1959	1.1	4.1	2412	1.2	6.5	-453
	1 季度	4.6	4.3	4.2	10 月	1957	-0.1	5.4	2448	1.5	7.1	-491
					11 月	2002	2.3	8.3	2511	2.6	8.6	-509
					12 月	2036	1.7	7.4	2575	2.6	10.0	-539
					2018 年							
					1 月	2009	-1.3	5.1	2576	0.0	7.4	-566
					2 月	2044	1.7	6.6	2620	1.7	10.9	-576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7 年			1.2	4.4		227.5		
	3 月	0.1	1.2	4.5		7.3		
	4 月			4.4		17.5		
	5 月			4.3		15.5		
	6 月	1.5	1.3	4.3		23.9		
	7 月			4.3		19.0		
	8 月			4.4		22.1		
	9 月	2.7	1.4	4.2		1.4		
	10 月			4.1		27.1		
	11 月			4.1		21.6		
	12 月	0.0	1.1	4.1		17.5		
2018 年								
	1 月			4.1		23.9		
	2 月			4.1		32.6		
	3 月			4.1		10.3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6 年		4571		2807	1764			
	1 季度	1414		777	637			
	2 季度	1617		762	855			
	3 季度	1091		889	203			
	4 季度	448		379	69			
2017 年		2754		3423	-669			
	1 季度	770		1102	-332			
	2 季度	816		838	-22			
	3 季度	640		676	-36			
	4 季度	528		806	-278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6 年		1.8	2.0	1.8
	1 季度	0.5	0.7	0.8
	2 季度	0.4	0.3	0.3
	3 季度	0.4	0.3	0.2
	4 季度	0.6	0.6	0.3
2017 年		2.4	1.7	1.2
	1 季度	0.6	0.5	0.2
	2 季度	0.7	0.5	0.4
	3 季度	0.7	0.3	0.4
	4 季度	0.7	0.2	0.3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4.6	3.4	4.8
	1 季度	0.4	0.5	0.4
	2 季度	2.6	1.4	2.0
	3 季度	0.6	0.4	0.6
	4 季度	0.7	1.5	1.7
2017 年		2.9	5.1	4.3
	1 季度	0.1	1.4	0.3
	2 季度	2.0	1.2	1.8
	3 季度	-0.3	1.7	0.7
	4 季度	1.2	2.2	1.6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7 年		0.7		244.3	9.1
	2 月				9.5
	3 月	0.1	1.1	78.9	9.4
	4 月				9.2
	5 月				9.2
	6 月	0.3	0.2	64.0	9.0
	7 月				9.0
	8 月				9.0
	9 月	0.4	0.9	41.5	8.6
	10 月				8.8
	11 月				8.7
	12 月	0.3	0.7	41.5	8.6
2018 年					
	1 月				8.6
	2 月				8.5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6 年		1.8	2.0	1.8
	1 季度	1.7	2.1	1.9
	2 季度	1.7	2.0	1.9
	3 季度	1.7	1.8	1.7
	4 季度	1.9	1.9	1.6
2017 年		2.4	1.7	1.2
	1 季度	2.1	1.7	1.0
	2 季度	2.4	1.9	1.1
	3 季度	2.7	1.9	1.4
	4 季度	2.8	1.5	1.4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4.6	3.4	4.8
	1 季度	3.1	3.2	4.2
	2 季度	5.5	3.2	5.3
	3 季度	5.1	3.3	4.9
	4 季度	4.4	3.8	4.8
2017 年		2.9	5.1	4.3
	1 季度	4.1	4.8	4.7
	2 季度	3.5	4.5	4.5
	3 季度	2.5	5.8	4.5
	4 季度	3.0	6.6	4.4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	(%)		(%)	(%)	口额
2017 年	21949		7.1	19608		9.9	2341
2 月	1804	1.5	5.6	1624	-0.2	7.6	180
3 月	1834	1.7	14.9	1628	0.2	17.3	206
4 月	1803	-1.7	-1.5	1626	-0.1	5.0	177
5 月	1843	2.2	13.8	1660	2.1	18.7	182
6 月	1809	-1.8	4.2	1598	-3.7	6.8	211
7 月	1787	-1.2	5.9	1613	1.0	9.0	173
8 月	1836	2.7	7.0	1628	0.9	9.2	207
9 月	1849	0.8	5.2	1613	-0.9	5.5	236
10 月	1814	-1.9	9.0	1630	1.1	10.7	183
11 月	1888	4.1	8.5	1678	2.9	9.1	210
12 月	1918	1.6	0.8	1686	0.5	2.6	231
2018 年							
1 月	1905	-0.7	9.0	1703	1.1	5.8	202
2 月	1861	-2.3	3.0	1651	1.1	1.6	21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7 年		888	894	- 5
	2 月	949	951	- 2
	3 月	106	228	- 122
	4 月	74	276	- 202
	5 月	152	229	- 77
	6 月	17	- 405	422
	7 月	- 1861	- 1774	- 87
	8 月	192	127	65
	9 月	24	114	- 90
	10 月	76	344	- 268
	11 月	168	- 4	172
	12 月	- 21	- 356	335
2018 年				
	1 月	112	374	- 262
	2 月	250	298	- 49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6 年		0.9	0.1	1.3
	1 季度	0.5	0.2	1.1
	2 季度	0.3	- 0.1	- 1.2
	3 季度	0.2	0.4	0.4
	4 季度	0.4	0.1	- 0.1
2017 年		1.7	1.1	0.1
	1 季度	0.5	0.3	0.1
	2 季度	0.6	0.9	0.2
	3 季度	0.6	- 0.6	0.1
	4 季度	0.4	0.5	0.0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1.1	1.3	- 1.9
	1 季度	- 0.1	0.0	- 1.7
	2 季度	1.1	- 0.5	- 0.9
	3 季度	0.2	2.3	0.1
	4 季度	0.8	2.7	0.6
2017 年		2.4	6.8	3.6
	1 季度	0.2	2.0	1.7
	2 季度	1.9	0.0	1.9
	3 季度	- 0.1	2.1	- 1.2
	4 季度	0.0	2.4	2.9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6 年		0.9	0.1	1.3	
	1 季度	0.6	0.0	2.6	
	2 季度	0.7	- 0.2	1.2	
	3 季度	0.9	- 0.1	1.3	
	4 季度	1.5	0.6	0.2	
	2017 年		1.7	1.1	0.1
		1 季度	1.4	0.8	- 0.6
		2 季度	1.5	1.8	0.6
3 季度		1.9	0.6	0.2	
4 季度	2.0	1.1	0.4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1.1	1.3	- 1.9
	1 季度	- 0.4	- 1.3	- 1.9
	2 季度	1.9	0.9	- 0.8
	3 季度	1.2	1.0	- 3.3
	4 季度	1.9	4.8	- 1.6
2017 年		2.4	6.8	3.6
	1 季度	2.0	6.7	1.5
	2 季度	3.4	6.8	4.5
	3 季度	2.8	6.9	2.8
	4 季度	1.8	6.8	5.5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7 年				2.8
	3 月	4.7	2.14	2.8
	4 月	5.1	2.17	2.8
	5 月	3.7	2.28	3.1
	6 月	3.9	2.24	2.8
	7 月	3.9	2.26	2.8
	8 月	5.1	2.22	2.8
	9 月	1.3	2.27	2.8
	10 月	3.6	2.35	2.8
	11 月	1.5	2.34	2.7
	12 月	2.1	2.38	2.7
	2018 年	1 月	0.6	2.34
2 月		1.8	2.30	2.5
3 月				2.5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2017 年	782865		11. 8	753792		14. 1	29073
3 月	63782	- 3. 8	11. 9	62368	3. 7	16. 0	1414
4 月	63198	- 0. 9	7. 5	62297	- 0. 1	15. 2	901
5 月	64071	1. 4	14. 9	62536	0. 4	17. 8	1535
6 月	63572	- 0. 8	9. 7	62561	0. 0	15. 7	1011
7 月	65392	2. 9	13. 4	62131	- 0. 7	16. 5	3261
8 月	65901	0. 8	18. 1	62683	0. 9	15. 5	3218
9 月	65956	0. 1	14. 1	63478	1. 3	12. 3	2478
10 月	67218	1. 9	14. 0	63753	0. 4	19. 0	3465
11 月	67988	1. 1	16. 2	64954	1. 9	17. 3	3034
12 月	68462	0. 7	9. 4	68150	4. 9	15. 0	312
2018 年							
1 月	67743	- 1. 1	12. 3	63853	- 6. 3	7. 9	3890
2 月	67067	- 1. 0	1. 8	69189	8. 4	16. 5	- 2122
3 月	65574	- 2. 2	2. 1	64383	- 6. 9	- 0. 6	1191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7 年		20615	184905	- 164290
	2 月	2176	24160	- 21984
	3 月	2497	26252	- 23755
	4 月	3305	7937	- 4632
	5 月	1441	17915	- 16474
	6 月	635	15487	- 14852
	7 月	679	12664	- 11985
	8 月	2376	8345	- 5969
	9 月	- 1128	15413	- 16541
	10 月	1878	9789	- 7911
	11 月	1949	8432	- 6483
	12 月	4883	27546	- 22663
2018 年				
	1 月	- 1430	16712	- 18142
	2 月	1869	10072	- 8203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6 年		1. 5	1. 8	0. 6	- 3. 5	7. 1	- 0. 2
	1 季度	1. 1	1. 9	- 0. 3	- 5. 2	9. 2	- 0. 4
	2 季度	1. 0	1. 8	0. 6	- 3. 4	7. 9	- 0. 5
	3 季度	1. 5	2. 0	0. 9	- 2. 7	7. 5	- 0. 4
	4 季度	2. 0	2. 0	1. 0	- 2. 5	7. 0	0. 3
2017 年		3. 0	1. 8	1. 3	1. 0	6. 4	1. 6
	1 季度	2. 3	2. 1	1. 1	0. 0	6. 1	0. 6
	2 季度	3. 7	1. 9	1. 4	0. 4	5. 7	2. 5
	3 季度	3. 0	1. 8	1. 3	1. 4	6. 5	2. 2
	4 季度	2. 9	1. 4	1. 5	2. 1	7. 2	0. 9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6 年		2. 8	2. 3	2. 2	1. 5	4. 2	5. 0
	1 季度	2. 9	3. 0	1. 0	- 0. 3	4. 1	4. 9
	2 季度	3. 5	3. 3	1. 8	1. 0	4. 0	5. 2
	3 季度	2. 6	2. 1	2. 2	2. 0	4. 3	5. 0
	4 季度	2. 6	3. 3	3. 3	2. 8	4. 5	4. 9
2017 年		3. 1	2. 1	3. 8	2. 8	5. 9	5. 1
	1 季度	2. 9	3. 3	4. 3	2. 6	5. 6	5. 0
	2 季度	2. 8	1. 8	3. 9	2. 3	5. 8	5. 0
	3 季度	3. 8	1. 6	3. 7	3. 2	6. 2	5. 1
	4 季度	2. 8	1. 5	3. 4	3. 3	5. 9	5. 2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7 年		6. 4	4. 5	12. 8	5. 2	27. 5
	3 月	6. 7	4. 6	13. 7	5. 4	27. 7
	4 月	6. 5	4. 6	13. 6	5. 3	
	5 月	6. 6	4. 5	13. 3	5. 2	
	6 月	6. 5	4. 4	13. 0	5. 1	27. 7
	7 月	6. 3	4. 3	12. 8	5. 1	
	8 月	6. 2	4. 3	12. 6	4. 9	
	9 月	6. 2	4. 3	12. 4	5. 0	27. 7
	10 月	6. 3	4. 3	12. 2	5. 1	
	11 月	5. 9	4. 3	12. 0	5. 1	
	12 月	5. 8	4. 4	11. 8	5. 1	26. 7
2018 年						
	1 月	5. 9	4. 3	12. 2	5. 2	
	2 月	5. 8	4. 2	12. 6	5. 0	
	3 月	5. 8			5. 0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7 年		3. 7	3. 4	3. 1	3. 8	3. 4
	3 月	3. 7	3. 2	3. 2	3. 8	3. 4
	4 月	4. 0	3. 5	3. 2	3. 8	3. 4
	5 月	3. 6	3. 6	3. 2	3. 8	3. 4
	6 月	3. 8	3. 3	3. 1	3. 8	3. 4
	7 月	3. 6	3. 4	3. 1	3. 8	3. 5
	8 月	3. 8	3. 5	3. 1	3. 8	3. 4
	9 月	3. 7	3. 6	3. 1	3. 7	3. 4
	10 月	3. 6	3. 5	3. 0	3. 7	3. 4
	11 月	3. 7	3. 4	3. 0	3. 7	3. 4
	12 月	3. 7	3. 1	2. 9	3. 7	3. 3
2018 年						
	1 月	3. 6	3. 4	2. 9	3. 7	3. 4
	2 月	3. 6	3. 2	2. 9	3. 7	3. 3
	3 月	4. 0		2. 9	3. 7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7 年	4207	4325	-118	4450	6441	-1992	2017 年	5739	4784	956	4095	4259	-164
2 月	323.4	324.4	-1.0	338.8	482.9	-144.1	3 月	486.4	425.8	60.6	360.5	371.1	-10.6
3 月	372.5	371.8	0.7	387.5	562.8	-175.3	4 月	508.4	379.6	128.8	317.5	317.3	0.2
4 月	337.8	346.6	-8.8	334.5	486.9	-152.3	5 月	449.3	392.9	56.4	354.7	375.4	-20.7
5 月	368.7	373.3	-4.6	378.3	525.0	-146.7	6 月	512.7	405.5	107.2	356.1	365.1	-9.1
6 月	362.1	383.5	-21.4	363.3	538.3	-175.0	7 月	488.3	386.1	102.2	321.6	336.9	-15.2
7 月	323.4	347.6	-24.2	389.9	515.0	-125.1	8 月	471.1	405.5	65.6	357.8	385.1	-27.3
8 月	346.1	381.3	-35.1	338.1	542.4	-204.3	9 月	551.2	417.0	134.2	338.2	357.1	-18.9
9 月	350.3	374.1	-23.8	379.9	619.8	-239.9	10 月	448.0	378.6	69.4	369.0	389.7	-20.7
10 月	362.0	368.9	-6.9	393.0	590.2	-197.2	11 月	496.8	420.1	76.7	374.8	370.8	4.0
11 月	366.0	381.9	-15.9	397.1	578.9	-181.9	12 月	490.7	435.3	55.4	358.3	359.8	-1.6
12 月	361.1	353.9	7.2	391.9	527.3	-135.4	2018 年	492.1	454.9	37.2	307.3	351.4	-44.1
2018 年	364.8	352.1	12.7	404.3	605.1	-200.7	2 月	448.8	415.7	33.1	352.1	341.5	10.6
2 月	332.4	350.6	-18.1	382.5	529.8	-147.3	3 月	516.0	447.0	69.0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7 年	891	830	61	2178	1524	654	2017 年	5503	5899	-396	3174	2595	579
2 月	66.0	62.2	3.8	154.7	114.0	40.7	3 月	485.2	506.1	-20.9	257.0	217.5	39.5
3 月	78.2	69.3	8.9	200.9	135.3	65.5	4 月	447.8	456.7	-8.9	243.1	215.3	27.7
4 月	67.4	63.7	3.7	176.8	107.2	69.6	5 月	430.3	471.1	-40.8	255.1	220.6	34.5
5 月	77.3	71.9	5.4	197.9	121.3	76.6	6 月	491.8	525.2	-33.4	258.1	200.0	58.1
6 月	79.0	70.8	8.2	197.8	126.0	71.8	7 月	468.8	485.7	-16.9	271.1	217.4	53.7
7 月	70.6	63.7	6.8	187.7	124.7	63.0	8 月	463.7	491.8	-28.1	277.7	220.6	57.1
8 月	78.0	73.6	4.4	194.7	138.8	56.0	9 月	496.3	526.2	-30.0	289.0	222.1	66.9
9 月	77.6	74.2	3.4	186.7	134.9	51.8	10 月	464.6	503.8	-39.2	275.4	223.4	52.0
10 月	76.0	72.8	3.2	188.8	136.8	52.0	11 月	502.6	553.2	-50.6	288.8	229.2	59.6
11 月	82.6	73.4	9.3	166.9	131.4	35.5	12 月	490.8	553.5	-62.6	295.1	233.8	61.4
12 月	78.5	67.0	11.6	176.0	126.0	50.0	2018 年	483.9	521.4	-37.6	273.8	249.6	24.2
2018 年	66.3	88.5	-22.2	169.7	148.4	21.3	2 月	337.0	387.5	-50.5	223.7	194.6	29.2
2 月	76.5	76.2	0.4	173.1	129.7	43.4	3 月				299.9	239.9	60.0
表 33 进出口贸易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7 年	2997	4443	-1446	3531	2378	1153	2017 年				1688	1569	119
3 月	291.4	396.7	-105.2	313.2	189.6	123.7	3 月	186.1	174.0	12.2	146.8	132.8	14.0
4 月	246.4	380.7	-134.4	260.4	182.1	78.2	4 月	167.6	148.0	19.7	132.8	119.5	13.3
5 月	240.5	383.0	-142.6	282.0	195.9	86.1	5 月	184.1	171.3	12.7	143.5	137.7	5.8
6 月	231.0	369.7	-138.6	294.7	206.9	87.8	6 月	170.9	147.8	23.1	116.6	99.9	16.6
7 月	223.9	339.5	-115.6	246.2	208.3	37.9	7 月	183.3	164.5	18.7	136.1	138.9	-2.7
8 月	233.0	360.5	-127.5	290.0	223.8	66.1	8 月	192.1	168.7	23.4	152.3	135.1	17.2
9 月	286.5	379.2	-92.7	307.0	205.4	101.6	9 月	185.9	165.5	20.5	145.6	127.8	17.8
10 月	228.5	374.8	-146.3	314.5	216.2	98.3	10 月	194.6	169.9	24.7	150.9	142.4	8.5
11 月	261.1	404.4	-143.3	332.4	217.2	115.2	11 月	200.2	176.3	23.9	153.2	151.1	2.2
12 月	270.7	418.8	-148.1	378.6	241.6	137.0	12 月	194.5	176.8	17.8	147.9	150.9	-3.0
2018 年	243.8	406.8	-163.0	334.0	164.1	169.9	2018 年	209.3	184.8	24.4	145.5	153.1	-7.6
2 月	258.3	378.1	-119.8	312.0	190.1	121.9	2 月	179.8	156.8	23.1	141.3	141.9	-0.5
3 月	291.1	428.0	-136.9				3 月				155.8	144.9	10.9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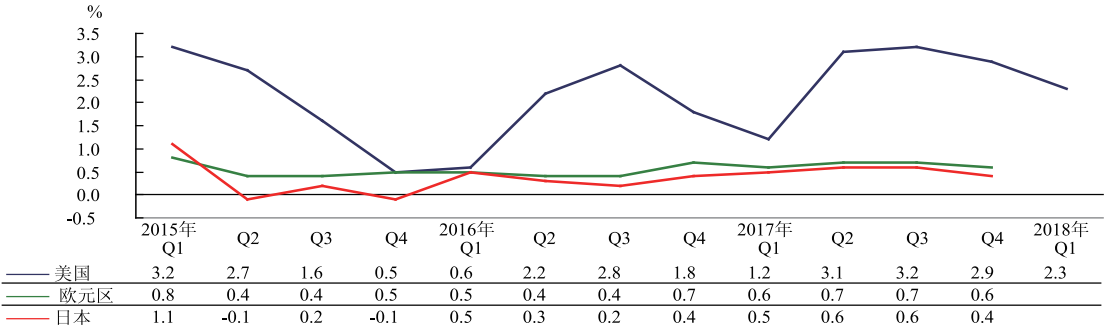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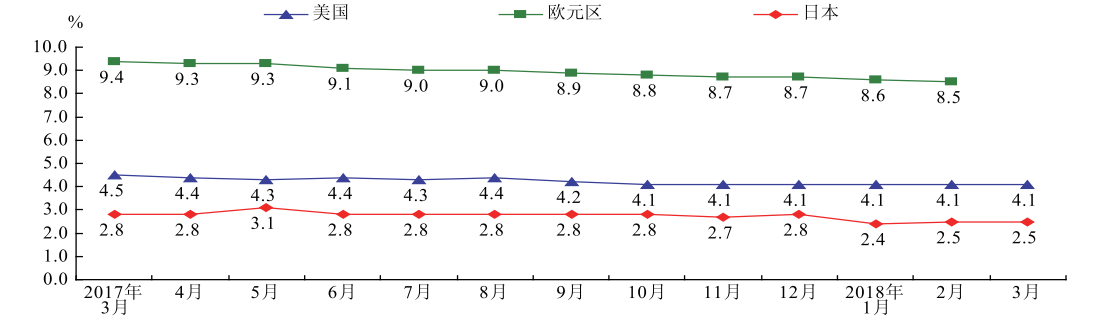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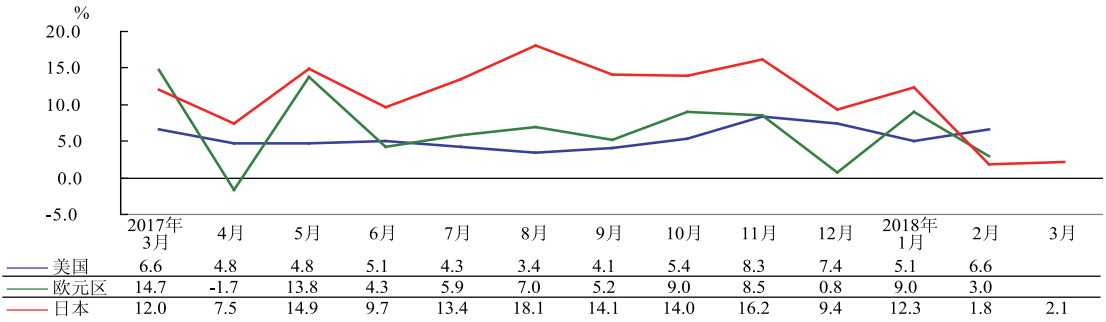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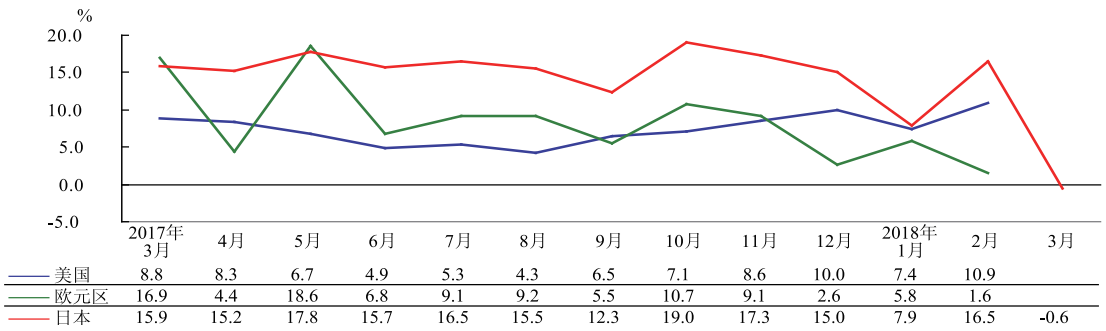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ABSTRACTS

(1)Policy options for Trump’s “happy to see a trade war”

Gu Yuanyang

Trump used the “301, 201 and 232” provisions of the domestic trade law to carry out the so – called investigation, and the excuse of domestic security to unilaterally provoke the trade war mainly against China. We shouldn’t just treat Trump’s “happy to see a trade war” as an oral economic and trade joke, but regard it as a real challenge, a shock and a threat. The trade war reflects the intention of Trump’s return to containment strategy against, that is, to curb China’s development and rise. China has released enough information to ease Sino – US trade frictions and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control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tariffs on China’s goods have been relaxed, and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said that “there is a hope for both sides through negotiations to avoid tariff conflicts”.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Sino – US relations rely 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bandonment of the containment strategy against China; otherwise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difficult to stabiliz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will be one after another. “The one who contacts with the times is a hero”, while the strategy of engagement with China has failed, the containment strategy against China will not be effective.

(2)Discussion on the law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cology

Jia Kang

This article analyses and discusses the regular characteristics of five aspec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namely, the revolutionary role, the huge uncertainty, the personality rule outside the common law, the key significance of creative talents, and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breakthrough and the “minority obedience to the majority” together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rules of the official field, and then puts forward five basic essentials for 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cology.

(3)A study on the spillover and synergistic complementary effects of China’s Free Trade Area

Chen Jinming, Shi Nan and Ren Zaip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the four big free trade zones (FTZ)

of Shanghai, Tianjin, Guangdong and Fujian,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synergistic complementary and region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four big trade zones, and uses the Dendrinos – Sonis model to measure the spillover and the competitive complementary effects of among the four free trade zone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Shanghai FTZ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whose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FTZs of Tianjin and Fujian is obvious; the synergistic effect between Shanghai, Tianjin, Guangdong and Fujian produc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TZs is greater than the competition effect.

(4) Research on Chinese enterprises' 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ian Xinqing and Huang Yongfu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s the scale of overseas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continues to expan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accelerating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market, but foreign complex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is a huge risk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overseas investment. The sound 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ystem can protect the overseas interests of enterprises to the maximum extent and reduce the loss of investment. However, the mechanism and legal regulation related to foreign investment insurance in China are far from perfect, which makes enterprises be very passive in the risk prevention. In view of this, tak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ystem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ystem framework,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enhance thei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5) "Smart supervision"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Internet food safety

Wei Yifang

Food safety is a major problem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Internet consumption, especially online food trade, is growing rapidly and having grea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and accordingly the problem of network food safe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features of high flexibility, transaction virtualization and strong interactivity of online food market increase the complexity of safety supervis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blem of Internet food saf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behind it, and further probes into the practical exercis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new supervision concept of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in supervising the Internet food safet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arket supervision under the network society, we should make more use of new network tools,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social co – governance, and promote multi – win through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6)The prominent risk poin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banking system

Sun Xiaotao

Financial regulation is being strengthened step by step. The risk issue of banking system that dominates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cannot be ignored. The outstanding financial risks of China's banking system include: the first is the issue of non-performing loans. The absolute level of non-performing loans and the future situation of the bank are still not optimistic. The disbursement of non-performing loans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bank profits, and the pressure of non-performing loans has restricted the support of the banks to the real sector. The two is the risk of the bond business. Bank capital flows into the bond market in large numbers, the prominent risk problem of small banks, and the highly leveraged operation of some institutions have increased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bond market. The third is the risk of asset managemen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large scale of funds, large number of business crossing over, innovation springing up, and lack of supervision. In addition,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above financial risk point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monetary policy, macro prudential policy, financial supervision concept, i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and functional supervision,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improve the risk management ability.

(7)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software trade

Lin Xiaoyue, Dong Qingwei and Gao Xiaoyu

The software industry covers a wide range of industries. The applicable typ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e copyright, patent, trademark, trade secret and the exclusive right to design integrated circuit layout. The scene and proble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software trade are also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rade mark.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demand pressure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industr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urgen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cene brought about by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software industry is changing, the demand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aused by the continuous stratification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is dividing, and the demand for prot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urgent. Therefore,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scope and strengt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the software industry, treat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software trade, develop the industrial rules gradually by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industry patent, coordinate the industry guidance policy to encourage the software industry to develop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thus continuously improve competitiveness of our country's software industry in the software trade.

(8)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oftware industry

Shen Jiawen

Digital economy is becoming a new engine of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digital economy lea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ccelerates the growth of the global software industry. China's software industry has accelerated it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oftware industry. The digital creative industry in China is facing a huge growth space. Digital trade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ftware industry, and the export of digital products i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China's cultivation of new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edge. Digitalization has become a new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export in China.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peed up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and guidance of the global digital trade policy. China's digital Trade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data have great development space. To grasp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ftware export. China needs to actively build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of digital trade, strengthe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 of digital content,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platform,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with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ical industry.

(9)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software trade

Xie Lanl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s of finance, communications, transportation, trade, logistics, energy and so on, forming a stable and continuous demand worldwide.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at occupy the monopoly position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better development base continue to export a large amount of advantaged software products. The pattern of two – way expans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will make the scale of the global software trade expand continuously. At the same time, the massive flooding of non – authorized software, network attack and data leakage, and the limitation of cross boundary provision of software are restric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software industry. The rise of emerging markets,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expansion of services demand for security software based on network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will become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software trade.

Editor: Huang Yongfu

《全球化》杂志征稿启事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国内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经济类理论期刊。刊物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重点关注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理论刊物。

稿件要求如下：

1. 篇幅一般为 8000~12000 字，附有 300~400 字的摘要，3~5 个关键词，标题、摘要、关键词的英文翻译附在文后。
2.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和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来稿如属基金项目成果，请按有关规定标注项目正式名称和编号。请将来稿（电子版论文）以 word 格式发送到编辑部投稿邮箱。

本刊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235 室（邮编：100050）

投稿邮箱：qqh@cciee.org.cn；qqhtgx@126.com

联系电话：010-83362182/83362183

问物——物流与供应链线上资讯平台

问物网是由中国物流学会规划与咨询专业委员会主办的一家物流与供应链新闻资讯播报与知识分享的线上媒体，致力于发布行业内最新最全的数据、资讯，探讨时下最热的行业话题，为物流与供应链学习者、关注者、从业者和业内专家提供互动互助的线上社区平台。

问物网开发方和主办方将通过多年的物流研究、管理、咨询经验整合多方资源为问物网提供专家人才库、原创数据资源，并通过互联网使数据逐步发展扩大，最终形成让用户之间相互学习相互服务的生态圈，将问物打造成国内唯一即时、专业、全面的物流类垂直型知识服务平台。



版权所有：中国物流学会规划与咨询专业委员会



APP下载



服务号



订阅号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5号院物资机关服务局1号楼1204

合作/咨询电话：400-166-0399

邮箱：support@wenwu100.com

010-68392730